

彭 湃 传









# 彭 湃 传

蔡 洛 余炎光  
刘林松 罗可群

人 民 出 版 社



彭湃傳

陆定一题





趙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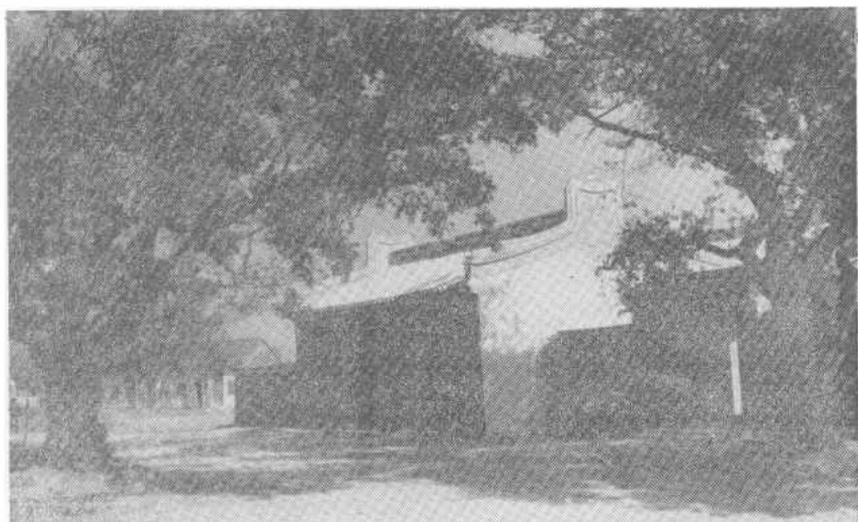
(1896年—1929年)



留学日本时的彭湃(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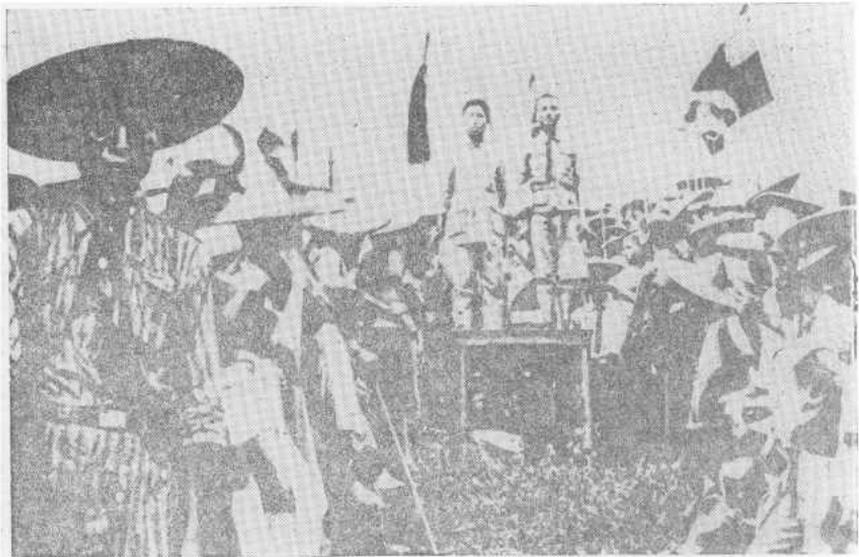
担任海丰县教育局  
长时留影



1922年10月彭湃建立的赤山约农会旧址



1926年9月彭湃(左三)与广东省农协常委在一起



1926年彭湃(讲台左一)在欢送北伐军群众大会上演说



大革命时期彭湃(左二)和许冰(左一)、阮啸仙(右二)、高恬波(右一)在一起

彭湃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住址——当年的公共租界新闻路经远里12号



冠生與家中老少：我等此次被白害已  
 日考性挽救張翠孟却公南承認并否力  
 抄大宣傳，他們在下崗丘及同獄的人大  
 表同情尤是丘力聽非竹活之後竟大  
 嘆息而推敗者 我們在此精神很好  
 兄弟們不要因為不苦犧牲而傷  
 心當保重身體為要  
 休人這堅持 葵芳  
 不認 願與同 瑜伯人感佳尚好  
 子星

1929年8月30日彭湃就义前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1956年毛泽东接见彭湃的母亲周凤

# 目 录

第一章 青年爱国者	1
一、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	1
二、寻找救国的道路	10
三、“从教育入手”	22
四、失败后的探	31
第二章 农民运动的先驱	35
一、伟大事业的开端	35
二、赤山约的“星火”	41
三、海丰总农会	51
四、“农民万岁”	58
五、领导减租运动	67
六、“智斗”陈炯明	75
七、为恢复农会而奋斗	79
第三章 领导广东农民运动	88
一、创建农民运动讲习所	88
二、在广宁减租斗争前线	99
三、重兴海陆丰农民运动	110
四、支持省港罢工和推动第二次东征	119
五、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农民部长	128
六、《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136
第四章 逆流中的奋斗	143
一、省农会八月扩大会议	143

二、调查花县惨案	146
三、声援五华农友	156
四、领导潮梅地区的斗争	163
五、在全国农协和出席党的“五大”	170
第五章 创建海陆丰苏维埃	177
一、南昌起义前后	177
二、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	186
三、领导东江暴动	195
四、转战在大南山	203
第六章 英勇就义	213
一、战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	213
二、狱中斗争	222
三、烈士英名永世长存	228
彭湃生平常表	233
后记	251

# 第一章 青年爱国者

## 一、民主革命思想的感染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农历九月十六日),彭湃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sup>①</sup>的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

海丰是广东省东南部沿海的一个县份。南临南海,北依崇山峻岭,有着丰富的渔业、盐业和林业资源。但境内山多田少,土地瘦瘠,发展农业的条件较差。由于封建势力长期的残酷统治,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正如彭湃所描绘的:“辛亥以前,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府、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象老鼠怕猫的样子,终日在地主的斗盖<sup>②</sup>,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sup>③</sup>

海丰的经济发展虽然是处于相当落后的状况,但是,它在反对民族压迫和反对封建统治方面,却有着光荣的传统。

远在南宋末年的反元斗争中,海丰就已成为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地方。那时,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文天祥,率领宋兵坚持抗元。

---

① 社,相当于乡。桥东社,现属海丰县城镇。

② 斗盖:地主收租时自制的租斗盖,用极坚硬的木头制成,长约一尺七寸,宽一寸半。收租时,斗盖从租斗上压过,从而多收租谷。斗盖打人,轻则破皮流血,重则毙命。

③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载《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同),第101—102页。

宋兵先辗转苦战于东南沿海的浙闽一带。景炎三年(一二七八年),文天祥率领战败后的残部,退至海丰县城。正当在城郊的五坡岭开饭时,遭到元兵突然袭击。文天祥被俘,后“解赴燕京,禁闭三年,作《正气歌》。元世祖不忍杀,诏劝之降,终不屈而就义。”<sup>①</sup>文天祥忠贞爱国的事迹,名闻全国,彪炳史册,使后人深受感动,尤其为海丰人民所敬仰。明朝嘉靖年间,在文天祥被俘的五坡岭上,建造起“方饭亭”。亭柱上刻着一副对联:“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方饭亭的下侧,还建起了“表忠祠”。祠内的正中央,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文天祥像,表达人们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爱戴。

在近代革命的高潮中,海丰人民又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之后,黄履恭发动海丰农民起义与之呼应。黄履恭率领的起义军,声势浩大,一度攻占了海丰县城,大大打击了清政府在海丰的反动统治。后来,清政府派重兵镇压,黄履恭领导的起义军浴血奋战,最后因孤立无援而遭失败。

贫苦农民为了反抗日益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压迫,进行了不断的反抗,秘密结社三合会<sup>②</sup>在海丰非常盛行,“几乎普遍了全县”<sup>③</sup>。一八九五年,三合会首领洪亚重在大嶂山组织起义队伍,劫富济贫。洪亚重领导的起义军发展到数千人,后来虽然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但秘密结社的反抗运动却在海丰全县得到发展。

---

① 海丰五坡岭方饭亭石碑《宋文文山公传略》。

② 三合会,又称天地会。原是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曾多次举行武装起义反抗清朝政府。辛亥革命时期,海丰的三合会受同盟会领导,起过重要作用。

③ 《彭湃文集》第102页。

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黄履恭、洪亚重等农民领袖的战斗事迹，长期以来在海丰人民中间流传，特别是鼓舞了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少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彭湃的祖籍原在与海丰县毗邻的陆丰县吉康区。清朝道光年间，他的曾祖父彭魁才迁到桥东社。桥东社与县城隔着一条常年碧绿的龙津溪。溪水发源于海丰北部的银瓶山，泻下平原后，缓缓地流进南海。一座古老的石桥，把县城和郊外的农村连接起来。每逢集市时节，进城的农民在龙津桥上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彭魁就在这龙津桥侧开了一间经营杂货兼做经纪的商店，取名“彭名合”，生意颇佳。彭湃的祖父彭藩当家后，更加兴旺发达。彭藩，号南金，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他除了进一步扩大“彭名合”的杂货经营外，还开设了一个买卖木材和长生板(棺材)的货栈。随着贸易的日益兴隆，彭藩赚的钱越来越多。他大量购置田地，发展成为工商业兼地主。到彭湃出生时，彭家已成了桥东社首屈一指的“大户”，最盛时期拥有铺面四十余间，雇工十七、八人；每年收田租一千六百多担谷，收高利贷四百多担谷，成了远近无人不晓的“桥东彭”。

彭藩有两个儿子，长子魁任没有后裔，彭藩便替他过继了一个，取名应培。次子魁哲，有妻王氏，后又娶周凤为妾。魁哲共有子女十人，六男四女，彭湃是他的第三个儿子，为周凤所生。彭藩见孙儿辈众多，很为高兴，把长房长孙的应培和彭湃兄弟依次排列。这样，彭湃排行第四，在家中就习惯地被称为四哥了。

彭湃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正在兴起的年代中度过的。彭湃出生前一年，腐朽的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五岁那年，清朝政府又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年轻而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

登上了政治舞台，为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当中以康有为为首，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一八九八年进行了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的改革。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使得长期在封建专制思想禁锢下的中国人民，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二十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广东多次发动旨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与海丰毗邻的惠阳，就曾先后于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七年发动过两次起义。革命派还以广州和香港作为宣传革命理论、发展革命组织的基地。大约在一九〇五年左右，已有省城广州和香港的报纸传进海丰，一些富有革命性的秘密书刊，如邹容著的《革命军》等，在知识青年中广泛传阅。激荡的时代，严峻的现实，给青少年时期的彭湃以深刻的教育。

彭湃从小就比较聪明伶俐，在同辈兄弟中最得老祖父的疼爱。一九〇一年，还不满五岁的彭湃就被送进海丰县城的七圣宫读私塾。塾师马紫卿是彭家的亲戚，对彭湃着意培养，使得他不到两年便认识了好几百字，能背诵好些古诗，还学会了写春联。

彭湃六岁多一点，便进入林祖祠小学读书。他有私塾的基础，个人又勤奋好学，考试成绩几乎都是名列前茅；最突出的是作文和图画，他的习作经常“贴堂”示范。

在林祖祠门口的空地上，在龙津溪边的大榕树下，彭湃常常和一群孩子围着老人，听老人们讲文天祥、黄履恭、洪亚重的故事。彭湃听了一次又一次，还常常带着疑惑不解的神情向老人提出问题：“黄履恭、洪亚重那么英勇，为什么会打败仗？”老人的回答是：“他们敌不过官兵。”彭湃又问：“他们为什么敌不过官兵？”他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常常陷入沉思之中。年纪轻轻的彭湃朦朦胧胧地感受到官兵与贫民百姓的对立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回到家里，他总是爱跟自己的母亲周凤在一起。周凤本是海丰县公平山区贫苦农家的女儿，从小就卖给人家当婢女，十六岁嫁到彭家为庶母。勤劳善良的周凤，常常给孩子们讲述穷苦人家终年辛苦而愁吃愁穿的悲惨故事，在彭湃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同情劳动人民的种子。有一次，佃户们挑着谷子到彭家交租，彭湃的父亲诸多挑剔，硬要佃户把谷子再用风车颷一遍，累得佃户们饥渴不堪。站在旁边的彭湃见到有个佃户想讨碗生水喝，就连忙倒了一碗热茶送上前去。他虽然受到佃户们的赞扬，却遭到父亲的斥责，这件小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彭湃这个地主家的少爷对佃户的同情。

彭湃十岁那年，父亲和嫡母相继去世，周凤便全部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责任。彭湃在周凤的影响下，越来越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对那些在县城和乡村横行霸道的豪绅也就渐渐产生不满。周凤回忆说：“彭湃小时，每当听土霸劣绅，贪官污吏的故事，便大声痛骂，甚至在经过县里权贵门口时，也不喜欢。”<sup>①</sup>

一九〇六年，一些进步青年在海丰办起一间私立的师范学校和设立正气书报社，介绍一些新学说<sup>②</sup>。“后来又成立文社，鼓吹革新思想”<sup>③</sup>，一部分进步青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一九〇九年，同盟会会员陈炯明<sup>④</sup>等人在海丰创办了《陆安自治报》，这是在海丰首次出现以提倡社会改革，鼓吹

---

① 周凤：《湃的小史》（未刊稿）。

② 参见《陈竞存先生年谱》，香港1978年版。

③ 张友仁：《我所知道的陈炯明》，《广东文史资料》第三辑第34页。

④ 陈炯明（1875—1933），广东海丰人，同盟会员。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广东副都督、代都督，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成为盘踞东江的地方军阀。1925年所部被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歼灭。1933年9月22日病死于香港。

民族革命的进步报纸。

一九〇九年，彭湃升入海丰第一高等小学，取名汉育。翌年，原任海丰知县唐汝梅卸任。唐汝梅是臭名昭著的赃官，他禁赌又包赌，禁烟又包烟，禁嫖又开娼馆，只要能弄到钱，他什么坏事都敢干。而当地的土豪劣绅却对这个贪官大肆吹捧，为其歌功颂德，特送他一把“万人伞”，用以“表彰”他的“德政”。彭湃的祖父也是送“万人伞”的发起者。权贵们的胡作非为，使彭湃十分气愤，他曾向祖父进言劝阻，祖父哪里会听他这毛孩子的意见呢？彭湃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便找陈复、陈魁亚等同学商量。他们探知“万人伞”还在头盔店里，彭湃便想出一个好办法：中午时分，头盔店冷冷清清，一个店员正在打盹，彭湃悄悄地溜到“万人伞”前，用剪刀把祖父在“万人伞”上的名字剪掉。别的同学也都偷偷地把自己长辈的名字剪去，这样，“万人伞”被剪成“百孔千疮”，结果就无法送出了。

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在海丰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中，陈潮等人光荣牺牲，他们是海丰首批献身于民主革命的先烈。武昌起义发生以后，陈炯明联同海丰的革命党人，在惠州举义响应。广东光复后，陈炯明先后担任了广东副都督、代都督。陈炯明的发迹，在客观上扩大了辛亥革命在海丰的影响。海丰的同盟会会员在辛亥革命以后，更为活跃。当时在第一高等小学任教的同盟会会员林晋亭，常常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向学生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事迹以及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彭湃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启迪，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热心支持者。他好谈论时事，追求民主和进步，渴望国家富强，常常和那些反对辛亥革命的守旧派学生展开争论。

一九一二年，彭湃只有十六岁，家庭便为他完婚，妻子是海丰鹿境乡的蔡素屏。对于这门只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事，彭

湃是很不同意的。起初，他打算“一走了之”。后来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样做，就会害了女方的一生。于是，他同意成亲，决心对妻子进行帮助教育，使她能够逐步跟上时代的潮流。蔡素屏原是小脚，穿绣花小鞋，婚后的第二天，彭湃就把她的小脚放了，将绣花鞋送给了别人。蔡素屏是个文盲，婚后彭湃教她读书，手把手地教她学写字。在彭湃的耐心教导下，蔡素屏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还懂得了许多新知识、新道理，夫妻感情也与日俱增。在彭湃的教育和影响下，蔡素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好助手。一九二七年，蔡素屏加入了共产党，任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一直在海丰坚持革命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被叛徒出卖，九月二十一日在遭受反动派各种酷刑之后，壮烈牺牲。牺牲前她大声对乡亲农友们说：“只要农会万岁，我甘愿受罪。”在敌人屠刀面前，毫无惧色，从容就义。蔡素屏先后生了四个男孩：一九一五年生彭独（早卒），一九二二年生彭绛人（早卒），一九二三年生彭仕禄<sup>①</sup>，一九二七年生彭洪<sup>②</sup>。

一九一三年，彭湃进入海丰中学就读。海丰中学是当地的最高学府，因而也成了新旧思想争夺的一个主要阵地。以陈月波为头子的土豪劣绅，千方百计地阻挠新思想在海丰传播，《陆安自治报》就曾受到陈月波等人的捣乱而一度停刊。对于海丰中学，他们更是力求控制，把那些顽固守旧的老朽安插到学校里去当教师。这些作法，逆潮流，背民心，海丰中学的学生极为不满。彭湃和同学们一起，发起了一个“择师运动”，公开抵制那些坚持宣扬封建文化的老朽，欢迎具有新学识、传播新思想的教师。

---

① 彭仕禄，抗日战争时参加东江纵队，后到延安，又到莫斯科留学，现任水电部副部长。

② 彭洪，解放后曾任海丰县副县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择师运动”以后，民主革命思想在海丰中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海丰中学的青年学生逐渐形成了学习新知识，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风气。彭湃和同学们经常在学校后面的“方饭亭”和“表忠祠”里，议论国家大事，诵读文天祥的爱国名篇《正气歌》。在进步教师林晋亭等的支持下，陈复和彭湃、陈魁亚等进步学生组织了“群进会”。这是一个以“互相切磋，共同进步”为宗旨的群众组织。它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社会政治学说，传播新书刊，关心时事的发展。群进会逐渐成为海丰中学进步学生的核心，它对海丰民主运动的开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胜利果实很快便被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袁世凯对内残害人民，对外卖国求荣。全国仍然是处于一片黑暗之中。海丰，依然由封建势力所控制，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可言。耳闻目睹社会的黑暗，彭湃对现实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所谓“二十一条”，袁世凯竟然承认了这卖国条约。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把五月七日定为“国耻纪念日”。一九一六年“五七”这一天，以彭湃等为领导的“群进会”，发动海丰的青年学生，举行了一次反日爱国大游行，以纪念“五七”国耻。

同年下半年，海丰的土豪劣绅陈月波、马剑郎等竟然为海陆丰的驻军统领林干材雕了一座石碑浮雕像，准备在林干材生日那天，于“表忠祠”举行落成典礼，妄图将林干材与民族英雄文天祥并列供祀。

林干材是原广东督军龙济光<sup>①</sup>派到海陆丰的刽子手。他和当地的豪绅地主互相勾结，专门“清剿”反袁的革命党人和海陆丰地

区的三合会会员，他把几百个善良的农民作为“革命党”加以屠杀，以此向他的主子邀功。海陆丰人民面对林干材的高压统治，敢怒而不敢言，而豪绅地主却拍手称快，尊称林干材为“统领公”，歌颂他“功德无量”。

为林干材竖像的消息传开后，群众极为恼怒，青年学生更为愤慨。彭湃和陈复、陈魁亚等人带领“群进会”的青年学生，开展了一场反对竖像的斗争。起初，他们在海丰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墙红”<sup>②</sup>，揭露林干材的罪恶，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为林干材竖像。林干材、陈月波等人见了，气急败坏，马上派出爪牙，四处去撕扯“墙红”，并调查这次“捣乱”的组织者，还扬言要用武力对付“捣乱”者。反动势力的恐吓，并没有使“群进会”的青年学生退缩，为了使反对“竖像”的斗争更有成效，他们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更巧妙的争取办法。

林干材生日前夕，陈月波、马剑郎等得意洋洋，以为无人敢与他们作对了，便派人把林干材的石碑浮雕像抬进了五坡岭的表忠祠。为了防备万一，还是派了两名卫兵轮流看守。初冬的夜晚，北风呼呼，卫兵蜷缩在表忠祠的里间睡觉，这时，彭湃和“群进会”的几个青年学生，静悄悄地潜进表忠祠。彭湃和陈复拿着铁锤，摸准了雕像的鼻子，狠狠地敲了几下，把雕像的鼻子砸成一个大窟窿。卫兵闻声醒来时，彭湃他们早已离开了现场。林干材和陈月波等翌晨看到这个没有鼻子的雕像，哭又不是，笑又不得，直恨得咬牙

---

① 龙济光，桂系军阀。1913年8月，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都督兼署民政长。1916年7月，黎元洪改各省督理军务长官为督军，民政长官为省长。任命陆荣廷任广东督军，朱庆澜任省长。陆未到任前，特任龙济光暂行署理广东督军。直到这一年9月，龙部才撤出广州。广东人民非常痛恨龙济光，称之为：“督粤三年，穷极万恶”。

② 墙红，俗语，指贴在墙上的告示，因过去多用红纸，故曰“墙红”。

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只好将这个象丑八怪的雕像偷偷地用船运往碣石<sup>①</sup>，推到大海里去。

当然，林干材、陈月波等人不会就此罢休。他们派出打手，四处寻找彭湃等青年学生寻衅。一见到“群进会”的人，就大打出手，拳脚交加。陈复等人被打伤。打手们没有找到彭湃，便成群结伙、气势汹汹地到彭家施加压力，要彭藩将彭湃交出来。

陈月波等土豪劣绅的暴行，群众议论纷纷，认为这实在是欺人太甚。海丰中学的青年学生由彭湃首名具状，联名到省城广州“告状”，这时，龙济光已倒台，统治惠阳地区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sup>②</sup>为了笼络民心，便将林干材革职，并将打人凶手严拿究办，斗争以青年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反对“竖像”的斗争，实质上是海丰青年学生对封建势力的挑战，它直接打击了林干材、陈月波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彭湃英勇、机智、不畏权势的斗争事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青年学生引以为榜样。同时，彭湃也成了海丰地主豪绅的眼中钉。彭湃的母亲周凤为此而忧心忡忡，她怕陈月波下毒手，儿子遭暗算，一再劝彭湃以后不要再作这些“惹是生非”的事情。彭湃却理直气壮地对母亲说：“言正义顺，生死何足挂怀”<sup>③</sup>

## 二、寻找救国的道路

在海丰中学就读期间，彭湃就“有追求新知识的强烈愿望，向

---

① 碣石，海丰县属的渔港。

② 莫荣新，桂系军阀，原任广惠镇守使，后任广东督军。

③ 周凤：《湃的小史》。

往广州的新学堂”<sup>①</sup>，在不满现实的思想驱使之下，彭湃更加渴望能外出求学，以便获得更多的新知识，并从中寻找出能够改变国家现状的道路。但是，彭湃的祖父彭藩，却是一个顽固守旧、嫉恶新学的人，对彭湃的外出求学向持反对态度。于是，彭湃就托他家的世交陈其尤<sup>②</sup>去做他祖父工作。陈其尤请他的堂兄出面去说服彭藩，“针对彭家虽富有但无势力，每逢题军需<sup>③</sup>时常受官府迫勒的弱点，对他的祖父说：‘家里有一个人在外读书，将来就可以免受欺负。’”<sup>④</sup>彭藩果然被这些话所打动，同时又担心彭湃在家会再闹一些“招惹是非”的事情，终于同意了彭湃去广州读书的要求。

一九一七年初，彭湃离开了家乡海丰，随陈其尤经香港到达广州，进入广府中学学习。广府中学设在越秀山麓的司后街（今越华路），是提倡“新学”以后创办的中学，在当时来说，还算是一个学习新知识的较好的场所。在广府中学上了一个多月课后，彭湃仍然感到在国内求学还是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于是决心到日本去留学。

自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到外国去向西方学习，在中国的进步青年中成了风气。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早就有文化交流，明治维新后，日本有了长足进步，更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注意，因此，去日本留学的人就特别多。这种趋向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存在，去日本留学的人还是十分踊跃<sup>⑤</sup>。彭湃受这种潮流的影响，在陈其尤的帮助

<sup>①</sup> 陈其尤：《关于彭湃年轻时的一二琐事》（1963年10月15日），曾文整理访问记录（未刊稿）（下同）。

<sup>②</sup> 陈其尤（1892—1970），广东海丰人，同盟会会员。曾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蒋介石私人驻港代表。1947年任中国致公党主席。全国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70年12月10日在北京病逝。

<sup>③</sup> 题军需，指官府征收军饷。

<sup>④</sup> 陈其尤：《关于彭湃年轻时的一二琐事》。

<sup>⑤</sup> 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载：1918年留日学生数3000人。

下，于一九一七年初夏东渡。

彭湃到达日本后，拿着陈其尤写的介绍信函，认识了黄霖生等留学生，随之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十番地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他先跟随朋友们学习日语，不久，就进入专门为中国学生进行预备教育的成城学校补习，直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毕业。

彭湃在日本，亲眼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配合它并吞中国的阴谋，而在国内煽起了一股褊狭的爱国狂热，使中国人在日本很受歧视，留日学生也被蔑称为“支那马鹿”<sup>①</sup>。祖国遭侵略，个人受凌辱，青年会日益高涨的反日救国气氛，给彭湃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原来在海丰已初步形成的爱国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眼见日本人褊狭的爱国狂，亦就以为生做中国人的唯一责任是救国，当头的急务是排日。他自有了这种见解，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年末，完全是一位热烈的排日人物。东京警署内排日派的中国留学生‘黑表’上，遂有了彭湃的姓名。”<sup>②</sup>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深入，彭湃的爱国反日思想也愈益增进，他参加反日救国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

一九一八年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由日本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北京政府亲日公使章宗祥商谈中日军事行动问题，日本便以苏联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借口，说：“东亚和平深恐为之扰乱”、“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sup>③</sup>，三月二十五日与北京政府交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照会。五月

---

① 马鹿，日语，原意是愚蠢，呆笨。“支那马鹿”，是骂中国人是笨蛋，蠢家伙的意思。

②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载《李春涛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下同），第23页。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14页。

十六日，中日两国军事代表正式签定了密约，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中国境内的所谓“军事行动区域”自由行动。

中国留日学生获讯后，无不义愤填膺。平日并不喜欢照相的彭湃，特别邀集留日同学黄霖生、陆精治，合影一张“国丧纪念”照，他们在照片上题词：“民七年中国军事亡国协定被迫签订之日，特摄此‘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sup>①</sup>

留日学生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反对中日密约的斗争，五月上旬，组成了“救国团”。“五七”国耻三周年纪念日前夕，彭湃和“救国团”的代表共四十六人，在东京神田区的中国饭馆“维新号”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回国挽救国难的具体做法。突然，日本警察“执械明矩，闯入室内，不问情由，将在座诸人乱打，刀砍足踢，掀桌倒台，……不论分晓，一一捉去”<sup>②</sup>，进行审讯、辱骂，将这些“救国团”的代表整整折磨了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才将他们释放。彭湃和其他一些救国团的代表，被日本警察打伤。

这次事件，使留日学生万分悲愤。日本准许本国人结社集会自由，准许居住在日本的欧美人结社集会自由，唯独不容许中国的留学生结社集会，并且“由干涉而驱逐，而逮捕，而侮辱。”<sup>③</sup>三千留日学生对此忍无可忍，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以示抗议。

五月中旬，留日学生陆续回国。归国学生在上海成立了“救国团”本部(后改为总事务所)，在《救国日报》上发表了《归国学生告同胞书》。彭湃于五月十二日回国后，即为反对密约的反日救国事业奔走呼号。他先在上海参加《救国日报》工作，不久又回广东，和归国的广东籍留日学生一起，在广州九曜坊教育会成立了

---

① 合影照片，原由彭湃亲属彭潮保存，现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②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上海图书馆藏(下同)。

③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

“救国团”广州分团事务所，还发出了《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书》。“宣言书”痛斥中日密约是“直举吾国领土奉送之”的亡国条约，声明“大祸临头，大义在目，威力甘言，不值一顾，此吾人不旬日而归国者千余，奔走呼号，愿舍学、舍身而谋废约救亡也。”<sup>①</sup>

稍后，彭湃回到家乡海丰，发动爱国的青年学生，掀起了一个以“废约救亡”为中心的反日爱国的宣传活动。彭湃在集会中痛陈其参加“救国团”会议而被日本警察打伤的经历，激发了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仇恨。

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祖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卖国媚日的北京政府，竟由教育部发出命令，强令归国的留日学生“务于六月十日前到达日本，返回校继续留学，其后仍不回校者，取消留学资格。”<sup>②</sup>留日学生分析了当时形势，感到原想回国后一边从事救国活动，一边继续学业的打算无法实现，为了不耽误学业，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再行东渡，返校学习。

六月中旬，彭湃和决定赴日留学的五弟彭泽一起，又启程往日本。在当年的秋季入学试中，彭湃考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尽管由于北京卖国政府的破坏而使反日救国运动遭到挫折，而彭湃本人又面临着繁重的大学课程，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彭湃的爱国热情。在新学年开始以后，彭湃还专门带他的五弟彭泽到日本博物馆参观，面对着那里陈列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日本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彭湃十分悲愤的对弟弟彭泽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国的，你看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多大！”<sup>③</sup>

<sup>①</sup> 《留日广东学生同乡会宣言》1918年，广东省档案馆存。

<sup>②</sup> 1918年5月31日东京《朝日新闻》：《留学生返校命令》。转引自实藤惠秀《日中非友好的历史》第371页。

<sup>③</sup> 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未刊稿），原件存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下同）。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彭湃以为“反日”就是“救国”的这种思想,在一九一八年冬天发生了变化。根据李春涛<sup>①</sup>转述彭湃自己的说法,是这样引起的:“有一日,正是因军事协约问题要往神田中国青年会开会那一日,湃夹了几件重要文件,也要赴会。刚在早稻田电车终点候车。忽来了一个日本‘刑事’<sup>②</sup>,要夺取湃所带文件。湃与之争。正在相持,忽地从人丛中走出来一个雄赳赳的日本中学生,竟帮同‘刑事’,反剪了湃两手,拥湃到警察岗亭。路上,湃问那学生:‘你何以亦不讲法律?须知你不是警察!’不意那学生却反问湃道:‘你是不是支那人?’彭湃当时忽有所悟。暗想:‘无错!爱国的极致,自然要排斥他国!我断不能向日本人说公理!因为彼我都是为了爱国。’”<sup>③</sup>显然,这个偶然的事件,只能说是彭湃对自己的单纯“排日”思想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一个因素。另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彭湃开始看到,统治着中国的北京政府,并不赞成、甚至还反对爱国群众的“排日”运动。因此,仅仅是“反日”,还不能救国,要救国,还需寻找其他的道路。

自此之后,彭湃渐渐自勉为一个“超国家主义者”。“竟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sup>④</sup>当时,彭湃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也可以救国”<sup>⑤</sup>。因而,彭湃对基督教的

---

<sup>①</sup> 李春涛(1897—1927),广东潮安人,1917年9月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与彭湃同校同科同班,并同住一室,成为莫逆之交。1919年与彭湃等组织赤心社。回国后曾应彭湃之聘,到海丰任教。后在北京中国大学等校授课,宣传马列主义,一直关心、支持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后,李春涛作为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热情支持工农运动,被誉为“非党布尔什维克”。1927年4月27日在汕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sup>②</sup> “刑事”,即刑事警察,担任搜查和逮捕任务的特务警察。

<sup>③④</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3页。

<sup>⑤</sup> 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

信仰，在一段短暂的期间，达到了入迷的程度。那时，他几乎“每天饭后”都研究《圣经》，并十分热心地动员一些留日学生与他一起钻研，想从基督教的教义中，寻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来。<sup>①</sup>

显然，《圣经》是不可能给人们提出任何救国的方案，当然也就无法满足彭湃的寻求救国道路的愿望。由于形势的急剧发展以及国内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彭湃又继续战斗在爱国运动的最前列。

一九一九年四月，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决定将德国在我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中国留日学生十分气愤，他们既仇恨得寸进尺的日本强盗，更加痛恨卖国的北京政府和那些奴颜媚日的卖国贼。四月中旬的一天，彭湃等从驻日公使馆一位馆员口中，探知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将于翌日乘火车离东京回国述职的消息，便约了黄霖生、陆精治等几十个同学，守候在东京火车站的月台，当章宗祥从地下楼梯上来月台乘车时，彭湃兀地挥起一拳，直向章贼的背上打去，其他同学跟着一拥而上，举拳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章宗祥！”吓得章宗祥面如死灰，狼狽不堪，在随员的携扶下，慌忙钻进车厢<sup>②</sup>。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五月六日，日本报纸报道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然而，日本政府却偏偏挑选五月七日来为日本皇太子冠礼，以中国的“国耻”作为日本的“国荣”。这个消息一公布，中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便决定在五月七日那一天召开国耻纪念大会。但是，由于日警的预先警告，各处都不肯租借会场。想改在中国驻日公使馆的俱乐部开会，又遭“事实上不过为日本外交部一附属机关”

---

① 陈卓凡：《关于彭湃同志留日时的忆述》，1963年8月24日访问记录（未刊稿）（下同）。

② 陆精治：《彭湃同志在日本》（未刊稿）（下同）。

的中国使馆的无理拒绝。留日学生遂临时决定分为若干小队，分别前往各国驻日使馆递送宣言书，然后到日比谷公园集中，再行解散。递送宣言书后向公园集中时，突然遭到日本警察的野蛮镇压。日警“拔刀狂挥，马队亦纵横冲踏”<sup>①</sup>，受伤者仅有记载的就达二十七人之多，彭湃被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sup>②</sup>当时被日警逮捕的中国留日学生共三十五人，经过我留日学生的严正斗争，日方于第二天释放了二十三人，六天后再释放五人，其余七人竟然被判处十天到半年的徒刑<sup>③</sup>。

彭湃受伤后由于同学们的营救而未遭逮捕。他回到宿舍，心潮逐浪，义愤难平，“呼吁政府既无持平之争，乞怜使馆每遭斥声之叱。”<sup>④</sup>五月七日的惨剧，进一步加深了彭湃对北京反动政府的认识。面对着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彭湃开始意识到，救国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唤起民众，激励同胞。于是，他愤然咬破食指，蘸血在长约一米、宽约半米的一幅白绢之上，写下“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血书张挂在海丰中学的揭示板（布告栏）上，更加激发了经受五四运动启迪的海丰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掀起了抵制日本劣货的轩然大波。海丰中学学生组织成队伍，在县城，特别到汕尾日货充斥的商场搜查劣货，并把搜来的劣货全付之一炬，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为的愤恨。”<sup>⑤</sup>

暑假，彭湃回到家乡，同爱国热情极其高昂的海丰青年学生一起，组织“海丰白话剧团”，演出反日话剧《朝鲜亡国恨》等剧。在演《朝鲜亡国恨》一剧中，他亲自扮演主角安重根，演得维妙维肖，当演到刺杀伊藤博文（侵略朝鲜、灭亡朝鲜的罪魁，灭朝后的实际统治者）时，彭湃感情非常激动，充分表现了朝鲜义士安重根英勇无

<sup>①②③④</sup> 王拱璧：《东游挥汗录》。

<sup>⑤</sup> 刘锦汉：《回忆彭湃同志的一些革命活动》（1979年8月16日）（未刊稿）。

畏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演出激动人心，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九月，彭湃再往日本，继续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影响，彭湃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开始踏上了由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转变的进程。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震动了全世界，对日本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来就已经比较活跃的日本思想界，由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进一步传播，因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研究和宣传十月革命与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团体陆续组成。还在一九一七年底，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一些学生，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学生会，组织一些对劳工运动感兴趣的工人和学生，研究社会主义问题。一九一八年九月，又组织了第二个工人学生会。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一些大学师生，为了研究民主运动，成立了“黎明协会”，与此同时，帝国大学成立了“新人会”，以推进新潮流，参加合理改革现代化日本运动；早稻田大学则成立了“人民联盟”，宣称要致力于完全的民主化。所有这些，都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新思潮的产物。特别是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以后，日本政府为适应国内外政策的需要，实行了新的大学法令，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有所放松，于是，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群众组织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日本各种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为彭湃研究和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向社会主义者转变，提供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彭湃当时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是著名的私立大学，学生多来自中下层，有不少进步教师，素有关心政治、关心社会思想动向的传

统,对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反应极为敏感。这个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又为彭湃的思想转变创造了有利的因素。

正是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彭湃“鉴于向所信仰的基督教之不彻底,及基督教徒之堕落”;认识到平等博爱思想也不能救中国,“遂翻然一心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sup>①</sup>一九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早稻田大学成立了“建设者同盟”。不久,彭湃就参加了这个组织。还加入了劳动者同情会,常助劳动者推挽重载上坡<sup>②</sup>,这是彭湃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建设者同盟”是早稻田大学一些激进青年组织起来的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的群众团体。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寻求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措施,以达到“建立一个最合理的新社会”的目的。从一九二〇年五月至年底这段期间,他们就学习和讨论过:当前思想问题、工联主义、无政府主义、妇女问题、行会社会主义、苏维埃研究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建设者同盟”的成员多来自农村,和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他们十分重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他们强调社会实践,要求学生成员在学习期间就参加实际活动,用实践来证明自己的信仰。来自贫穷的海丰农村的彭湃,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早就有所同情,“建设者同盟”的这些观点,很容易为彭湃所接受,这也成为彭湃回国后不久便从事农民运动的原因之一。彭湃回国以后,在一九二三年六月致友人的信中,仍然深情地怀念着“建设者同盟”的战友,他说:和田岩君是“日本建设者同盟的中坚,我们阶级斗争的战友,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健将;闻他们到农村去,十几日没有睡眠,回来发生胃肠病,一命呜呼。唉真悲惨!真痛恨!唉我的

---

①②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3页。

泪要滴下来了。”<sup>①</sup>这表明“建设者同盟”对彭湃的影响是深刻的。

然而，“建设者同盟”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它的研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各个派别的学说，它的成员的信仰又十分庞杂，这也同样地给彭湃的思想发展以很大的影响。他对社会主义诸家学说，兼收并蓄，还分不清那些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些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特别引起他注意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根据后来他自己所说，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信仰曾达到了“深信”的程度<sup>②</sup>。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彭湃在东京加入了由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日本人堺利彦、著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朝鲜人权无为等发起组织的戈思摩俱乐部(Cosme—Club，宇宙社)。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交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除日本、中国、朝鲜人以外，俄国、印度、南洋群岛及欧美诸国也都有人参加。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高津正道和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等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戈思摩俱乐部不定期开会，对国际上发生的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sup>③</sup>。彭湃在这些活动中广泛接触了社会主义的诸家学说，并有机会与具有各种主张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思想交流。彭湃参加戈思摩俱乐部活动十分热心。有一天晚上，他去参加活动时被日本警察侦知，“嗣后，遂时有‘刑事’尾随彭湃。彭湃姓名，亦被列入淀桥警署内社会主义者‘黑表’上，为八百注意人物中之一分子。自是以以后，至一九二一年归国止，彭湃始终是日本警察眼中一个注意

---

①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50页。

② 《彭湃给文亮》，《彭湃文集》第42页。

③ 参见田汉《给曾文同志复信》，原件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人物。”<sup>①</sup>连彭湃因鼻窦炎住院动手术期间，也竟然有两个日本刑事“陪同”<sup>②</sup>。

尽管警察的监视这么严密，也不能动摇彭湃追求真理的决心。他经常到京都帝国大学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sup>③</sup>讲课；他除参加日本的社会主义活动外，还积极参加朝鲜留日学生发动的民族爱国运动。他认为“狭义的爱国运动是不彻底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是最高的理想<sup>④</sup>。

在加入戈思摩俱乐部之前，彭湃和李春涛、杨震嗣<sup>⑤</sup>等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发起组织了“赤心社”。他们之所以取名赤心，是表示他们“一心学习俄国”<sup>⑥</sup>的愿望。在参加戈思摩俱乐部活动的同时，彭湃和“赤心社”的其他成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书籍，研究疑难问题，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讨论有关俄国革命的问题，还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赤心》。“赤心社”的活动，使彭湃对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九二一年，日本的社会主义活动有了新的发展。不少社会主义者逐渐地抛弃了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因而先后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如高津正道等的“晓民会”，堺利彦等的“无产社”，山川均、德田球一等的“水曜会”，市川政一等的“无产阶级社”。在

---

①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4页。

② 陈卓凡：《关于彭湃同志留日时的忆述》。

③ 河上肇（1829—1946），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经济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33年加入日本共产党。

④ 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

⑤ 杨震嗣（1896—1927），又名杨志白，江西九江人，中共党员。彭湃留日时的同班同学，回国后应彭湃之聘，任海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1927年8月在潮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⑥ 李孝则：《彭湃同志在日本》（未刊稿）（下同）。

这期间，留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也已成立。彭湃既参加了日本一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也和留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有密切的联系。留日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施复亮(存统)<sup>①</sup>后来回忆说：“我在日本，和彭湃同志见过几次面。”一九二一年三、四月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和他谈过一次话。他的主张是：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sup>②</sup>

历史表明，在各种进步组织的影响下，彭湃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就必须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走俄国人的道路，尽管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上，他还受着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总的来说，他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

### 三、“从教育入手”

一九二一年五月初，彭湃参加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毕业考试，写好了毕业论文。因为祖母病重，他决定不参加毕业典礼，提前归国。

彭湃回国的时候，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逐渐健全和扩大组织，正在积极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同无政府主义论战，这场中国现代思想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使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划清了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先后退出了共产主义小组，而有些人则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而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国内树立了自己的优势。

---

<sup>①</sup> 施复亮，又名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sup>②</sup> 《施复亮先生访问记录》，1963年10月16日曾文访问并整理(未刊稿)。

国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的现实，给彭湃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

彭湃回国不久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决心为在中国、首先是在海丰实现社会革命的理想而奋斗。针对海丰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较为庞杂而工农大众又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客观现实，彭湃决定“从教育入手”，来作为实现他的社会革命理想的第一步。彭湃归国后第一年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以社会主义来教育知识分子、教育工农大众这个中心来展开。

彭湃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在海丰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社址选在马氏少宗的后边。社会主义研究社采用自由研究的方法，通过学习讨论，探讨有关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他们阅读《新青年》等杂志，讨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彭湃在研究社还作过多次的专题演讲，他介绍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讲过《河上肇博士社会问题意见》、《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俄国》、《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等问题。<sup>①</sup>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活动在海丰的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其成员很快就发展到七十多人，其中的郑志云<sup>②</sup>、林甦<sup>③</sup>、陈魁亚、李国珍<sup>④</sup>等，后来都成为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助手。

---

① 陈其英(加修)《彭湃同志在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概况》初稿(1961年6月10日)，海丰红宫纪念馆存(下同)。

② 郑志云(1901—1928)，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1927年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928年8月14日在惠来县牺牲。

③ 林甦(1894—1933)，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海陆丰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武装斗争，1933年到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途中被捕，在梅县牺牲。

④ 李国珍(1902—1932)，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海陆丰地委宣传部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到福建工作，任福建省委委员，1932年5月1日在厦门牺牲。

社会主义研究社在彭湃的领导下，很重视对工农大众的宣传教育。彭湃在海丰城的绵德堂，向三百多工人和店员介绍过《世界职工运动发展形势》，又在城郊的溪西社灵爷宫前的番茨<sup>①</sup>集市上，向农民演讲《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等，听众也有二、三百人<sup>②</sup>。这些活动，是彭湃试图以社会主义教育工农大众的尝试。

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以后，彭湃又于七月三十日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在彭湃起草的《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中，他指出：组织“劳动者同情会”的目的，就是“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象，使贫民能够有机会接受教育。他抨击当时的教育制度，“不是贫民阶级——劳动者、农夫、贫民的教育，而是贵族、官僚、资本家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sup>③</sup>。这篇“缘起”，是彭湃“反对现代教育制度的宣言”<sup>④</sup>。同时，它反映了彭湃要革新社会的强烈愿望，他提出：“凡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必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sup>⑤</sup>。

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的建立及其活动，都是彭湃“从教育入手”以改革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前者是作为教育知识分子的组织，后者是作为教育工农大众的组织。这两个组织，对促进新思想、新文化在海丰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海丰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获得了

---

① 番茨，即红薯。广东方言。

② 陈其英（加修）：《彭湃同志在海丰创办社会主义研究社概况》。

③⑤ 彭湃：《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彭湃文集》第1、2页。

④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5页。

初步的知识。

同年八月，彭湃写了《告同胞》一文，发表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新海丰》创刊号上。在这篇文章中，彭湃怒斥了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少数特权阶级田园阡陌，高楼大厦，闲游无事而衣食住自足；贫者无立锥之地，耕不得食，织不得衣，造成屋宇而不得住。因此，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告同胞》还引用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非难社会主义的谬论的批判，来驳斥当时存在的所谓“社会主义是提倡公妻”等等论调。<sup>①</sup>在文章的最后，彭湃对实现社会革命充满信心，他说：“诸君！有志者事竟成。……我们赶快觉悟！我们赶快结合！我们赶快进行！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sup>②</sup>但是，《告同胞》一文也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当时是“破坏时代”这个问题，提出要“破坏法律”，“破坏政府”，“破坏国家”<sup>③</sup>。对于怎样进行社会革命，则认为要通过“互相研究！互相团结！互相联络！互相扶助而为之！”<sup>④</sup>可以看到，《告同胞》一文，既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又还存在着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这正是彭湃当时思想状况的反映。《告同胞》一文的发表以及《新海丰》杂志的刊行，同样是以彭湃为代表的海丰的社会主义者，“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改革的一个步骤。

然而，当时海丰教育大权掌握在陈炯明的亲信陈伯华（又名陈崇岳，陈月波之弟）手上，他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任海丰劝学所所长。陈伯华读职营私，任人唯亲，滥用公款，贪污腐化；劝学所的工作人员则不事教育，大吃大喝，赌博打麻将，通宵达旦。学生

---

① 彭湃：《告同胞》，《彭湃文集》第6页。

②④ 彭湃：《告同胞》，《彭湃文集》第7页。

③ 同上，第3至4页。

们对此早就强烈不满，并一再群起而攻之。改造海丰的教育机关的当务之急是改造劝学所。只有从此开刀，才能扫除“从教育入手”去改革社会的阻力。

在海丰学生的激烈反对下，八月九日，陈伯华不得不借口“事繁不克兼顾本邑学务”<sup>①</sup>为理由而辞职。于是，社会主义研究社的成员、海丰学生联合会领导人郑志云、陈修等，便于八月十二日到县署请愿，要求任命彭湃为劝学所长<sup>②</sup>。县长翁桂清将学生们的意见转报广东省长陈炯明，并要学联会直接向陈炯明提出建议。学联会一面拍电给陈炯明，一面致电海丰留省学生会请给予支持。

陈炯明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率领粤军驱赶了桂系军阀，克复广州后，即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陈炯明又被任命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掌握了广东的军政大权。但是，陈炯明不同意孙中山出兵北伐、统一全国的革命方针，而是热衷于“联合自治”，想自己充当“广东王”。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对于有利于抬高自己声望的事情，都给予一定的支持。

可是，陈伯华一伙深知，如果彭湃当了劝学所长，他们把持的教育大权将丧失殆尽，他们借教育阵地来维护旧思想的统治的企图也会落空。所以，他们不择手段地攻击彭湃，诬蔑彭湃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是提倡“非孝”、“公妻”、“共产”。为了揭穿陈伯华之流制造的谣言，八月中旬，彭湃和学联会代表郑志云、陈魁亚等前往广州，住在当时的广东省议会。那时，由于陈炯明仍声势显赫，“海丰要人巨公在广州者极多”<sup>③</sup>，彭湃和学联代表向他们说明情况，澄清是非，驳斥了陈伯华一伙的谎言。彭湃“到广州二月，镇日里

<sup>①②</sup> 《陆安大事记》，载《陆安日刊》一周年纪念册（下同）。

<sup>③</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4页。

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公妻。”<sup>①</sup>标榜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对彭湃的宣传“不好意思反对”<sup>②</sup>；又见彭湃“是海丰人，且是留学生”<sup>③</sup>，年青有为，是个人材，想拉来为己所用。于是，陈炯明便顺水推舟，稍后，就指示县长翁桂清聘请彭湃为劝学所长<sup>④</sup>。彭湃也于九月底返回海丰。

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彭湃就任海丰县劝学所长<sup>⑤</sup>。他决心以海丰这块教育阵地，作为实现改革社会的尝试。为此，他首先要使教育和群众接近，使群众能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所以，他到任的当天，在发表的接任布告中，就宣布要普及教育，推广乡村教育，为劳动者贫民服务。他在办公室大客厅墙壁上，挂着他自己亲手画的有一米多高的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两幅大像。在自己的住室，贴下了“漫天撒下自由种，佇看将来爆发时”的对联。可见，彭湃对“从教育入手”来改造社会是抱着很大的期望！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彭湃为改革海丰的教育采取了坚决措施。首先对劝学所的人事进行整顿，清除顽固守旧的老朽，吸收进步青年。他挑选了陈魁亚、林文为劝学所的工作人员。同时，先后聘请留日同学当时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杨震嗣、李春涛和北大毕业生黎越庭等担任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其次，革新教学内容，如李春涛的国文课，便选了《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上的文章作教材<sup>⑥</sup>。彭湃还以极大的努力发展乡村教育，在农村建立分校，自己常常到各区检查教育工作；又创办了两所女子学校，入学的女

---

①②③④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4页。

⑤ 《陆安大事记》。

⑥ 余汉存：《关于彭湃同志的二三事》（1979年8月X未刊稿X下同）。

生达一百多人。彭湃大力提倡体育运动；还注意改善了教师的待遇。

彭湃针对原劝学所贪污腐化的现象，认真整顿教育经费，革除私弊。同时把原由财政局管理的东港垦殖场接管，由劝学所经营，并向地主抽收鱼塭捐<sup>①</sup>，革掉了专门从中剥削、承批示租的“捐棍”，这些措施，使教育经费有了增加。

彭湃自己亲自参加教学实践。他到海丰第一高等小学担任美术课，既是发挥自己原来爱好美术的特长，又通过美术课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上课时画了马克思、列宁的像，向学生讲马克思和列宁的功绩；他画攻打冬宫的图画，向学生宣传十月革命。有一次，他在黑板上画了个“1”，问同学们这是什么东西？一个年纪最小的学生说：这是猪屎耙。其他同学都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它确实有点象当地农民捡猪粪的勺子。彭湃随后严肃地说：“我画的是一根手杖，这手杖是地主老爷用来打那些捡粪的农民的。”<sup>②</sup>接着他向同学们揭露地主压迫农民的罪恶事实，教育同学们痛恨压迫劳动人民的吸血鬼。引导学生关心农村的社会问题。

彭湃和学生们打成一片，彼此亲密无间。那时，他不过二十多岁，和当时学生们的年纪差不多。起初，学生们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彭局长”，彭湃却连连摆手，对同学们说，你们比我大的，可叫我阿湃；比我小的，就叫我湃哥，最好还是叫“同志”。他还专门把“同志”这个新鲜的名词解释一番。听了彭湃的话，学生们都感到很亲切。十二月三十一日，县公署的保安队长带兵到直坑南土乡“抓赌”，赌徒没有抓着，却胡乱抓了两个学生关起来“敲竹杠”。彭湃

---

<sup>①</sup> 鱼塭捐：是向经营鱼塘的业主征税。鱼塭是在海滩围垦的一块地方，既可养鱼，还可种植一造水稻。

<sup>②</sup> 余汉存：《关于彭湃同志的二三事》。

闻讯后，集合学生一百多人到县署去请愿，彭湃站在学生一边说话，驳得县长翁桂清哑口无言，只好下令把学生放了。

彭湃在劝学所长(一九二二年元旦以后改称教育局长)任内的一系列做法，使海丰的教育面貌为之一新，它不仅是促使了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文化在海丰进一步传播，还培养了一批受到新思想熏陶的进步学生，为后来农民运动的开展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但是，彭湃的做法却引起了守旧派的土豪劣绅的不满，陈月波、陈伯华等一伙，无时无刻不想抓点把柄以借机生事，千方百计把彭湃赶走，重新夺回海丰的教育大权。

一九二二年一月，海丰县议会议员彭汉垣<sup>①</sup>提出拆除城墙扩建马路，以整饬市容的提案。一月八日由县议会通过了提案。二十四日县议会正式贴出“执行拆墙案”的布告。当时标榜进步的陈炯明也表示同意拆除海丰的城墙。彭湃认为拆除城墙有利于消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还可以将城墙砖用于建设，于是积极赞成“拆城”。他率领学生带头参加拆城墙劳动，并发动群众协助。然而，土豪劣绅以拆城破坏风水为理由，大肆反对。他们组织“护城会”，发出“与海城共存亡”的叫喊。他们以陈月波为首，组织了数十人的队伍，到教育局质问彭湃<sup>②</sup>。当他们“护城”的企图不能得逞时，又收买了流氓打手，妄图将彭湃置于死地，并叫嚷要撤去彭湃的教育局长职务。三月三日，彭湃为拆墙事发表了宣言，教育局也因流氓的捣乱而决定停止办公。<sup>③</sup>十分明显，陈月波等土豪劣绅的所为，不外是借“拆城”事件，搞垮彭湃在海丰教育界的地位，重新夺回失

---

<sup>①</sup> 彭汉垣，彭湃的胞兄，积极支持彭湃从事农民运动，任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兼交际部主任，后以国民党左派身份任海丰县县长。1928年3月16日在澳门被捕，稍后引渡到广州被杀害。

<sup>②③</sup> 《陆安大事记》。

去的教育大权。所以，围绕着“拆城”而展开的这场斗争，实际上是进步与反动、新思潮与旧思想的斗争在海丰的一个反映。

三月上旬，彭湃被迫离开海丰，经汕头转香港前往广州。在广州期间，彭湃出席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还参加了由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的、以谭平山为主任的“白话剧社”，彭湃分工负责配景，并担任演员。“白话剧社”于三月十四日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暨马克思纪念会上，演出了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六幕话剧《碧海磷香》<sup>①</sup>。彭湃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其它活动。三月十九日，彭湃在广州致电县长翁桂清，请准予辞去教育局长职务，翁桂清觉得左右为难，只好回电挽留。<sup>②</sup>

四月二十七日，彭湃回到海丰。为了筹备“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游行，彭湃和海丰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了许多准备工作。彭湃还亲自写了一首《劳动节歌》：

今日何日？  
“五一”劳动节，  
世界劳工同盟罢工纪念日。  
劳动最神圣，  
社会革命时机熟，  
希望兄弟与姊妹，  
“劳动”两字永牢记。<sup>③</sup>

这首歌在中小学教唱，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五一”劳动节到了，因五月一日至三日都下大雨，游行便改期

---

① 1922年3月12日《青年周刊》。

② 《陆安大事记》。

③ 《彭湃文集》第330—331页。原作后两句是“希望哥哥与弟弟，‘劳动’两字永牢记”。教唱时，女教师陈淑娟提出：难道妇女姊妹就不要牢记“劳动”吗？彭湃高兴地接受这个意见，改成了“希望兄弟与姊妹”。

在五月四日于海丰县城举行。那一天，彭湃挑选了个子最高大的学生擎着大旗作前导，旗上标着两个醒目的大字：“赤化”。各校的师生，在彭湃、杨嗣震、李春涛等带领下，敲铜鼓吹喇叭，高唱《劳动节歌》，呼着“劳工神圣”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过。这是海丰历史上第一次庆祝五一节大游行。

“五一”游行却使海丰的豪绅地主十分震惊，他们认定这是反常之举，以为将实行“共产共妻”了。这班人早就对提倡社会革命的彭湃怀恨在心，这次更是抓住“赤化”游行，大作文章。他们在《陆安日刊》<sup>①</sup>上攻击彭湃，发表了《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章<sup>②</sup>。同时，又马上向陈炯明告状，说彭湃搞“赤化”，要实行“共产”、“公妻”。陈炯明遂电告翁桂清：“彭湃如不职，可另择能委任”。陈炯明又给彭湃拍来电报：“君非百里才”。表示要彭湃到广州去他那里做事。彭湃对此置之不理。五月九日，彭湃被正式撤去了教育局长的职务，“县中所有思想较新的校长教员们也纷纷的下台了。”<sup>③</sup>

#### 四、失败后的探索

“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的尝试遭到失败，这对彭湃来说，实在是一件好事，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如释重负”<sup>④</sup>。从此，彭湃开始了一个新的探索，使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工农方面来。

正是这时，《陆安日刊》因撤去彭湃的教育局长的职务而兴高

---

① 《陆安日刊》，是陆安自治报停刊后，由陈炯明支持的海丰地方报纸，1921年8月5日创刊。

② 《彭湃研究史料》第2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同）。

③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1页。

④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6—27页。

采烈。他们借此事大肆攻击彭湃，说彭湃提倡社会主义是“唱高调”、“太新”、“离我们的生活太远”<sup>①</sup>等等。

为了同《陆安日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进一步宣传社会主义，唤醒工农，彭湃和李春涛等在他的住处“得趣书室”，办起了自己刻写的油印刊物——《赤心周刊》。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四日出版了第一期<sup>②</sup>。

《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sup>③</sup>。它的目的，在于向学生宣传，要求他们出来，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进行社会革命。该刊文字通俗，图文并茂，针对性强。当时是海丰第一高等小学学生的余汉存回忆他当年读了《赤心周刊》后的感受时说：“使我萦绕脑际，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其一，画了一座宝塔，最低层是工人、农民，受压迫和剥削最惨，在工农背上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再上一层是军阀，最顶峰是帝国主义。其二，绘一工人，身材高大魁梧，被资本家的铁链捆绑着，他觉悟了起来，愤怒地两手大力一挣，挣脱捆在身上的铁链，一节一节的落地，工人兄弟解放了。”<sup>④</sup>彭湃的表兄弟马可光，负责《赤心周刊》的油印工作，在海丰农民运动开展后，他回忆起《赤心周刊》出刊的情景时，写过一首诗：“北风吹来呼呼响，半夜不困思前情，想起‘得趣’印书刊，一夜印到天大光。《赤心周刊》好名声，传播真理撒红种。想到工农翻身日，越思越想越高兴。”<sup>⑤</sup>

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从事社会革命的问题，彭湃在《赤心周刊》第四期发表了《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彭湃认为，“社会主义并不

①②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5—27页。

③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1页。

④ 余汉存《关于彭湃同志的二三事》。

⑤ 《马可光回忆》未刊稿，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是主张社会一部分的改良，是主张全体的改造。”“凡在现社会制度下生息的人，无论他是皇家的公伯爵，或是市井的贫穷儿，只要他确是抱着不平，确是主张社会革命，都可以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所以提倡社会主义的人，是不能限定那一种类的。”<sup>①</sup>他特别希望富有人家的、受过教育的人出来提倡社会主义，指出：“他们生在较富的人家，受教育的机会当然比别人多些，或是程度比别人高深些，所以他就应该比别人的觉悟更彻底些，更猛烈些！若是受了教育，全无觉悟，专为官僚军阀作走狗，那就太不忠实了！”彭湃认为：人本无罪，罪在制度。不但无钱人应该起来干社会革命，而那些住洋楼食白米的，受教育机会比别人多的更应该干社会革命。虽然这是一种不切实的幻想，但说明他已把“社会革命”提到了议事日程。

作为文字刊物，《赤心周刊》的影响，实际上还是限于“有知识的人”，“但到后来，他觉着对于有知识的人的希望，完全绝望。”<sup>②</sup>他们虽然以极大的热情办《赤心周刊》，但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却并没有直接从《赤心周刊》中得到什么启示。彭湃自己后来也承认：《赤心周刊》“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什么把戏。”<sup>③</sup>为此，彭湃开始感到，要唤醒工农，发动工农，就必须到群众中去，尤其是要到农民中去做农民运动。彭湃的这个看法，在海丰社会主义青年团<sup>④</sup>中引起了争论，一些人不同意彭湃要发动、组织农民的主张，他们的理由是：“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智识，不易宣传，徒费精神罢了。”<sup>⑤</sup>只

① 彭湃：《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彭湃文集》第9页。

②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8页。

③⑤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1页。

④ 当彭湃在广州活动期间，他聘请到海丰任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的杨嗣震、任教员的李春涛先后到达海丰就教。当时的杨嗣震、李春涛已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于是，他们一起发展海丰当地一些进步青年参加青年团，在海丰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直接受团中央领导。

有杨嗣震支持彭湃，还催促彭湃快些去办农会<sup>①</sup>。

经过讨论，彭湃要从事农民运动、发动农民起来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在《赤心周刊》第六期发表了《告农民的话》，号召农民起来进行斗争，并表示愿意拿出家财来支持农民。

一天，彭湃回到家里，见到母亲痛哭流涕，十分伤心。原来，他的七弟彭述<sup>②</sup>在朗读《告农民的话》时，刚好他的母亲在那里听，彭述刚读完这篇文章，他母亲便放声哭起来说：“祖宗无积德，就有败家儿。想着祖父艰难困苦经营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岂不是要破家荡产吗？”<sup>③</sup>彭湃极力从各方面劝解母亲，方才了事。

这件事给彭湃以很大的启发，他想，这篇文章母亲听了痛哭伤心，要是农民们听到了的话，心里必定非常欢喜。同时，彭湃“自信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sup>④</sup>。于是，《赤心周刊》出版了第六期以后便停刊，彭湃“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sup>⑤</sup>

---

① 《辟云给子由兄们》，《彭湃研究史料》第1页。

② 彭述，烈士，1934年在大南山牺牲。

③④⑤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1页。

## 第二章 农民运动的先驱

### 一、伟大事业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党全力领导工人运动。自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起，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止，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工人阶级充分显示了自己是反帝反封建的先锋队和最坚决的力量。当时，党一方面由于对农民运动还没有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当时党员也不多，分不出许多力量去注意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所以，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实际上还是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浙江省的萧山县，共产党员宣中华组织过农民协会，但很快便被解散了。在广东，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感觉到“唤醒”农民的重要性，却没有切实开展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彭湃，从一九二二年六月起，下决心到农村去从事农民运动，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但是，下决心到农村去，这仅仅是从事农民运动的一个开端，要使农民运动能够真正的开展起来，还需要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这些困难，又由于彭湃是大地主家庭出身，就变得更加重大和更加复杂了。

在开始的时候，彭湃所碰到的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农民不愿意和彭湃接近。彭湃先到赤山约的一个乡村，

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民正在村边拾粪积肥，看见他身穿白学生服，头戴白通帽，以为他是来收戏捐的，连忙恭恭敬敬地问：“先生坐，请烟呀！你是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彭湃说：“我不是来收捐的，是来和你们做朋友的，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那个农民听了，便说：“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说完，便走开了。不一会，又碰见一位二十多岁的农民，他问彭湃在那个营当什么差事？来办什么事？彭湃告诉他，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以前是学生，现在到贵村来是想和你们做朋友。那个农民听了便笑着说：“我们是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然后，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彭湃一连走了几个村子，都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和他谈话。第二天，彭湃又到这几个村子，有的农民以为他是来收账的先生，连自己的姓名也不愿意告诉他；有的农民借故避开，彭湃在一些农民中讲了一通“地主欠了农民的账”的道理，可是谁都没有注意去听它。这一天，彭湃依然没有找到一个愿意和他接近的农民。<sup>①</sup>

其次是家庭的阻挠和反对。早在六月中旬，彭湃在《赤心周刊》发表了《告农民的话》，彭湃的母亲听了这篇文章的内容，便哭着骂彭湃是败家儿子。<sup>②</sup>彭湃到农村中去从事农民运动以后，几乎所有的家人也都持反对态度，彭湃说：“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sup>③</sup>因为“他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特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sup>④</sup>

---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2—113页。

② 同上书，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12页。

再次是地主豪绅的攻击和社会舆论的责难。彭湃开始农民运动的初期，一些地主豪绅说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职务后，郁郁不乐，才作出这样的无聊之举。有的还造谣说彭湃患了精神病，要去休养。

面对着这么多困难，彭湃并不气馁。对于家庭的阻挠和豪绅的攻击，彭湃不予理会，他说：“川流百折终到海，不怕拐弯，只怕不动，若是永远不歇的动，一定成功的”<sup>⑤</sup>。他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克服农民运动开展过程中的重重障碍。

彭湃抓住了要使农民能够和自己接近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想了许多办法。他穿起了朴素的粗布衣裳，戴上竹笠，光着脚板，使自己在穿着方面尽量缩小与农民的距离。他决定暂时不到乡村去找农民个别谈话，而是选择了龙山脚下的天后庙前的十字路口作宣传点。这里是赤山、北笏、赤岸、河口等约农民往来的必经之地，庙前有一棵大榕树，郁郁葱葱，是盛夏时节农民歇脚的好地方。彭湃常携带着留声机，放音乐给农民听，吸引了许多群众。他还将地主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编成歌谣，自己唱，也教附近牧童唱，借以吸引过路农民。下面这首歌谣，就是彭湃在当时编写的：

冬呀！冬！冬！冬！

田仔骂田公！<sup>⑥</sup>

田仔耕田耕到死；

田公在厝<sup>⑦</sup>食白米！

---

④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8页。

⑤ 易元：《彭湃同志略传》，原载1930年8月《北方红旗》第29期，《彭湃研究史料》第341页。

⑥ 田仔指农民，田公指地主。

⑦ 在厝：海丰地方方言，指在家里。

做个(的)颠倒饿;  
懒个(的)颠倒好!  
是你不知想!  
不是命不好!  
农夫呀!醒来!  
农夫呀!勿戆!  
地是天作!  
天还天公!  
你无分!  
我无分!  
有来耕,  
有来食!  
无来耕,  
就请歇! ①

当围拢来的农民多的时候,彭湃就向农民进行宣传。一连半个月,每天都听彭湃演讲的农民由十多人增至三、四十人;与彭湃交谈的由三、四人增至十余人。②

接着,彭湃又进了一步;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直接与农民一起生活。当时正是农忙季节,彭湃自己带着番茨,到田间和农民一起劳动,在与农民接触过程中向农民进行宣传或个别谈话。他有时帮农民插秧种田,有时帮农民牵牛荷锄,有时携带留声机唱给农民听,就是在狂风烈日也是坚持不懈。

生活上的重大改变,彭湃的身体消瘦了,皮肤黝黑了,头发长长了。一些地主豪绅便借此来对彭湃进行攻击和造谣,说彭湃“患

① 彭湃:《田仔骂田公》,《彭湃文集》第331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4页。

病”、“发狂”，是个“疯子”，甚至有不少亲戚上门来“探病”。彭湃的家里更是强烈反对他这样做。在巨大的压力下，彭湃自己后来说：“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才能坚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sup>①</sup>

在这开始的一个多月里，彭湃无论是演讲或谈话，都是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农民说明“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sup>②</sup>。特别是彭湃常常和农民一起，算“耕田亏本”的细账，引导农民认识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使农民受到了更加具体和生动的阶级教育。彭湃的这些宣传教育工作，开始在农民中产生影响。

七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彭湃依然在天后庙前的路口向农民群众演讲。他说到了农民如果能团结起来，组成团体，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敌不过我们。彭湃的话还未说完，一个中年农民就大声说道：“车大炮，说减租，请你们‘名合’<sup>③</sup>不要来逼我们旧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这时，一个青年农民起来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你这话真是错了，你是耕‘名合’的田，‘名合’如能减租，不过是你的利益。我呢，不是耕‘名合’的田，怎样办呢。所以现在在我们不是去求人的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团结的问题。……今日不是打算你个人的问题，是打算多数人的问题。”<sup>④</sup>显然，这段话是说得很中肯的，说明这个青年农民对地主剥削农民、农民应该团结起来的道理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对彭湃的宣传表示拥护，才能作出了这样的反应。这个青年农民叫张妈安，他是多次听了彭湃的

---

①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29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4页。

③ “名合”，即“彭名合”，彭湃家的店铺名。

④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5页。

演讲，并经过反复思考，从而达到了这样的认识水平。

将近半个月的耐心的深入细致宣传，终于使彭湃找到了知己。于是，他立刻同张妈安交上了朋友，把他当成“同志”，邀请张妈安当天晚上到自己的住处“得趣书室”去谈话。

夜晚，张妈安依约前往“得趣书室”。他说，他的朋友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景<sup>①</sup>都很相信彭湃的说话。彭湃便请张妈安马上邀他们一起来座谈。这几个农民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活泼爽直，一见面就无拘无束地谈起来，很快就谈到农民运动的问题。彭湃向他们提出：为什么我天天下乡宣传，农民总不愿意和我多谈点话，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呢？林沛说：第一是农民不得空闲；第二是你的话太深，一般农民不易听懂；第三是没有熟悉的人带你一起去。因此，他向彭湃建议，最好是晚间七、八点钟这个时间去，这时农民较为空闲；说话时尽可能再浅白一些。林沛还表示，可由他们为彭湃带路。彭湃听了深有同感，觉得这些农民实在是聪明得很，一下子便看出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越谈越融洽，深感有必要组织起来，结成团体。李老四提议说：“我们几个先立一个农会。”彭湃说：“那好极了。”其余的人也一致赞成，当即组成了一个六人农会。<sup>②</sup>当晚由彭湃主持共同宣誓，要服从指挥，严守秘密，不许出卖同志。<sup>③</sup>

这样，海丰县第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农会——“六人农会”<sup>④</sup>，便建立起来了。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阴历六月初六），成了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进程中的一个新的开端。

---

① 李景，后来按照彭湃的建议，改名李思贤。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6页。

③ 据六人农会成员李思贤老人的回忆，当晚成立的是叫贫农党，共同宣誓为贫苦农民的利益奋斗到底（1981年10月30日访问记录，未刊稿）。

④ 《彭湃给李春涛》《彭湃文集》第22页。1922年7月29日成立，加入者七人。

## 二、赤山约的“星火”

“六人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就深深地在农民中扎下了根。张妈安、林沛等五位青年农民，成了彭湃在发动农民的过程中的依靠力量和得力助手。

张妈安和林沛一方面进行串连，介绍志同道合的农民同彭湃认识，扩大了彭湃同农民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带领彭湃到赤山约的各个乡村中去开展宣传。

每天晚上，彭湃带上留声机，和张妈安、林沛一起到农民群众中去。他们先为农民播放音乐，然后彭湃演讲。他用问答形式，讲农民痛苦的原因、地主压迫农民的事实和农民解放的办法等问题。在演讲的过程中，彭湃常常穿插表演魔术。这样的宣传活动，很受欢迎，逐渐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一个星期以后，张妈安和林沛也在彭湃的帮助下学会了演说，这就更加方便了他们发动工作的展开，接近他们的农民不断增多。

在宣传发动的过程中，彭湃还十分注意从思想上发动农民，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彭湃除了和农民算“耕田亏本”的细账，借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以外，还经常注意农民的思想动态，针对农民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教育。当时，听过彭湃宣传的许多农民，都认识到组织农会的必要，但是，要他们参加农会，却是很不容易，一般的态度是“等人家通通加入了，我一定是加入的。”<sup>①</sup>彭湃向这些农民作了通俗易懂的解释：“我们入农会，比方过河一样，这面河岸是痛苦的，对岸是幸福的，可是个个都怕被河水浸死，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7页。

都不愿先过，我委他，他委我，互相推委，结果没有一人敢过。我们加入农会，即是联合的过河，手握手的进行，如果一个人跌下河去，就手握手的接起来，所以农会是互相扶助，亲如兄弟的机关。”<sup>①</sup> 彭湃用这种生动的群众语言进行思想发动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许多农民都提高了认识水平，参加了农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农会会员增加到三十余人。

农会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若仍然靠几个人来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已经不能适应农民运动发展形势的需要了。因此，彭湃通过农会组织为会员谋利益，以农会名义替农民群众办公益事业等方法，来树立农会的威信，扩大农会组织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

这时，赤山约云路乡的一个姓潘的会员，家里一个六岁的童养媳，不慎掉到厕所里溺死了。她的娘家邀集了三、四十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潘家，硬是说故意害死他的女儿，一定要偿命，眼看就要闹出大事来了。彭湃急忙召集农会会员讨论，决定全体出动，集合起来去跟那些人讲道理。赤山约的约正<sup>②</sup> 卓梦梅，却以调停为名，要处罚姓潘的会员，乘机敲诈勒索。农会的会员十分愤慨，怒斥卓梦梅无理，卓害怕挨揍，急忙跑掉。来索人命的看到这个场面，感到不妙，便退一步说：“我是对我的亲戚，关你们何事。”农会会员说：“你还不知道我们有了农会，农会是贫人的会，团结一起，亲甚兄弟，他的事即我的事，我的事即他的事，今日我们农民兄弟有事，生死是来相帮，我看你们也是耕田的，他日必加入农会，如果你加入了农会，也是一样的帮助你们”<sup>③</sup>。来索命的那些人自知理

---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8页。

② 约正相当于现在的乡长。

③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8—119页。

亏,看到农会人多势大,便自动撤走了。农民从这件事,认识到组织起来,团结互助的好处。农会也以此作为发动农民扩大农会影响的宣传材料,说:“我们若不团结,就无力量,无力量的人,定受人欺侮,大家若要有力量,就请速来加入农会。”<sup>①</sup>农会于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稍后,农会又规定反对“互相夺耕”和反对地主“加租易佃”的条例,以保护农会会员的利益,初步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条例规定:凡是农会会员,未经原耕该地的会员的许可及农会的批准,任何人不得夺耕。地主对农会会员加租易佃时,除了原耕会员声言放弃,并且得到农会的批准者以外,其他会员,不得夺耕,如果违反就要严重处罚。当农会会员被地主加租收回耕地时,如该会员生活发生困难,可以请求农会设法,或向附近会员磋商让耕,或介绍其作别种事业。这个条例制定以后,农会会员之间完全消除了互相夺耕的事,地主也受到一定的抑制,不敢任意对农会会员加租。当地主挑动非会员去夺会员的耕地时,农会就派人前去提出忠告。若地主坚持不给原佃会员再耕,农会就宣布“同盟非耕”,大家都不去租种这个地主的田地,地主恐怕田地荒芜,只好归原佃耕作。“同盟非耕”取得了对地主斗争的初步胜利。

农会影响的不断扩大,一些社会人士也对农民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海丰县城宏仁西药房的医生吕楚雄,主动关心农会。彭湃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以后,他表示要和彭湃他们一起奋斗。彭湃充分发挥吕楚雄的长处,以他的医术来为农民服务。他们结伴下乡宣传,吕楚雄还为农民治病。农民深感农会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对农会愈加相信,参加农会的人日益增多。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8—119页。

随后，农会还领导了反对码头捐的斗争，以保护农民的利益。海丰城边的龙津河，是当地的水上交通要道，农民常用船到城里运粪肥。城里的土豪乘机勒索，硬要派码头捐，每只船二毫，如不照纳，即将船舵取去。如果去赎舵，则要付出几元才能赎回，农民深受其苦。农会决定要取消这种不合理的码头捐。农会针锋相对地提出：如果城里的土豪经过乡村，或城市的船只到农村，也都要交路费，如果他们不交路费，农民也就不交码头捐。这个办法一公布，城里的土豪劣绅无可奈何，不敢再勒索，剥削农民的码头捐也就无形中取消了。

农会又公开出面调解农民内部的矛盾。过去，农民内部发生争执时，往往被土豪劣绅所利用，豪绅故意扩大事端，诉诸官府，从中渔利，而农民却被弄到倾家荡产。因此，农会发出了通告：凡农会会员内部发生争端，须先报告农会，如不报告农会，而去报告绅士及官厅者，即使其很有道理，农会也宣告除名；农会还以全力去帮助与他敌对的会员。如果农会会员与非会员发生争端时，会员也须报告农会。如会员对于地主有争议时，不报告农会而交涉失败，农会概不负责。这个公告，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间发生纠纷，大都要求农会协助解决。从而，凡有农会的乡村的政治权力，就由绅士土豪之手而转移到了农会，这样一来，专事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警察、司法衙门的生意也清淡了。因此，这些人也就更加痛恨农会。

农会由于切实为农民谋利益，又领导农民和地主豪绅进行了初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农会的威信越来越高，影响也越来越大，农会会员很快便发展到五百多人。赤山约所属二十八个乡村，都有农民加入了农会，成立赤山约农会的时机成熟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初六），赤山约农会正式成

立。在成立大会上，五百多农会会员济济一堂，海丰中学校长黎越廷、第一高等小学校长杨嗣震，都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大会选举出黄凤麟为农会会长，成立大会开得十分成功，在农民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大会以后，各地要求参加农会的人又迅速增加，每天平均达到十人。

赤山约农会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都显现出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基层农会。加入农会的人要由本人提出申请，经谈话批准入会后发给会员证。会员证是用名片纸印制的。上面除了写农会会员的姓名，入会时间和所属的约、乡外，还印上了“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十二个字的组织原则，表示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赤山约农会发表了宣言和《农会利益》传单。《农会利益》传单实际上是赤山约农会的斗争纲领和工作范围，包括十七条：一、防止田主升租；二、防止勒索；三、防止内部竞争；四、凶年呈请减租；五、调和争端；六、救济疾病；七、救济死亡；八、救济孤老；九、救济罹灾；十、防止盗贼；十一、禁止烟赌；十二、奖励求学；十三、改良农业；十四、增进农民知识；十五、共同生产；十六、便利金融；十七、抵抗战乱。这十七条都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详尽而具体地向农民群众宣传了农会的好处，因此，很受农民的拥护，也扩大了赤山约农会的影响。

赤山约农会成立以后，除了继续开展宣传和发展农会组织以外，还举办了一些深受农民欢迎的公益事业。首先发起组织济丧会。海丰过去有个传统风俗，家里死了人，亲戚、邻居和村人都要来大吃一顿。如果丧家不这样做，就要被斥为不孝子孙，逼得丧家借高利贷也得请客。所以农村中常有因死了人而典当变卖，倾家荡产的。农会决心除掉这种陋俗，彭湃为此专门编了一首《无道

理》的歌谣：

“无道理，无道理，  
死了一个人，  
吃饱通乡里。

太不该，太不该，  
地主来讨债，  
孝子哭哀哀！

真可恼，真可恼，  
生做个穷人，  
死不当只狗。

莫烦恼，莫烦恼，  
大家合起来，  
打倒地主佬！”<sup>①</sup>

歌谣揭露这个封建性的陈规陋俗给农民带来的痛苦，明确号召“大家合起来，打倒地主佬！”农会组织的济丧会，由会员自由加入，会员的父母或本人死了，由济丧会会员每人拿出两毫钱来济丧，会员们前往致祭，行送葬的礼节，既庄重又节俭，革除了这一旧俗。

赤山约农会又在海丰城大街上办起了一间农民医药房，由热心农民运动的西医生吕楚雄主持。凡农会会员看病，凭会员证不收诊费，药费仅收一半。吕楚雄的妻子刘恩泉担任产科接生员，会

---

<sup>①</sup> 彭湃：《无道理》，《彭湃文集》第333—334页。

员生小孩免收接生费，药费也只收一半。农民医药房开办以后，许多农民的疾病得到及时的治疗，婴孩的出生也有了安全的保障。所以，农民医药房的开办，大大减轻了农民长期以来缺医少药的威胁，那种农民“一旦染病，卧床不起，田园抛荒。一家不特有冻饿之忧，而医药费不知从何措借”<sup>①</sup>的状况，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赤山约农会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斗争纲领，又兴办了对农民有利的公益事业，使农民群众更加直接地看到了农会的好处，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农民参加农会。到了十一月，加入农会的平均每天增加二十人。除了赤山约外，守望、联峰、罗山、北笏、银溪等约也陆续成立农会。赤山约的星星之火，开始迅猛地燎遍整个海丰大地，农民运动已超越了赤山约的范围而向全县发展了。

农民运动发展了，彭湃个人的处境却越来越困难。农村的封建统治者和彭湃自己的家庭，都给彭湃施加压力。以陈炯明为代表的封建势力，想把彭湃安排在陈炯明的手下当“官”。陈炯明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背叛革命，赶走了孙中山，霸占了广东地盘。一九二二年下半年，他以广州、惠州为基地，扩充实力。对于彭湃这样的“有用之才，”当然也在他们的网罗之列。海丰的土豪劣绅也企图将彭湃推到广州或惠州去，以便他们能有效地破坏农民运动。在彭湃的家里，“除了湃的子或妻之外，余的都讨厌湃的行为。”<sup>②</sup>彭湃的众多兄弟，只有三兄汉垣和五弟彭泽对彭湃表示同情，大哥应培对彭湃特别反感。由于彭湃的祖父已去世，应培当了家，便提出分家来威胁彭湃，企图借此逼迫彭湃停止参加农民运动。

然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具有坚强信念的彭湃，并没有在

---

<sup>①</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6页。

<sup>②</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0页。

这些压力面前低头。几个月来和农民一起生活和战斗，农民的痛苦景况使彭湃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李克家<sup>①</sup>说：“农民目前最痛苦的是：一、农民中自耕兼佃农约占全农户百分之三十，纯佃农约占全农户百分之五十，这两种农民约占全农户百分之八十，这些农民因为一般的物价增加率，远过于一般农产物价格的增高率；所以入不敷出，结果不得不出于变卖或负债，遂至逐渐的无产阶级化！况且海丰这数年来骤然发现了一班新兴的资产阶级，并含有政治上的势力，他们很会投机，向农民放高利债！明目张胆的掠夺！二、海丰新资产一时骤增，竞相置产，田地的价格，一时为之腾贵；田租亦同时增加，农民大受恐慌！三、官厅腐败，每每对于捐税，加抽加勒。军阀开赌，农村赌场林立，农民相率抛去工作，群起赌窟，单就赌饷而言，几乎完全取自农民的膏血！于是农民生活，益形悲惨！鬻子，自杀，逃亡，农村日趋衰落！荒废！四、地方官吏警察，往往捣乱是非，鱼肉乡民，绅士把持乡政，包揽讼词；田主恃财作胆，动辄借势敌剥；这都是目前的痛苦！”<sup>②</sup>因此，彭湃决心要为农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农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精神，也使彭湃深受教育和得到鼓舞。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农民）实是不乏聪明的人。他们对于农会的组织，都具有很热烈的情感。他们现已渐有了阶级的觉悟。他们现已渐能巩固自阶级的营垒。他们还能向别约宣传，教导别约快起。”<sup>③</sup>因此，尽管困难再多，压力再大，“湃也不愿和现在最有生机的农会及亲切可爱的农民离开

---

<sup>①</sup> 李克家：即李劳工，广东海丰人，中共党员，彭湃从事农民运动时的密友，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任海丰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1925年9月24日牺牲。

<sup>②</sup> 李克家：《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原载1924年10月16日《新琼崖评论》第19、20期合刊，《彭湃研究史料》第316页。

<sup>③</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0页。

了！”<sup>①</sup>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彭湃断然拒绝了封建统治者高官厚禄的引诱，坚决表示要继续留在海丰。大哥要分家，彭湃斩钉截铁地说：我无家可分，家里的东西都是抢农民的，应该归还给农民。分家的时候，彭湃根本不予过问。彭湃的堂兄彭承训代领回他名下分得的七十石租，彭湃便将这些田契，亲自送到佃户的家里，表示田地谁耕便归谁所有的意思。可是，佃户们都不敢接受。彭湃经过再三考虑以后，决定采取一个更加激烈的行动。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一天，彭湃请了一些农民来到龙舌埔广场，当众将属于他自己所有的田契全部烧毁，并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彭湃烧田契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海丰社会。地主豪绅们有些认为不可思议，有些则视为叛逆行为；农民群众拍手称快，对彭湃更加信服和敬重。因为田契这种文书，是封建地主阶级赖以剥削农民的凭据，千百年来，地主阶级用田契把农民束缚在一块块土地上，受他们奴役、压榨。烧掉田契，就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否定，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当然会得到农民的欢迎。对于彭湃本人来说，表明了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封建地主家庭彻底决裂，完全站到农民一边来了。

彭湃的行动，得到他的妻子蔡素屏的支持。蔡素屏在彭湃的耐心教育和影响下，对农民运动逐步有了认识。她心甘情愿地跟随彭湃，做自食其力的农民，他们吃番茨咸菜，过俭朴的农民生活。蔡素屏把繁重的家务都负担起来，使彭湃能专心致志去从事农民运动。

---

<sup>①</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0页。

彭湃的行动,也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十分钦佩,引以为榜样。彭湃的朋友林甦、余创之、陈修等都积极参加了农会的工作,许多中小学教师,也都配合农会进行宣传,图画教师李波就画过一幅农民的苦难图:帝国主义军阀、地主一层层骑在农民的头上,形象地描绘了农民所受深重的压迫和剥削<sup>①</sup>。有的知识青年还主动找彭湃了解农民运动的情况。李克家是蚕桑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在蚕桑局工作,本与彭湃素不相识。他说:“当时海丰的绅士和田主们骂彭湃的声浪,时时都打到我的耳鼓!同时一部份人如乡村农民却说道:‘农会是我们的救星!’更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和他表同情。我知道彭湃自日本回来曾一度做过海丰的劝学所长,然后才来做农民运动。……彭湃既做过官儿,怎么能够和农民接近?”<sup>②</sup>于是他决定专门去拜访彭湃,看个究竟。见面时,彭湃穿着一件短袖的破旧内衣和一条黄污的裤子,十分忙碌。李克家说明来意后,彭湃和他足足坐谈了两三个小时,彭湃不仅向李克家详述了农民的痛苦和农民运动的情况,表明了自己为解放农民而奋斗的决心,还明确地向他说明自己的信仰:“社会主义我是相信的,其中马克思派是我深表同情的。”<sup>③</sup>听了彭湃的话,李克家深受感动,决定离开蚕桑局,和彭湃一起奋斗。后来,他改名为李劳工,成为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这样,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彭湃在群众中的威望也日益提高,成了海丰公认的农民运动领袖。

---

① 李波画,现存海丰红宫纪念馆。

②③ 李克家:《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彭湃研究史料》第315—316页。

### 三、海丰总农会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赤山约农会成立以后,海丰农民运动便得到迅速的发展。

彭湃在十一月十八日给李春涛的信中作出这样的预计:“计划到了旧历年尾(一九二三年一、二月间),可成立农会八处,少亦五六处。那时候,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现将出于南部海丰一隅!”<sup>①</sup>可是,运动的发展速度出乎彭湃的意料,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海丰县城的东南西北,已经接二连三地成立了约农会。计有:

赤山农会	五六五户	二十八乡
守望农会	二一二户	五乡
银溪农会	三七四户	一〇乡
西河农会	二三〇户	六乡
北笏农会	三〇七户	五乡
罗山农会	二九五户	一〇乡
青湖农会	一五六户	四乡
平岗农会	二四五户	一一乡
守望分会	二三〇户	八乡
汀洲农会	七三户	三乡
雷峰农会	三〇户	一乡
联峰农会	四八户	一乡

共成立了十二个农会,总共九十八乡,二千七百六十户,一万

<sup>①</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0—31页。

六千五百九十人。因此，成立海丰县农会的时间大大提前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海丰总农会在海丰县城召开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出席大会的各乡代表，共有六十余人。大会代表听取了关于筹备经过的报告，讨论了农会章程，选举出农会的领导机构。

海丰总农会和各约农会的章程都是彭湃起草的。他说“湃本来是要仿照‘苏维埃’的组织法。不过我对于这种组织，尚未彻底明白。次是，一般农民智识低下，头脑简单，怕那难记的名词；所以就普照普通学生会式的章程”<sup>①</sup>。

经大会讨论通过的章程，称之为《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它在“纲领”部分，明确规定了农会的任务：“一、图农民生活之改造；二、图农业之发展；三、图农民之自治；四、图农民教育之普及。”<sup>②</sup>章程规定海丰总农会的宗旨则是“本人类合群之天性，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sup>③</sup>。

章程所宣布的农民纲领，虽然没有明显提出向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会不是反封建的农民组织，而是彭湃和农会干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斗争策略。农会根据内外有别的原则，分别提出了对外和对内的口号。对外的口号：“一，改良农业；二，增加农民智识；三，作慈善事业。”<sup>④</sup>这与农会章程公开提出的纲领是一致的，它在于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而不给反动派以任何口实，使他们无机可乘，不能公开反对农会。这个时期的县长翁桂清，是陈炯明的亲信，虽然他不赞成农会，但抓不到农会的把柄，也不敢解散或禁止农会，这就使农会的存在能有“合法”的地位，农会“得以比较自由发展”<sup>⑤</sup>。

农会提出的对内(农民)口号则有鲜明的阶级性：“一，减租；

---

①②③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3页。

④⑤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27页。

二，取消‘三下盖’；三，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sup>①</sup>；四，不给陋规与警察。”<sup>②</sup>这些口号反映了农民的阶级利益，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工具——警察，有明确的反封建剥削的内容。尽管这还仅仅是经济上的斗争，但由于它反映了农民的迫切要求，因而它就能动员农民，鼓舞农民的斗志。作为农民运动指导者的彭湃，这时已经认识到，农民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他在海丰总农会成立后不久，给李春涛的信中说：海丰农会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sup>③</sup>彭湃这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最高斗争目标是夺取政权，采用的方法是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互相促进。

但彭湃他们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减租斗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他们“对于实行减租一层，预备五年的训练之后实行”<sup>④</sup>，使农民运动能有步骤地逐渐展开。

海丰总农会的临时简章和各约的农会章程还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明确规定“会议时必三分之二出席，过半数通过方得决定。可否同数时，由主席判定，通告各乡代表，转知会员。”<sup>⑤</sup>并规定了农会会员应该遵守的纪律：“凡滥用本会名义者”、“违背本会规章者”、“不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其他不正当行为者”，都由“职员会议提出忠告或除名”<sup>⑥</sup>。

---

① “三下盖”、“伙头鸡”、“伙头鸭”、“伙头钱米”都是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三下盖”是地主收租时谷子装满租斗后，用斗盖反复连刮三次，把谷子压实，比只刮一次斗盖要多收半升甚至一升谷子；伙头鸡、鸭、米、钱是指地主下乡收租时，农民要杀鸡、鸭，要给米、钱款待。

②④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27页。

③⑤⑥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9、34、35页。

海丰总农会设计和制定了会旗、会章。会旗由红黑两色分四块对角缀成。过去，海丰农民由于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挑拨利用，分为黑旗帮和红旗帮，时常发生械斗，甚至自己的兄弟或岳父若是不同帮的话，械斗时也毫不客气地把对方杀死。农会取红布和黑布联合缀成会旗，既是象征原来被分裂为两大派的农民的团结，也还意味着要用当日械斗时的坚决、勇敢的精神来干革命，不惜流血牺牲，对付共同的敌人。彭湃精心设计的这面会旗，意在教育农民消除红黑对立的观念，增强农民的阶级团结。农会的会章是采用圆形的印章，因为农民群众仇恨压迫剥削农民的权力象征——四方形的官印，所以农会的印章也就采用不同的形状，以示区别。

海丰总农会的会所，设在处于农民进出县城的交通要道上的龙山宫，而把海丰县城大街的宏仁西药房作为通讯处，以便和各方面联系。

海丰总农会设立了文牍、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庶务、教育、卫生等九个部，并在成立会上选出了领导成员，他们由农民代表和进步知识分子中的“决心援助农民之青年”<sup>⑦</sup>组成。担任总农会副会长的杨其珊、负责庶务的林沛、负责调查的张妈安、负责财政的蓝镜清等都是农民，选为总农会会长的彭湃、担任宣传部主任的林甦、教育部主任的马焕新等则是知识分子。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在各项活动中，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是宣传部和教育部门工作，主要是由同情和支持农会的知识分子和中学生、高小学生去做的。宣传部采用的宣传方法多种多样，如：有定期讲演，由各乡订日期，宣传部派人前往宣传；有轮回宣传，到各乡去开展活动，演出话剧等节目。

---

<sup>⑦</sup>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32页。

他们还编写了不少民歌,和传统民歌结合在一起向农民宣传,如《田仔骂田公》、《山歌一唱闹嚷嚷》、《铲除迷信》等都是当时流行的民歌。宣传部的人还有意识地组织村童学唱民歌,很快使民歌传遍海丰。他们还利用乡间迎神、赛会、演戏等群众聚集的机会作临时讲演。农会的宣传部,由于发动了许多知识青年和中小學生参加,成绩十分显著,培养和锻炼了许多人材。

在教育方面,农会提出了“农民教育”的口号,教育部办起了农民学校。教农民记数、写信、珠算,写一些农具和饲料等常用字。经过“农民学校”的学习,农民有了一定的文化,既可不受地主欺骗,又能出来为农会办事,农民很赞成这种教育。农民学校的经费除农会补助部分外,采用自力更生的办法,由乡村择定某块地作学田,由教师、学生和学生家长共同负责开垦和耕种,农会供给种子、肥料,所得谷物即作为学校的经费,这样一来,不到半年,就办起了十间农民学校,四间半夜学校,使得“自是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五百余人得入学校读书了。”<sup>①</sup>

总农会的农业部的突出成绩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植树造林。农业部先作调查,了解到乡民因为缺乏资金和管理人,无法经营山林,致使海丰的山岭多是“光光的赋闲”。因此决定由农会出资,乡民出工,经营起来,将来山林的收入便作为乡民的公产。这一决定受到乡民的欢迎。一九二三年的农历三月,正是植树季节,农会组织群众在海丰西北部的潭内乡、田螺湖乡、小液乡、鸡鸟巢乡一带大种山松,并预定翌年在海丰东北部山岭造林,预计:“干燥无味的山岭,不上数年,可以变成青翠欲滴的幽林,并且气候雨量也因是而调和,而下游的水患可减其暴力。农民的收入,亦较为丰裕。”<sup>②</sup>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25页。

② 李克家《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彭湃研究史料》第318页。

总农会的仲裁部也做了大量工作。它是排解农民内部纠纷的“和事佬”，仲裁部的工作人员还很善于利用争执的有关问题对农民进行教育，揭露黑暗的社会带来的种种罪恶，提高农民觉悟，同时又据理诚恳地调解农会会员互相间的问题。仲裁部使农民减少了许多烦恼的讼累和讼费，出现争执后到农会和解者日益增多，问题得到解决，他们都很感激农会。仲裁部的人说：“我辈应当牺牲私人的利益和健康，替弱者奋斗”。“我们事业，与那假冒为善者口口声声标榜慈善事业的完全不同，我们所尽力的，不愿受弱者一声感谢”。“一切会员拿来的酬谢礼物，是我会的违禁品，极耻辱的东西！”<sup>①</sup>由此可见仲裁部以及农会工作人员的正直无私的精神面貌。

极受欢迎的农民医药房由农会卫生部主管，总农会成立后，医药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民如有发生疾病，无论门诊外诊，概不收费，取药仅收半价。该会养用马两匹，以备医生紧急之用而省病家的轿费。”<sup>②</sup>处处为农民群众的利益着想。

海丰总农会在努力为农民群众谋福利的同时，还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首先是领导农民进行了收回市权的斗争。

海丰的集市贸易繁多，有番薯市、糖市、菜脯市、地豆（即花生）市、牛圩、菜市、米市、柴市、猪仔市、草市等等，这里买卖的都是农民的出产，过去每个市的管理权都被绅士土豪或庙祝所掌握，市场收入为他们吞食。计算各市收入，每年约共有三、四千元之多。总农会经过讨论，决定从番薯市入手，掌握市场管理权。番薯市原设在灵爷庙，农会制出一把公秤，派人到番薯市去管理，遭到土豪绅士的强烈反对。于是，总农会即发出布告，通知全县农民，将番薯移

---

<sup>①②</sup> 李克家《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彭湃研究史料》第320页。

至农会附近的王爷庙摆卖。灵爷庙一带的地主为破坏农会的这一做法，出钱雇人到别处收购番薯来维持原番薯市的交易，但由于农民坚决不到灵爷庙那个地方去，土豪士绅也无可奈何。农会胜利地取得了管理番薯市及其它市场的权力。农会将管理市场的收入拨作农民医药房的经费。收回市场管理权的斗争取得胜利，显示了海丰农民在总农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力量，它不仅在经济上给土豪劣绅的打击，而且还有很大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农会在农民中的威望。

海丰总农会成立后不久，就发表了两个宣言，表明了海丰总农会的政治态度。一个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各团体的报告（即《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另一个是在同年三月十三日发出的《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

这两个宣言，揭露了黑暗的旧社会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表明了农民起来反抗，进行斗争的决心。

宣言说：“我们农民，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饥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而地主虎狼的掠夺，军警无厌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sup>①</sup>“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产出许多军阀官僚，各各占据地盘，争权夺利，战云时起，弹雨横飞！我们中国的平民，尤其是农村的农民，到处鲜不被其焚毁杀戮。”<sup>②</sup>

宣言说：“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sup>③</sup>。明确宣布：“当以摧残我们者为敌！”<sup>④</sup>

海丰总农会既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又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

---

①③ 彭湃：《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彭湃文集》第25页。

②④ 彭湃：《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彭湃文集》第27页。

既切切实实为农民群众谋利益，又不断引导农民关心政治斗争。因而深得人心，影响极大，迅速进入了极盛时期。一九二三年春节期间举行的全县农民的“新年同乐会”，是农会力量的大检阅。新年同乐会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三日（农历正月十六）举行，地点在桥东社林祖祠门前的龙舌埔的草地。那一天，人山人海，旗帜林立，鼓乐齐鸣，瑞狮起舞。鞭炮声、欢笑声汇成一片，热闹非常，计到会的农会会员有六千余人，非会员三千余人，农会干部彭湃、黄凤麟、杨其珊先后发表演说。他们说：“无产的民众们未得到革命以前，无年可乐，因为过年的时日，就是剥削者迫债的时日，我们有苦可联，而无欢可联，不过我们借这个机会来表示我们的群众有几多给敌人看看，并唤起我们的革命精神，准备杀敌”<sup>①</sup>。在当天，农会宣传部演出了话剧《二斗租》。这是一出农村悲剧，通过一位贫农受田主压迫剥削受尽欺侮和凌辱的悲惨遭遇，反映广大农民的痛苦生活。彭湃在《二斗租》里扮演主角，他那充满感情的演出，激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就连上了年纪的老农看了，也忍不住地流出眼泪。新年同乐会不但显示了农民的团结，而且进一步动员农民起来斗争。就在当天，申请参加农会并发了农会证的就有二千多人，此后入会者每日增加到百人。从此，海丰的农民运动，进入一个规模更宏大、斗争更坚决、影响更深刻的发展阶段。

#### 四、“农民万岁”

农民运动的不断发展，引起了地主阶级的恐惧和仇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27页。

农民运动开始的时候，地主豪绅是不以为意的。当农民运动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建立了农会以后，他们则感到十分震惊：“我以为他们是弄不成功的，是车大炮的，不料现在竟有其事！”<sup>①</sup>农会进行的种种斗争，都直接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阶级利益，更加使得他们坐卧不安，便想方设法破坏农会。

起初，地主豪绅是想借助反动军阀的威力来扑灭农会。他们的头面人物陈月波，诬蔑农会“共妻共产”，并以此为借口，请陈炯明的粤军师长钟景棠调动军队镇压农会。但是因孙中山率领的讨贼军一九二三年一月份东西两路进军广州，陈炯明的粤军无法抵挡。钟景棠这时刚打了败仗，手下只有一些残兵，自身难保，况且农会又人多势众，他当然不敢贸然答应。地主豪绅一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陈月波只好天天求神拜佛，求助鬼神去消灭农会。

到了一九二三年三月间，陈月波等借着地主朱墨诬告农民被法庭判决败诉的机会，煽动数百名地主豪绅，组织起“粮业维持会”来与农会相对抗。

朱墨是海丰城内的恶霸地主，平日交接官府，颇有势力，十分凶恶。这年春耕开始，他竟然无理地向公平区黄泥塘乡的佃户余坤等六人提出加租。农会会员余坤等在农会的支持下，一齐向朱墨辞田，实行“同盟非耕”。朱墨恼羞成怒，除指使打手到余坤家中进行捣乱外，还向法庭起诉，诬告余坤等交出的耕地不足丘额，是“佃灭主业”。法庭的推事张泽浦在审理此案时，慑于农会的力量，不敢袒护毫无证据的朱墨，于是判处朱墨无理，属于诬告。朱墨败诉的消息传出后，以陈月波为首的地主豪绅暴跳如雷。他们认为，地主同农民打官司，从来都是打赢的，不应有失败之理，这次朱墨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27页。

的失败，无疑是因为农民有了农会。因此，他们说：“我们如不乘机早日扑灭农会，实为将来之一大危机！”<sup>①</sup>

在陈月波、朱墨等人的煽动下，地主豪绅五百多人，随即在海丰县城的朱祖祠集合宴会。陈炯明在海丰的实际代表人、他的六叔父陈开庭、海丰县保卫团局局长以及后任海丰县长的王作新等都出席，陈月波在会上对农会及澎湃进行大肆攻击，说农会“实行共产共妻，并运动法官，欺侮地主”，澎湃“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他又为地主大鸣不平：“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陈月波还危言耸听地提出：如不及早设法对付农会，则后患无穷，不独吾辈业主会损失巨大，“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可以随便作反。”<sup>②</sup>在陈月波等人的煽动下，地主豪绅决定组织一个团体来专门对付农会，并定名为“粮业维持会”，以便名正言顺地取得官方的支持。“粮业维持会”推举陈月波为会长，王作新为副会长，陈开庭为财政。并决议每担租交纳一元为会费，全部会费可达十万元，扬言“可以用银片去埋葬”<sup>③</sup>农会。

“粮业维持会”组成以后，地主阶级和农民间的正面冲突更加尖锐。“粮业维持会”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全体列队前往法庭责问推事张泽浦，为何判处地主败诉？除了将张泽浦痛骂一顿外，并令他立即将农民收监。在地主豪绅的压力下，张泽浦便将余坤等六人拘捕下狱。

接着，“粮业维持会”又收买了打手一百多名，专门对付干预余坤案件的农会会员。“粮业维持会”一经成立，就气势汹汹，企图将农会一巴掌打下去。

<sup>①②</sup>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澎湃文集》第129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130页。

海丰总农会在彭湃的领导下，对于“粮业维持会”的挑衅给予了坚决还击。农会认为，法庭无视法律，擅自押人，本来可以依法与之论理，但法庭已受地主豪绅控制，要求法庭放人已经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同粮业维持会斗争的问题。因此，必须以实力解决。农会临时会议决定，第二天发动各乡农民举行大示威，以强力要求法庭释放被捕农民。当晚，即派出四十名农会会员，分东南西北四路奔赴各乡，发动农民参加示威。

第二天上午十时，农民大会于海丰县城龙舌埔举行，参加大会的达六千多人。彭湃主持大会，并在会上说明了举行大示威的必要。他指出：余坤等六位农友本属无罪，法庭违法将他们扣押，这不是对余坤等六人，而是针对我们海丰十余万农民。因此，这场斗争的胜负，关系到全海丰农民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彭湃还在会上表示了与农民一起战斗到底的决心，给到会农民以极大的鼓舞。农民出身的农会干部黄凤麟接着演说，他指出：现在地主已联合起来，并聚集了十余万元作经费，专门与农会对抗，我们绝不会被他们所吓倒。他们的经费是租谷中拨出来的，但租谷在我们农民手上，我们不交租，地主便没有钱来同我们作对，因此，对于地主的进攻根本不必害怕。黄凤麟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好办法：如果地主要与我们作对时，我们即宣布拆去田基，将田的四围各小坐掘去，混成一大块田地，使地主认不出了自己的田在那里，地主内部就会发生混乱。用不着我们去打地主，地主与地主之间都要打起来了。农民听了黄凤麟的讲话，一齐热烈鼓掌欢呼，斗志更加高昂。

经过动员以后，群情高涨的六千农民便冒着大雨列队前往法庭示威。地主豪绅也早就风闻农民的行动，把县公署的武装调来把守法庭，阻止农民靠近。但农民人多势众，不顾县署武装的拦

阻，理直气壮地冲进了法庭衙门。农民代表二十名，直接找法庭推事张泽浦论理。张泽浦吓得胆战心惊，在法警武装的保护下，出来迎接农民代表，殷勤递茶送烟。农民向法庭提出三个条件：一、即将被无理扣押的农民释放；二、农民出狱时法庭要燃炮鼓乐相送；三、推事应向农民道歉。农民的合理要求，张泽浦无法加以拒绝，只得向彭湃求情。张泽浦左一声“湃哥”，右一声“好朋友”，战战兢兢地向彭湃解释：扣押农民是奉陈开庭的命令办的，请彭湃劝说示威农民退回去，明天便释放被押农民。彭湃严肃地对张泽浦说：“今日不能论好朋友，因我是代表农民来说话。”<sup>①</sup>彭湃义正辞严，张泽浦非常狼狈。而示威的农民群众正忍无可忍，乃在法庭外高呼口号：“放不放赶快答复！”在六千农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张泽浦只好立即将被押农民放出来。

农民的示威斗争胜利了！当余坤等六位农友从监狱出来时，群众情绪高涨到极点，六千农民高呼：“农民万岁！”“打倒地主！”整个海丰城都震动起来。当农民队伍游行到大街时，虽然大雨滂沱，许多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表示欢迎。他们高举着用红布制成的“欢迎出狱农友”的横额，燃放鞭炮，高呼“农民万岁”口号，与农民队伍的欢呼声汇成一片，气氛十分热烈。

参加示威的农民群众回到总农会后，随即召开大会，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进行总结。彭湃在总结时，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对农民进行了一次极其生动的团结教育。彭湃首先问到会的农民：“农民千百年来都受地主绅士官厅的冤枉和压迫，总不敢出声，今天能够把六个被押的农友救出来，这是依靠谁的力量呢？”这时，农民们议论纷纷，有的回答说是彭湃，有的说是农会，有的说是耕田同志。彭湃针对农民的这些回答，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说：这次胜利的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32页。

取得，“说是农会及耕田同志的力量是不十分对的，还不至大错；说是彭湃个人的力量乃是大错特错的；彭湃如果有力量还要你们六七千人去作甚么？我相信一个彭湃，任你有天大本事是放不出农友来的”。“今天得到胜利的力量，是农会能指导六七千人的耕田佬团结在一块地方，有一致的行动。集中六七千人的力量、为一个大力量，使官僚不得不怕，不得不放出农友来！我们在今日得到这个经验，大家应该自今日起，更加团结，加紧扩大我们的势力，否则今日的胜利，会变成将来的大失败！”<sup>①</sup>彭湃的讲话，得到了与会的农民群众的赞同，使农民认识到必须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去争取斗争的胜利。彭湃的讲话也反映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彭湃更加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农民示威的胜利和余坤等六位农民的被释放，对地主豪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粮业维持会”的头头们顿时手足无措，根本无法作出反应。加上了示威胜利以后，农民到处宣传“地主无租，租在我们，地主如敢作怪，则铲去田基”等口号，使地主豪绅更不敢有任何动作。陈月波等人只好又去求神拜佛，恳求菩萨赐以良方妙策，用以对付农会。大概是作贼心虚，每次得到的都是“农会必定胜利”的“神示”。于是，陈月波便召开“粮业维持会”的大会，提出辞职。接着，被农会的浩大声势吓破了胆的陈月波，借口是“天意”，溜去香港。这样，喧嚣一时的“粮业维持会”便无形中解散了。

农民示威的胜利和“粮业维持会”的解散，乃是海丰农民群众和地主阶级在第一次面对面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在海丰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它极大地提高了农会的威信，它的影响立即“播扬到附近各县。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实有应接不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32—133页。

暇之势。”<sup>①</sup>海丰总农会的会员，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发展了一万名。

与此同时，与海丰毗邻的陆丰县的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彭湃就派林甦、余创之先后前往陆丰发动农民组织农会。海丰总农会成立的时候，陆丰也有许多农民前来参加。一九二三年春，彭湃亲自多次到陆丰，并深入到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他和农民一起车水、耕田，同农民谈心，从思想上启发农民的觉悟。在彭湃的直接指导和协助下，陆丰农民运动取得了迅速发展。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入会的农户已达八千多户。六月二十三日，在县城召开了县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陆丰县总农会，选举彭湃兼任总农会会长，郑重为副会长。

与海丰接壤的惠阳(旧称归善)，也早就引起了彭湃的重视。一九二二年十月赤山约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就亲自往惠阳的高潭区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后来，在海丰农民运动不断发展的影响下，高潭区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建立了农会，农民运动在惠阳逐步开展起来。继海丰、陆丰之后，惠阳也在筹备成立县农会。此外，紫金、五华、普宁、惠来等县的农民，也都纷纷组织起来。

在以海丰为中心的各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中，为了扩大农会的影响，推动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海丰总农会在彭湃的领导下，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并邀请陆丰、惠阳的农民参加。

“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于当天在海丰县城外的菜埔圩广场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海丰、陆丰、惠阳三县的农会会员八千多人，汕尾造船厂工人一百多人，以及海丰附城各校的师生，共达一万人。大会结束以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以“劳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32—133页。

劳动节纪念大游行”的大红旗和农会会旗为先导。接着是白布旗队，这些旗子上面写着“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打倒军阀”、“赤化”、“反对升租吊田”、“反对三下盖”、“反对伙头鸡”等大字标语。游行的群众每人手上都拿着写有警告资本家、田主和军阀的口号的小旗，一路上高呼口号，并散发了数以万计的《五一宣言》书。

《五一宣言》是彭湃起草的，它是三县农民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军阀宣战的战斗檄文。它严正地指出：“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的财富，一面渐次无限制的集中在资本家和田主的手里；反面，贫困的问题亦无限制的逐渐扩大。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sup>①</sup>因此，工人和农民要求自身的解放，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五月一日正是工农大众争取解放的日子。宣言号召三县农民：“我们要在这一天，轰轰烈烈的显示我们伟大的阶级团结，鲜明我们的阶级意识，整饬我们的先锋队伍，发挥我们的斗争精神，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协力推倒国际资本家以完成无产阶级的解放！”<sup>②</sup>

三县农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既检阅和锻炼了农民队伍，又壮大了农会的声势，对工农群众和其他各个阶层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一九二二年彭湃发动学生举行“五一”游行时“背后绝无半个工农”相比较，真有天渊之别。彭湃自己也这样说：“查劳动纪念节，在海丰连这回不过二次，而竟这样热烈，此海丰的农民运动，将愈不可思议了。”<sup>③</sup>

历史的发展正如彭湃所预料，“五一”劳动节以后，海丰、陆丰、惠阳的农民运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于是，由彭湃发起，将海

①② 彭湃《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彭湃文集》第28页。

③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41页。

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海丰、陆丰、惠阳都设立分会。

到了七月间,普宁、惠来等县也都建立了农会组织,便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各县设分会。

广东省农会是广东东部的海丰、陆丰、紫金、惠阳、惠来、普宁等县农会的联合组织,而以海丰为核心。

广东省农会选举彭湃为执行委员长。执行委员有杨其珊(农民)、马焕新(知识界)、林甦(知识界)、余创之(知识界)、蓝镜清(农民)、黄正当(农民)、李劳工(知识界)、张妈安(农民)、彭汉垣(知识界)、万维新(农民)、万清睐(农民)。在执行委员中,农民和知识分子各占其半。

省农会设立了庶务部、卫生部、财政部、仲裁部、宣传部、教育部、文牍部、调查部、农业部、交际部等十个部,分别由林朝宗、吕楚雄、杨其珊、余创之、林甦、马焕新、万维新、李劳工、彭汉垣等担任部长,部员有林务农、蓝镜清、刘恩泉(女)、张妈安等。

广东省农会所属的各县农会会员共计约二万六千八百户,按每户五人计算,达十三万四千人。其中海丰为一万二千户,六万人。据海丰县农会的调查,参加农会的农户是:自耕农占百分之二十,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佃农占百分之四十,雇农占百分之十。另外,参加农会的还有学生三十余人,教员十余人,工人五百余人,小商人三十人,失业者三百余人,船夫四百余人,小商人三十人,失业者三百余人。

由彭湃起草的广东省农会章程,是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章程的发展。它完全仿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拟制,特别是第三十二条,强调“对于各处工会、学生会及其它无产阶级团体均与之联络”<sup>①</sup>。在“会员”一章中,明确规定“不正当行为者”和“有资产者”不得加入农会<sup>②</sup>,这样就防止了地主豪绅、流氓地痞等混

进农民的阶级队伍,从而保证了农会组织的纯洁性。省农会的章程还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法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提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而在“会务”一章中,除了保持了县、约农会章程中为农民谋利益的各条外,还增加了“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和“办理农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sup>③</sup>这两条,特别值得注意。提出管理经济和组织武装,这反映出农会这一组织在向政权的形式发展,表明了以海丰农会为核心的广东省农会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会对政权的要求。广东省农会的建立,说明广东东部的农民运动在“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方面”又有了新的可喜的收获。

## 五、领导减租运动

正当以海丰为中心的广东东部地区的农民运动不断高涨的时候,发生了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军阀镇压的事件,使中国工人的第一次罢工高潮遭到了挫折。“二七”惨案教训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与农民建立联盟,并团结其他革命力量,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因此,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发展工农运动的问题。陈独秀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认为党在过去的工作中,“很少注意农民运动”<sup>④</sup>。所以,大会结束以后,陈独秀就专门邀请彭湃前往广州,“商农会事”<sup>⑤</sup>。

党中央报告中关于农运的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三大”

---

① 彭湃:《广东农会章程》《彭湃文集》第37页。

② 彭湃:《广东农会章程》《彭湃文集》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37页。

以前，共产党确实没有直接领导农民运动。而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驱者的彭湃，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所领导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广东农民运动，也只是和青年团中央取得联系，并得到了团中央的支持和领导。彭湃和当时在海丰的其他青年团员，经常写信给团中央，报告海丰农民运动的状况，要求团中央在人力、财力方面给海丰农民运动予以大力的支持。彭湃还委托挚友李春涛在假期南归探亲之机，经过上海时去找团中央负责人施复亮面谈，汇报海丰农运情况，以及时取得团中央的指导。彭湃在起草《广东省农会章程》时，也参照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正是陈独秀邀请彭湃商讨农民运动的前后，青年团中央直接批准了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地方委员会。

彭湃一年来从事农民运动的业绩，以及海丰的青年团组织同团中央的联系，陈独秀显然是了解的。这是陈独秀邀请彭湃前往广州研究农民运动问题的另一原因。

七月二十六日，彭湃已收拾好行装，准备动身赴广州会见陈独秀。“忽是日狂风大作，历二十余小时，越发越大；又继以大水。”<sup>④</sup>农民群众纷纷到农会报告灾情，请示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彭湃决定暂不赴广州，留在海丰一起投入救灾斗争。

彭湃和农会干部立即组织起救灾队，分别乘船到各灾区去抢救被洪水所困农民，慰问受灾群众，并调查灾情；他们还领导群众疏导洪水，修堤筑壑。农会在抗灾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具体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得到了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许多农民都表示：“我们生当为农会人，死当为农会鬼。”<sup>⑦</sup>

---

④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⑤⑥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46页。

⑦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41页。

这次风灾水祸，给海丰农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据总农会调查部的报告：“各灾区损失最大者为各种农产品，损失约百分之九十，牛猪等家畜损失百分之四十有奇，房屋之倒塌者约百分之四十，毁烂者百分之二十，人命之损失未有确实调查，总有五百人以至千人之数，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损失。”<sup>①</sup>

这时正是早稻收获季节，竟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怎样向地主交租，就成了农民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前往农会询问交租办法的农民络绎不绝。

海丰总农会的部分执行委员，便专门召开了一个谈话会议，初步议论农民应该怎样交租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委员意见分歧，争论十分激烈。一种意见主张“自由减租”，认为农会组织仍未十分巩固，对减租不必实行统一的规定，只可以用同地主协商的自由减租办法，由于有农会作后盾，料地主不敢过于压迫农民。另一种意见是提出“免租运动”，认为农民损失惨重，根本无法交租；即使免租斗争失败，也可以吸取教训而有利于将来农会的发展，而“自由交租”只不过是欺骗农民的好话。第三种意见折衷于两者之间，提出“减租运动”，认为“免租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过于偏激，“自由减租”则很难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因此提出减租七成，以三成交纳。这种意见获得多数人的赞成，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表决。

彭湃也赞成“减租运动”这种意见。本来，彭湃认为，“农民的解放运动，减租运动，如是因着年凶，是无甚价值的。因为恐他们或竟忘了减租的意义和我们的目的。故有价值，还是要在丰年来减租。”<sup>②</sup>但是，彭湃又清醒地看到，这次天灾，虽然给农民带来了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43页。

惨痛的损失,然而,“农村的阶级斗争骤然呈出很好的现象,阶级的对立很分明”,斗争形势是高涨的,因此,应该不失时机地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彭湃还认为,“这回对抗田主的办法,湃已有了把握。”<sup>③</sup>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彭湃决心领导海丰农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减租斗争。

八月二日(农旧六月二十日),总农会召开了全县各约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一百多人。因讨论的交租问题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参加旁听的人竟达一千多,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彭湃主持了大会,并报告了各区的受灾情况以及农会的救灾工作,还介绍了部分执行委员在讨论减租问题时的各种意见。这时,参加旁听的群众磨拳擦掌,拥护“免租运动”的主张。但是,出席大会的代表支持这一主张的不足半数,会议经过表决,最后通过了“至多三成交纳”的减租决定。

总农会执行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减租决定,立即开展了各项工作。总农会发表了《为减租而告农民书》,指出农民长期以来受地主压迫剥削,农民“要很大血本才有谷粒生出来,地主不动一脚一手便得取去一大半,我们农民亏去血本不知几多大了!也不知几世了!”在这风灾水祸、农产品完全失收的情况下,“我们须与残酷无良的地主一抗,主张至多三成交纳,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sup>④</sup>“告农民书”还将平常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凶年减租后农民仍受亏损的现实,用图表描绘出来,生动、具体地对农民进行一次“减租合理”的教育。农会派出大批宣传员到各乡村进行减租运动的宣传,使得全县农民、连小孩都会喊“至多三成交纳”的口号。农会通电全国各团体声请援助;并通函各区警察署,提出农民与地主

---

②③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46—47页。

④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46页。

发生减租纠葛，统属民事，在警察权限只可劝止，不得滥加判决及逮捕农民。农会还写信给陈炯明，告知农民受灾的苦况，意在争取陈炯明不要破坏减租运动。

减租运动的发展正如彭湃所意料：农村的阶级阵线更加分明，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一方面，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支持农会、支持减租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农民加入农会者如风起云涌，日以数百计”；甚至与陈炯明有亲族关系的一些乡村，过去以为可以依借陈炯明势力的农民，也逐步认识到陈炯明和同族的地主，都是一样地压迫剥削农民，只有农会才是真正为农民谋利益，于是也纷纷要求加入农会。工人则对农民的减租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援。商人一般是守中立，也有少数与地主合作。另一方面，地主迫租更加凶恶，和农会愈益对立。“土豪，烂崽，绅士，警察，法庭，行政衙门之官吏皆立在地主方面。”<sup>①</sup> 学生——知识分子则因多数出身于地主家庭，受家庭的压力或影响，竟然一改过去支持农会的态度，站到了反对农会的立场。这种阶级对立在农会内部也得到反映。原任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兼教育部主任的马焕新，本来是一位积极肯干的青年，热心从事农会工作，但因减租运动和他的地主家庭、地主亲属有利害冲突，竟公开反对减租，并非难农会“过激”。最后，农会只好将其会籍开除。

八月五日，海丰又一次遭到台风袭击。随着灾情的加重，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就进一步尖锐起来。农民群众在农会的领导下，对于“至多三成交纳”的减租决定，更加坚决地推行。一些有权势的豪绅地主，却决心乘此机会向农会进攻，并要扑灭农会。于是，他们由县长王作新（原粮业维持会副会长）以及林卓存（县保卫团局长）、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47页。

丘景云(前任县长)等领头,暗中联络地主豪绅,把已经销声敛迹的“粮业维持会”恢复起来。他们经过密谋策划,决心要十足收租,以示和农会对抗,还提出三个口号来攻击农会:一、农会减租对“锅头户”<sup>①</sup>太无良心;二、农会实行共产;三、农会勾结土匪。

在粮业维持会的支持下,各乡地主向农民逼租更为加紧,双方的争执和摩擦时有发生。八月十一日,县保卫团局长林卓存的侄子前往北笏仔乡收租,他狐假虎威,十分凶恶,竟然动手殴打佃户。农民忍无可忍,把他揍了一顿。他向县长王作新投诉,王作新便借题发挥,即派出县署武装二十余名,下乡围捕农民。这些武装一进村就鸣枪示威,村人惊恐,扶老携幼,纷纷逃命。这时,洪水尚未退尽,妇女小孩多跌水中叫救,状极可怜。北笏仔乡在洪水灾害后又遭到这批暴徒的洗劫,呼救之声,惨不忍闻。这些武装撤走时,还扣押了无辜农民三名,县长王作新将农民投入监牢。

北笏仔乡的事件发生后,农会立即派出代表向王作新交涉,王作新蛮不讲理,坚持一定要农民十足交租,否则没有商量的余地。地主豪绅的态度如此顽固嚣张,表明了必须经过更激烈的斗争,减租运动才能前进一步。农会虽然召开了执行委员会研究对策,也估计到农民与地主间的纠葛和冲突,今后必然更加普遍和逐渐升级,但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却估计不足,开始时还以为“不甚重要”<sup>②</sup>,只作出了一面由农会筹款救济入狱者及其家属,一面依据法律诉诸法庭解决的消极决议,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对付地主豪绅的破坏活动。会议还决定于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初四)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动员全县农民支持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坚持减租斗争。

---

<sup>①</sup> 锅头户,指在家坐食的人家或地主的后裔,他们只会穿长衣保全门面,专靠收租过活。当地称他们为锅头户。

<sup>②</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50页。

地主豪绅知道召开农民大会的消息后，便从多方面进行破坏。王作新以县长名义，四处张贴布告，胡说八月十五日“匪首彭湃希图造反，四乡人民勿为所愚而自招重祸”<sup>①</sup>，借以威胁、恐吓准备赴会的农民。又派出警察把守通往县城的各个路口，阻止农民前往县城参加大会。当各乡前往参加开会的农民撕掉了布告，赶走了警察以后，王作新恼羞成怒，凶相毕露。他马上集中警察等反动武装共六十多名，分守四个城门，并在县署门首构筑战壕，准备作战。又急电汕尾的粤军师长钟景棠派兵前来镇压，钟景棠部一百多名官兵，急速开向县城。

各乡的农民群众的斗争意志仍然十分坚强，他们冲破了层层阻挠，到达县城参加大会的达二万多人。农民人多势众，县城的地主豪绅当时震惊万分，纷纷避匿，许多店铺也都关上大门。中午十二时，大会如期举行。彭湃、李劳工、林甦等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或演说。他们介绍了海丰风水灾后农民的惨状及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压迫，提出必须坚持“至多三成交纳”的决定，“说至农民痛苦，演说者与听众皆相感泣”<sup>②</sup>，情绪异常激昂，高呼“农民万岁”口号，声如雷震。农民大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然而，农会干部只满足于这种轰轰烈烈的动员，对于敌人蓄谋已久的进攻却缺乏足够的警惕。本来，当钟景棠的部队向县城挺进时，农会已接得报告，但又以为只是召开大会，既不是请愿，又不要求县署放人，料钟景棠、王作新不会与农会为敌。农民大会散会以后，没有作出应变准备和进一步的行动部署。农会干部的思想麻痹状态被地主豪绅侦悉以后，王作新连夜召开了士绅会议，作出了乘虚向农会进攻，一举将农会扑灭，以根除后患的决定，并秘密

---

①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50页。

地布置了武装镇压的行动。

在这个紧急关头，农会干部还是毫无警觉，正如彭湃后来所说：“我们实在是没有准备作战，也料不到如何危险”<sup>①</sup>。当麻痹大意的农会干部正在睡大觉的时候，经过地主豪绅的精心策划，一场对农民运动实行武装镇压的暴行终于开始了。

八月十六日（农历七月初五）拂晓，由王作新的弟弟王益三率领县里反动武装，会同钟景棠部军队以及警察、保卫团勇等三百多人，分两路包围并袭击总农会会所。顿时枪声卜卜，弹如雨下。农会干部从枪声中惊醒过来，但已无法抵御，只得从屋顶上逃走。未能脱险的农会干部虽然用尖串或拳术与敌兵搏斗，但寡不敌众，赤手空拳，终于无能为力，杨其珊、洪庭惠、黄凤麟等二十五人被捕。住在得趣书室的彭湃、李劳工、林甦等闻枪声后迅速逃走，才免于难。

地主武装占领农会以后，将农会所有文卷、物品、现款以及马匹等洗劫一空，然后将农会会所封闭。同时，县署又通告全县，解散海丰农会，通缉农会领导人彭湃、林甦、余创之等。十七日早晨，又查禁农民医药房，缉拿医生吕楚雄，要其交出所谓农会存款，以充军饷。还派出警兵，四出下乡催迫农民十足交租，并查缴农会会员证章。杨其珊等二十五人被押至县署时，即由王作新开堂审讯。在审讯过程中，王作新硬给农会和彭湃加上了“造反”、“共产”、“公妻”等罪名，并对杨其珊等人施以严刑拷打，最后加以镣铐，投入狱中。

地主豪绅在这场镇压农民运动的罪恶行径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使海丰农民和农会遭到了严重的损失。为了纪念这一流血日子，海丰农民当时称之为“七五农潮”。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51页。

彭湃领导的减租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气馁，他及时总结了失败的沉痛教训，领导海丰农民投入了新的战斗。

## 六、“智斗”陈炯明

彭湃和林甦、彭汉垣、李劳工等农会干部于八月十六日凌晨（农历七月初五）脱险以后，陆续来到大嶂山边的小庵寺集会。寺里的道士吕成善，一向同情农会，对遭难的农会干部给予热情接待。这里地势较为隐蔽，四周的乡村都是热心农会的农民，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彭湃和农会干部便决定在这里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应变措施。

由于减租运动被镇压，农会被封闭，许多农会干部遭逮捕下狱，所有脱险到达这里的农会干部都非常愤慨，一致表示誓要与凶恶的地主豪绅斗争到底。但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斗争呢？在讨论开始时却出现了分歧。彭湃起初认为，地主豪绅以武力来镇压农会，我们也应当以武力对付，“主张招集大队农民起来反攻，痛快淋漓的混杀一场之后再作道理！”<sup>①</sup>彭汉垣则认为，敌人掌握了军队、警察，如果公开以武力对抗，最后吃亏的还是农民，因此，他主张智取，不同意硬拼。

会议经过充分的研讨，最后决定了先用智取，不成功才实行暴动的方针来同地主豪绅斗争。农会干部们认为，陈炯明是海丰地主豪绅的总后台，利用陈炯明来威慑王作新、钟景棠等当权人物，争取释放被捕农民和恢复农会，不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陈炯明是不赞成农会的，但他想利用农会，巩固他在东江的地盘。当年三月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52页。

陈炯明在香港的一次谈话中表示过很佩服海丰农会，在一些人面前说过彭湃如何能干，还邀请彭湃到香港与他会见，并且声称他也同意减租等等。陈炯明的这些言行，虽不能完全相信，但最少可以说明他还不愿意或不敢于公开与农会为敌。因此，许多农会干部都主张，应该由彭湃去会见陈炯明，向他说明王作新等镇压减租运动，拘捕农民，解散农会这种做法，是很不得民心的。从而提出农会要求的四项条件：“（一）即时释放被捕农民；（二）减租照农会决定收纳；（三）恢复农会；（四）惩办粮业维持会王作新等。”<sup>①</sup>如果陈炯明能够办到前两条，农会就取得最基本的胜利；如果连第一、二条都办不到，就发起暴动，以武力来同地主豪绅对抗。会议最后决定：彭湃和林甦、蓝陈润即赴老隆，同陈炯明进行合法斗争；彭汉垣和其他农会干部留在海丰，作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下午二时，彭湃等三人从小庵寺出发，前往陈炯明的司令部所在地的老隆。从海丰到老隆约五百华里，沿途都是高山，步行一般要六、七天才能到达。幸而所经地区的农民都同情农会，对彭湃等给予了热情帮助。彭湃等经过了多天的跋涉，于八月二十三日比较顺利地到达老隆。

彭湃等到了老隆，即以海丰农民代表的资格去见陈炯明，于是同陈炯明进行了一场说理斗争。下面是彭湃和陈炯明谈话的片断记录：

“陈炯明问：‘你们弄出了乱子呢！’

我们：‘乱子不是我们弄的，是他们（指王作新、钟景棠）弄的，陈先生你知道海丰的风灾水祸大到怎样呢？农民苦到怎样呢？’

陈：‘大到怎样，苦到怎样，也是应当照旧例主佃来分割，断不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53页。

能任你们提出三成就三成，难道你是皇帝吗？’

我们：‘我们不是皇帝，相信你也不是皇帝，地主官厅也不是皇帝，为什么满清皇帝的旧例，陈先生都可以把它推翻了，而不是皇帝的分租旧例，我们不可以推翻呢？我们推翻凶年主佃分割的旧例，是很有道理的，不是糊涂的！我先问先生，业主和田佃是不是要很相爱的才对呢？是不是业主出田，佃户出种的本钱，合起来，好象商家合股去做生意的一样呢？’

陈道：‘这自然！’

我们：‘但是生意做去，亏本或遇灾难的时候，是不是要两相吃亏才公道呢？譬如甲乙两个股东，阿甲不管生意亏本不亏本，总是要取回自己的原额本钱，且要迫阿乙还他的利；阿乙此时本钱既已损失，又要还阿甲的利息，这岂不是不公平到极点吗？’

陈：‘这是对的！’

我们：‘地主一次出钱买一丘田，交给农民去耕，农民就年年春春要用许多种子、肥料、农具、工食的费用，才会有谷生出来；所以地主以田为本钱，农民以种子、肥料等耕田必要的东西为本钱，正如股东做生意一样，但是遇着风灾水祸的时候，地主的田——股本是不会消灭的，农民投在地面的股本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农民应向地主算账，叫地主补回他的损失，不应该由地主倒来迫农民赔偿他的利息，陈先生所主张的分割，就是把农民残余的血本让一半给地主做利息，况兼海丰此次农民罹灾，为海丰开天辟地以来未曾见过的，要主张农民和地主分割，不啻叫农民去死个净尽罢了！所以农会主张三成缴纳，还是昧着良心与地主要协的，所以农民大会把它加上二个‘至多’的字，说：‘至多三成交纳’，这是革去几千年来地主苛刻农民的恶例，和先生赶走满清皇帝同一个道理！’

最骄傲最自恃聪明的陈炯明，听了这些话也点点头，说：‘是

是！’

陈继着说：‘喂！他们说你们在海丰造反，搜出很多尖刀、铁串和旗帜等，有其事吗？’

我们：‘你看在近今科学如此进步的时候，尖刀铁串等可以造反吗？农会有刀也有铁串，可不是造反，是来自卫的。刀固是可以杀人，同时也可以保护人；农会有刀，非但没有杀人，更没有造反！’”<sup>①</sup>

接着，陈炯明拿钟景棠、王作新污蔑农会造反的电报给彭湃看。

“我们看后说：‘陈先生信不信呢？’

陈：‘这我当然是不信的。’”<sup>②</sup>

在彭湃的说理斗争下，陈炯明当然没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彭湃便趁此时机，向陈炯明提出了如前述的四项条件。陈炯明经过再三推诿和解释后，只答应办理第一条，并立即起草了这样的电报稿：

“海丰王县长览：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农会提出三成交纳，也不能一律如此；应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查邑中最公平者为吕铁槎先生，可请其办理，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粮业维持会为要，炯明。”<sup>③</sup>

彭湃等看了电报稿后，便在“函知”二字下面加上“农会收”三字后发出，这样，电报便意味着陈炯明承认农会的合法存在。彭湃清楚地知道，陈炯明的这个电报是作用不大的：但由陈炯明说出了

<sup>①②</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59—160页。

<sup>③</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62页。

被捕农民“应即省释”以及“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等话，对于今后争取释放被捕农民是有利的。因而可以说这场说理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彭湃等“也认为满意”<sup>①</sup>。

第二天，彭湃便离开老隆，取道五华、潮安返回海丰。

## 七、为恢复农会而奋斗

九月初，彭湃秘密回到海丰。

当他和留在海丰的农会干部交换了情况以后，证实他对陈炯明的电报作用不大的估计是基本正确的。电报虽然由于《陆安日报》的两位排印工人，冲破王作新一伙人的控制而发表了出来，但结果是这两名工人被开除，王作新对这份要释放被捕农民的电报仍然置之不理。而且，王作新和地主豪绅们更加变本加厉，横行霸道。他们到处欺压农民，敲诈勒索；对被捕农民加重刑罚，并纵容他的兄弟王益三吞没农会送入监内的财物，以致在狱的农会干部“无饭可食，无钱可用”。海丰依然是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彭湃和农会干部立即重新研究了对策。一致认为，要争取被捕农民获得释放和恢复农会，不能仅仅是指望于利用陈炯明，还必须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特别是要壮大农会本身的力量和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援。于是决定，彭汉垣等留在海丰的农会干部，继续秘密地与各地区的农会保持联系，积聚力量，以待时机。彭湃等立即前往香港，争取陈炯明在香港的几个亲信以及社会力量支持农会，并发动捐款以救济狱中农民。

按照这个决定，彭湃和所有农会干部，都全力以赴地从各方面进行工作，为恢复农会、释放被捕农民而斗争。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62页。

还在彭湃由老隆返回海丰的途中，当他抵达潮安的时候，就请刚由北京南归探亲度假的李春涛起草了一篇《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宣言”揭露了王作新和地主豪绅，趁海丰风灾水祸之机压迫农民、摧残农会的罪行，呼吁各界人士给海丰农民以援助。“宣言”很快便寄发各地，并由李春涛返京时经上海交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复亮，它对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援，起了一定的作用。

遵照农会关于赴香港工作的决定，彭湃立刻和李劳工离开海丰，经汕头到达香港，随即在香港开展了紧张的工作。

彭湃到香港以后，立即寄信向团中央报告。他在九月七日写给团中央负责人施复亮的信中，简要叙述了海丰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所采取的补救办法。稍后，他又给团中央写了《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的报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海丰农会成立一年多来的状况。

为了援救狱中农友，进行了募捐，但因人地生疏，开始时碰到很大的困难。后来，他和李劳工到人力车工人中宣传，“香港人力车大多数是海丰来的失业农民，其中也大半是农会的农友”。因为“他们对于农会及对于在狱同志极为关心”，对彭湃亦“非常亲切”。<sup>①</sup>于是彭湃便在人力车夫中发起募捐，最后大约捐了八十多元，寄回海丰作救济入狱农民之用。

正当彭湃在香港的时候，以海丰的地主豪绅作后台的《香港新闻报》，竟然连续刊登文章攻击海丰农民运动，与王作新等镇压农民运动相呼应。彭湃他们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对此进行批驳。彭湃的挚友李春涛在北京获讯后，在赭庐写下了长达二万三千字的论文《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发表于中国大学的校刊《晨光》，详细介绍彭湃的事迹，捍卫海丰农民运动，有力地驳斥了反动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66页。

舆论对海丰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

彭湃在香港逗留的一个多月中,主要和陈炯明的亲信林树声、黄毅等联系,争取他们同情或支持农会,然后通过他们去做陈炯明及海丰的上层人士的工作。这项活动收到一定的成效,林树声和黄毅都对彭湃的工作开展给予不少的方便和帮助。正是接受他们的建议,彭湃才离开香港再一次前赴老隆,要求陈炯明实现他同意释放被捕农民的诺言。

十月底,彭湃经汕头抵达老隆。陈炯明对彭湃虽然还是热情接待,但对释放被捕农民,却以强调困难来搪塞。陈炯明敷衍的态度,使彭湃进一步看清了陈炯明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在实质问题上,陈炯明是不会支持农民运动的。因此,只能利用陈炯明在海丰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中的影响,从中寻找出有利于恢复农会和释放被捕农民的办法。按照这样的斗争策略,彭湃随同陈炯明一起抵达汕头。

彭湃同在汕头的海丰农会干部商议了下一步的行动。参加会议的农会干部都同意了彭湃对陈炯明的斗争策略,并强调一定要利用陈炯明的威信,这对于震慑海丰的地主豪绅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彭湃则强调了必须进一步发展农会组织,壮大农会的声势,这才是同地主豪绅斗争的最根本的方法。这两个方面,就成了彭湃在这段期间的工作重心。

为了利用陈炯明,向海丰以至潮汕的上层人士显示陈炯明对于彭湃的“器重”,彭湃同意随同陈炯明前往惠州,并搬进陈炯明的总司令部居住。到了陈炯明离汕赴惠的前夕,彭湃才以母亲病危为名离开了陈炯明,继续留在汕头。

十一月中下旬,彭湃在汕头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其目的:一是联络各县农会来援助海丰农民;二是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

他首先在汕头新马路荣庆里设筹备处，然后前往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进行联络和发动，随后又联合五华的农会。这样，加入惠潮梅农会的就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十县，声势颇为浩大。

由于彭湃表面上同陈炯明的“密切”关系，潮汕的上层人士又对彭湃比较敬重，这就为惠潮梅农会工作的开展扫除了不少的阻力。彭湃一方面向潮梅总指挥部立案，使惠潮梅农会取得了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将农会的发展情况电告陈炯明。不久陈炯明自惠州来电，对组织惠潮梅农会表示“非常赞同”。尽管陈炯明的内心是反对农会的，但他的电报中所做的表面文章，在陈炯明的势力范围内，显然是有利于农会的发展的。于是，农会决定将这封电报在报纸上发表。陈炯明的电报的发表，在潮汕的上层人士中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认为“陈老总”也支持农会，自己当然也要紧紧跟上。彭湃他们分析了那帮上层人士的心理，充分掌握了这一时机，在潮汕上层人士中开展募捐，很快便认捐了近一千元（实际收到五、六百元），使筹款救济在狱农友这一目的初步得到实现。

惠潮梅农会建立后，彭湃很快就将情况向团中央作了汇报，以便取得团中央的支持和指导。十二月一日和十九日，彭湃先后两次给团中央写信，迫切要求团中央对工作予以指导，并希交流各地的工作情况；还寄出“救济海丰在狱农民劝捐簿”，请协助募捐。

鉴于利用陈炯明的“声望”已在潮汕上层人士中产生了初步的效果，彭湃又将农会发展如果迅速、农民运动如何进步等情况，频频电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到潮梅，竟达十余县，会员有数十万人，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彭湃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一方面，陈炯明想利用彭湃和农会的力量，以巩固自己在潮汕的统治地位；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彭湃和农会不易驾驭，发展

到尾大不掉时，反而酿成后患。陈炯明思想上的这种矛盾，使他在开始时曾多次致电彭湃，对惠潮梅农会表示支持；但后来又想把彭湃调离潮汕，企图阻挠农民运动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十二月中旬发给彭湃的一封五六百字的长电中，说什么现在中国是“武装革命之时期”主要靠小军阀的力量搞“联省自治”，发展群众运动尚非其时；并要彭湃立即前往惠州协助工作。陈炯明的长电，实在已暴露了他害怕农民运动的面目，也为他后来终于公开镇压农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由于陈炯明多次来电催促彭湃急赴惠州，彭湃不得不决定离开潮汕，先返海丰，然后待机前往惠州。彭湃和农会干部认为，彭湃返回海丰争取释放被捕农民和恢复农会的时机已较为成熟。因为在陈炯明统治的地区，人们都知道了彭湃是受陈炯明“器重”的人物，这回又是“陈老总”屡次电催要彭湃赴惠州，无疑更会引起海丰上层人士的“敬重”，这就大大地有利于工作的展开。还因为惠潮梅农会已经成立并得到发展，声势日益浩大，汕头的报纸又时时刊登这方面的消息；农会势力的强大，也会迫使海丰上层人士对彭湃“另眼相看”的。

十二月下旬，彭湃和一些农会干部公开回到海丰。王作新关于通缉彭湃等人的命令实际成了一纸空文。这是彭湃所制定的斗争策略的胜利，也是农民运动发展、农会进一步壮大的成果。

彭湃回到海丰后，更广泛地宣传惠潮梅农会的发展，以及陈炯明屡次电催彭湃赴惠这两件事，使海丰的上层人士感到畏惧。连王作新和钟景棠都不得不说什么：“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农会本是好的”等一类话，借以拉拢彭湃和农会。钟景棠还特意派人邀请彭湃前往会见。在谈话中，钟景棠就捕逮农民、解散农会事，为自己辩解，并将责任推给王作新。彭湃也就利用钟

景棠与王作新因争一笔款项而产生的矛盾，促使钟景棠同意释放被捕农民。

彭湃回到海丰的时候，海丰的农民运动已经在秘密活动中逐步恢复并取得显著的发展。第二区的农民，还以“同盟非耕”的方法同地主进行斗争，“卒至使地主发还往日批田的押金，及减轻明年的租额。”<sup>①</sup>斗争的胜利使农会的影响扩大，在农会“解散”期间，暗中加入农会仍达三百余人。所以，彭湃回来的消息一传开，农民要求恢复农会的空气顿时浓厚起来。

整个形势都对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是，彭湃决定留在海丰，以主要力量来做恢复农会的工作，对于敷衍陈炯明的惠州之行，便降到了次要地位。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旬，在彭湃主持下，召开了县城附近各乡农会代表会议。彭湃报告了农会“解散”后几个月来的斗争经过，并向代表们转达了被捕农民不日便可出狱的消息。彭湃在总结这段期间的斗争经验时指出：在狱同志不日可以出狱，“并不是受陈炯明的帮助，也不是钟景棠、王作新的好心，更不是彭湃等个人的本领，因为如果个人有本领，早早出狱，不待今日了。这完全是农民用本身力量，帮助自己，救出自己。因为农民若不是靠自己力量，而向别方面去求，是求不到的。这次惠潮梅十余县的农会代表，在汕头成立了惠潮梅农会，虽然内面不是十分好，但亦可以吓得人，所以陈炯明、钟景棠、王作新一辈知道农会愈解散，愈发展，愈压迫而愈长大，一方面固然是用温良政策来利用我们，在他方面确是怕我们农民的大联合！所以陈炯明也要来对我们低个头，说句好话！这就是一个最明白的原因。所以我们得到这个经验，农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74页。

民运动非扩大它，普遍到全广东不可。单单是海丰一个农会，天样好也是无用的，将来更加把它发达到全国全世界去！”<sup>①</sup>彭湃的这段总结，简明地概括了几个月的斗争过程，它给农民代表予以团结起来力量大的教育，又鼓舞他们为进一步发展农会组织而积极战斗。同时，也反映了彭湃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表明了彭湃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前进。

一月下旬，狱中农友正式获准释放。钟景棠在通知前往保领的信中，称彭湃为农会总会长，说明了钟景棠不得不承认农会的存在。彭湃发动县城附近各乡的农民，集合欢迎出狱的农友。被捕农友的获释，成了一次庆祝胜利的示威和动员，更加坚定了农民争取恢复农会的斗争信心。

几天以后，陈炯明因其弟陈炯光病故，从惠州回海丰，料理丧事。彭湃利用陈炯明回海丰这个偶然的时机，把恢复农会的斗争推前一步。经过农会干部临时会议研究，决定发动农民欢迎陈炯明。当然也是对陈炯明的一次示威，使陈炯明正式批准恢复农会。

陈炯明返抵海丰那一天，彭湃等农会干部带领了只有五十人的队伍，前往离县城二十里的新寮桥欢迎陈炯明。因为农民去欢迎陈炯明是不太高兴的，所以没有人来，农会干部便用燃鞭炮唱歌等办法吸引群众，临时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少约五六百人。陈炯明到达新寮桥时，看见几百人持着小旗欢迎，十分高兴。杨其珊代表农会致欢迎词，说这六百多人是农民代表，专程前来欢迎“总座”回梓，请准许成立农会。陈炯明即说：“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sup>②</sup>这个近乎滑稽的欢迎仪式，也是彭湃为恢复农会而斗争过程中的一个胜利的小插曲。

---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74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76页。

接着，彭湃和农会干部，抓紧了陈炯明准许立会这一有利时机，分头到各地去同农会干部及会员联系，准备首先恢复各乡、各约的农会，然后恢复海丰总农会。

经过彭湃等人的努力，二月八日，捷胜约农会召开恢复大会，彭湃前往参加并发表了演说。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还举行示威游行。十分明显，恢复农会的胜利指日可待了。

海丰的地主豪绅当然不会罢休，彭湃等为恢复农会而斗争的过程，也是他们为阻止农会恢复、并进一步扼杀农会而活动的过程。他们派人去向陈炯明陈说利害，要陈炯明下令解散农会。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用了很大气力去做陈炯明的母亲的工作，要陈母支持解散农会。他们还到处宣传农会与共产党、国民党有关系，还造谣说，农会组织暗杀团等等，以此坚定陈炯明解散农会的决心。总之，地主豪绅们为了破坏农民运动，真是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

二月十日，一场新的尖锐的斗争正式展开。这一天，彭湃在陈炯明的私宅博约山房，同地主豪绅的头面人物，就农会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彭湃当面驳斥了地主豪绅们对农会的攻击和污蔑，重申遭到风灾水祸的农民要求减租的合理性，揭露地主豪绅们趁灾害压迫农民的罪恶行径。彭湃还向地主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海丰农民已经觉悟起来，谁要继续对他们进行无休止的压迫和剥削，那是决不会得逞的！彭湃这次“舌战”，使“群丑”们皆理屈词穷，只得垂头丧气地一一溜走了。

彭湃“舌战群丑”以后，农民和地主间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地主豪绅更加频繁地去劝说陈炯明，王作新甚至还以不到县署办公来要挟。彭湃和农会干部则是排除一切干扰，一股劲地到各地做好恢复农会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各乡约的农会都已大体上恢复了,海丰总农会定于三月十七日(农历二月十三)举行农会恢复大会,并唱戏三天以示庆祝。全县农民兴高彩烈,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然而,在地主豪绅的催促下,陈炯明下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决心,他的狰狞面目终于彻底暴露了。三月十六日,就在海丰总农会恢复大会的前一天,陈炯明召见了彭湃,以不准在县城唱戏为借口,强力阻止农会恢复大会的举行。有着几十万农民支持的彭湃,当然不会轻易地在陈炯明面前屈服退让。谈判终于破裂。陈炯明随即面谕王作新解散农会。

三月二十一日,王作新贴出布告,宣布取缔农会。农会再一次被迫转入秘密状态。三月二十六日,彭湃秘密离开海丰前往汕头,海丰农会工作交由郑志云、彭汉垣等负责。海丰及广东东部地区的农民运动在陈炯明的镇压下,暂时转入低潮时期。

## 第三章 领导广东农民运动

### 一、创建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九二三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次大会，宣告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次大会后，国民党中央便设立了农民部和工人部，作为开展工农运动的领导机构。共产党员林柏渠被任命为农民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左派领袖廖仲恺被任命为工人部长。

这时，彭湃还在海丰，正在领导农民为恢复农会而斗争。稍后，由于海丰农会再次被陈炯明下令解散，彭湃被迫于三月二十六日离开海丰到达汕头。四月一日从汕头转赴香港，拟经广州再去上海。当他在香港停留期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派专人到香港，邀请彭湃立即到广州接受新的任务。<sup>①</sup>

四月上旬，彭湃抵达广州。在这里，他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身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sup>②</sup>，并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出任国民党中央

---

<sup>①</sup> 陈卓凡《关于彭湃同志留日时的忆述》。

农民部秘书。早期的农民部,组织机构简单,只设部长、秘书、助理各一人,后来才逐渐扩大。彭湃任秘书后不久,部长林柏渠因赴汉口工作而辞职,由彭素民继任部长。彭素民因病长期住院,因而,农民部的实际工作都由彭湃负责处理。

---

② 关于彭湃入党的时间问题,目前存在几种不同说法,至今仍未能找到原始档案材料,以便进一步考证核实。我们根据现有材料,认为彭湃在1924年到达广州后,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较为符合历史事实。一,彭湃本人的书信:1923年9月给文亮(即施复亮,当时是团中央负责人)的信说:“□□的共产党我不大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12月给文亮的信说:“《先驱》如有出版,请寄来汕头。吾团的消息,也寄来此处。”彭湃是以团员身份向团中央负责人写信。二,1923年11月《中央局报告》中指出:“新起的农民运动,一在广东的惠州,一在湖南之衡山。……两处都是S.Y.同志在那里指挥。”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关于《广东农民运动报告》中指出:“海丰农运是农民自动起来组织的,那时候,C.Y.也是刚在广东开始,很注意海丰的农运,同时,海丰农民亦有接近我们指挥,信仰共产主义倾向。在1923年到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我们更加注意农民运动,但那个时候的工作,还是在C.Y.方面。”这两个文件都说明海丰农民运动是C.Y.在那里指挥。三,党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大革命初期曾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在1930年8月30日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的《彭杨颜那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中说:“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具体说明彭湃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时还未入党。四,罗绮园(笔名易元,曾在中共广东区委农委担任领导工作)1930年8月30日在《北方红旗》发表《彭湃同志传略》中说:“彭湃同志加入共产党是1924年,在未加入之前,他在海丰已先有贫民党的组织,自从海丰农会被陈炯明解散,他只身到广州始介绍入党。”1930年8月30日《红旗日报》刊载《彭湃杨殷两同志事略》,关于彭湃入党时期也肯定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担重要工作,领导各地农民和地主斗争。”林务农(彭湃组织的广东省农会宣传部部员、曾任海陆丰团地委书记)认为:彭湃未入党前先入团,这是事实。当时,一般是先入团后入党的。彭湃1921年5月间回到上海,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直到1924年4月到了广州,才正式加入党的。这个说法较为可靠。五,陈其尤(致公党中央主席)1963年曾谈到“在解放后有一次我和谭平山同志谈及彭时,谭说彭入党是他介绍的。”陈卓凡(彭湃留学日本时同学,赤心社成员)1963年曾说:我在日本时彭湃曾写信给我们,其中有“我到香港后,在大公司门口徘徊了几天,现在已进入大公司了。”当时我和林孔昭估计他是进了党。据说当时党中央谭平山派黎澍廷等到香港欢迎彭湃到广州,是由谭平山介绍入党的。

彭湃担负了农民部的工作以后，孙中山曾专门邀请彭湃，一起商讨农民的政策以及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sup>①</sup>。关于这次商讨的内容，目前还没有看到进一步的具体资料。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和廖仲恺同彭湃之间，对于农民问题的观点是有差异的。孙中山和廖仲恺都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国民党有责任去领导农民运动和解除农民疾苦。所以，他们也注意到农民的土地问题，还在国民党“一大”筹备期间，就曾讨论过制定一个“土地法”，后来因孙中山经不起国民党右派的压力而没有实行。国民党“一大”以后，他们主张“扶助农工”，就是把工人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投进国民革命，才能使革命获得成功。显然，这同彭湃把农民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革命成功后的主人翁的观点存在差距。但是，由于有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这个共同点，所以双方都能为开展农民运动而努力奋斗。

彭湃在农民部工作初期，农民部处于开创阶段，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日常事务的处理，几乎都集中在彭湃身上。但彭湃并没有因这些具体事务而分散自己的精力，他把工作重心放在制定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文件，以及促进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方面，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注意广宁的农民运动。

广宁是广东全省开展农民运动较早的县份之一。四月上旬，共产党员周其鉴<sup>②</sup>等在广州联络了一批油业工会的职员和工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广宁进行宣传和组织农民的工作。他们首先在江屯设立广宁农会办事处，并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公函要求广宁县

---

<sup>①</sup> 苏联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6页。

<sup>②</sup> 周其鉴(1893—1928)，广东省广宁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东农民运动领袖之一，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1928年2月1日在清远县被捕牺牲。

长李济源为农会立案，李济源借口只受理省署的公函而拒绝立案。彭湃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致函周其鉴，嘱咐他们“先照手续具呈县署，立不立案由他，此间自当设法”<sup>①</sup>。在彭湃的努力下，广东省署接连两次去电催促李济源，责成他应该为农会立案，但李济源仍然置之不理。

为了解决广宁问题，五月中旬，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到达广宁，要求会见李济源，但遭拒绝。于是，彭湃便亲自深入农村，直接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他运用了早年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农民讲解“耕田亏本”、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反抗地主的经济斗争；他又分析了“地主寡不敌众”的状况，以增强农民的斗争信心；并指出必须加强团结，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由于彭湃“这样的宣传，结果在两星期期间，广宁农会会员，由四千多家增至七千家了。”而且，彭湃在广宁的宣传发动工作，“一来使职员在宣传上多了一些材料，二来绅富也不敢小觑农会。”<sup>②</sup>彭湃在广宁虽然只住了十天，但对广宁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彭湃回到广州以后，随即参加了于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一日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大会通过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等十四个决议案，为农民运动的发展制定了具体、详尽的措施。决议指出，在已有农会组织的广宁、鹤山、花县、顺德、东莞等县，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农会组织；还没有农会组织的县，应组织城镇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决议认为，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各县的农民运动，应

---

① 周其鉴：《广东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农民运动丛书》第2种（下同）第7页。

② 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农民运动丛书》第2种，第13页。

打起国民党的旗帜，公开地进行；农会组织起来后，可以选择其中最具有觉悟的分子成立十人团，作为农会的核心。决议要求各地农会并尽快建立农民自卫军。决议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海丰有伟大的农会组织，现虽为反动势力所压迫，但因应付得法，基础从未有损坏，实为将来东江农民运动之中心。”<sup>①</sup>这次大会选出了青年团广东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彭湃当选为执行委员，并于六月九日召开的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被推为农工委员。这次执委会议还讨论了各委员目前的工作重点，对农工部提出的任务是：“要计划各地青年农工运动及调查农村实际状况。”<sup>②</sup>

青年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于当时正在发展中的广东农民运动，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彭湃领导广东农民运动的工作，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大会以后，彭湃按照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制定各项计划以及有关政策，并开始参预工人运动的领导。彭湃除了亲自到各行业的工会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以外，还专门派李劳工到人力车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彭湃和李劳工的直接领导下，六月二十七日，成立了人力车工人俱乐部和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不久以后，又成立了人力车工人第二协作社<sup>③</sup>。人力车工人俱乐部和人力车工人协作社，在以后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农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利用反动武装“民团”和地痞流氓，围攻农会，胁迫会员，妄图阻止正在兴

---

① 《社会主义青年团粤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② 《报告第一号》《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第91页。

③ 1924年6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农工旬刊》第6期。

起的农民运动的前进。

六月十日,广宁发生了大地主江耀南等指使民团捣毁江屯农会的事件;接着,潭埗大地主江汉英又率领民团焚烧潭埗农会并殴打农会职员。彭湃获悉这些情况以后,立即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汇报,争取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和广东革命政府对广宁农民的支持。同时,又和青年团广东区委其他同志进行了研究,由区委发动工人、学生等各种群众团体,发出支援广宁农民的通电或宣言;并派出工人、学生代表赴广宁慰问受迫害的农民,还以新学生社<sup>①</sup>等工学界名义在广宁散发传单,激励农民的斗志。

与此同时,花县也发生了土豪劣绅雇用流氓围攻农会办事处的事情。彭湃按照青年团广东区委的意见,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亲赴花县处理<sup>②</sup>。

广宁、花县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的过程中,使彭湃认识到,在农民运动开展的初期,一定不能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以免从一开始就遭到地主豪绅的反抗和压迫。同时,应该使农会干部了解,地主豪绅和农会的对立是不能避免的,必须加强团结,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

广宁、花县事件还使彭湃深深感到,农民运动干部的缺乏,已经成了农民运动不能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来,早在一九二三年底和一九二四年初,彭湃在领导海丰农民斗争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农运工作同志太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他在给文亮、刘仁静等信中都已提到了这一点,他大声疾呼:“天下无难

---

<sup>①</sup> 新学生社是在广东共产党组织领导下,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骨干建立起来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1923年6月17日于广州成立,分社、支部遍于广东各县市及广西、福建一些与广东毗邻的县市。

<sup>②</sup> 1924年6月19日《广州民国日报》。

事,只怕少同志”<sup>①</sup>,“要快些设法子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sup>②</sup>到了这时,他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更加尖锐地提出:“本区经济困难,人材缺乏,诚恐有坐失事机之虞。”<sup>③</sup>

彭湃为了推动全省农民运动发展而提出农运干部缺乏的呼吁,引起了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的重视。因而,在青年团广东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彭湃便为培训农民运动干部这一重要工作进行积极的准备,拟定了以国民党中央出面,公开培训干部案。青年团广东区委也向各地团组织发出通知,要求派出党、团员前来参加学习。六月三十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彭湃以农民部提议的形式,向会议提出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经会议讨论通过。这次会议还规定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章程,并委派彭湃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第一届主任。

经过彭湃等人的努力,七月三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正式开学。第一届学员共三十八名,绝大多数是“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sup>④</sup>。其中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占了二十名,新学生社成员占六名。

彭湃在担任农讲所第一届主任期间,不仅担负了整个培训工作,还亲自向学员们讲课。他在讲课中分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揭示广大农民受压迫剥削的根源,教育学员为农民群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而奋斗;他运用早期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明从事农民运动必须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及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

---

①② 《彭湃给刘仁静》,《彭湃文集》第54页。文亮(即施复亮)、刘仁静,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

③ 彭湃《为广宁、花县农潮事给团中央的报告》,同上书,第64页。

④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出版(下同)。

方法，帮助学员学会领导农民运动的本领。

彭湃还聘请一些著名人士和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到讲习所授课。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庭以及阮啸仙、罗绮园、林甦等，都曾在讲习所讲课。廖仲恺在题为《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的演讲中，提出了“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sup>①</sup>的著名论点，给学员们以很大的鼓舞，对当时广东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彭湃既重视课堂教学，又特别注意引导学员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农讲所“学生除正式授课外，最注意于所外活动”<sup>②</sup>及“农村运动实习”，凡星期天，彭湃便和学员们赴广州四郊，从事“实际调查与宣传”工作<sup>③</sup>。彭湃的这种教育方法，开创了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的良好学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对后来的干部培养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湃在主办第一届农讲所期间，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身份，组织了一次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大会。这次大会于七月二十八日在广东高师礼堂举行，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应邀出席，并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根本上是要农民自己先有觉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要有这个思想然后大家才能够联络起来。”<sup>④</sup>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的学习时间原定一个月，后来，彭湃吸取了海丰农会被陈炯明之流一再破坏的沉痛教训，认识到农民武装在

---

<sup>①</sup> 廖仲恺：《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廖仲恺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同）第194页。

<sup>②③</sup>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农民》第2期。

<sup>④</sup> 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下同）第931页。

开展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意义，遂决定为学员增加军事训练一课，因而整个学习期限就延长了<sup>①</sup>。军事训练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十天，由徐成章等负责上课和操练。军事训练结束后，彭湃又带领学员到黄埔附近的深井、鱼珠、东圃、长洲等地进行了三天的农民运动实习。

八月二十一日，农讲所第一届学员毕业典礼暨第二届学员开学典礼，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孙中山、鲍罗庭等都出席参加。孙中山发表了《耕者有其田》这篇极其重要的演说，认为学员毕业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我们国民党做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sup>②</sup>，并具体、明确地阐发了他的“耕者有其田”主张。孙中山对第一届农讲所的重视，体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当时革命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第一届农讲所正式毕业的学员共三十三名，除少数人留在中央农民部工作外，其中二十五人都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派往广东各县开展农民运动。这些特派员成为广东各地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广东全省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一些学员，后来成长为地区和省一级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如黄学增、韦启瑞、邱鉴志等；一些学员在同地主豪绅、封建军阀的斗争中立下了功绩，甚至献出了生命，如李民智，黄超凡、陈伯忠。

---

<sup>①</sup> 1924年7月25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农讲所第一届“原定四星期毕业，现增军事一门，延长一星期，毕业试期定8月1日。”

<sup>②</sup> 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935页。

彭湃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既培养了人才，又创造了培训农民运动干部的经验，在推动广东以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一九二六年总结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时，把第一届毕业的学员称为“农民运动之推进机”<sup>①</sup>，这个评价确切反映了历史实际。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的时候，广州商团煽动罢市，向广东革命政府施加压力，要挟政府发还私运入境的大批枪械。从商团事件开始，中共广东区委和广大工农群众就积极支持孙中山对商团采取“严厉手段”。八月二十七日，农讲所第二届的二百多名学员，便改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即农团军，由彭湃任团长，按省长廖仲恺的要求，开进了省长公署担任警卫<sup>②</sup>。这是广东最早建立的农民自卫军。接着，广州市郊、花县、番禺、顺德、南海和香山等县也纷纷组织农民自卫军，配备的枪枝达到三千支。彭湃率领的进驻省长公署的农民自卫军，原计划在商团继续捣乱，广东革命政府接管粮食贸易和接管参加罢市商店时，负责管理沙基一带的粮店。后来，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与商团“调停”的空气一度高涨，廖仲恺愤而辞去广东省长职务，孙中山也被迫将大本营移驻韶关，惩处商团的计划陷于停顿。农民自卫军遂停止执行在广州的任务，随后亦于九月下旬赴韶关，参与军事训练，准备支援北伐。不久，孙中山回师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有力支持下，决心平定商团叛乱，这支农民自卫军也调回广州，参加了十月十五日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

正当商团事件在紧张地发展的时候，周恩来等从法国归来。九月初，经香港乘船返抵广州。彭湃和阮啸仙等到长堤码头上迎

<sup>①</sup>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农民》第2期。

<sup>②</sup> 《农工旬刊》第6期。

接，并由林务农带他们到文明路思贤街彭湃的住所居住<sup>①</sup>。这是周恩来与彭湃的第一次会面。还在旅居法国的时候，周恩来就很关心彭湃在海陆丰从事的农民运动。曾在《赤光》撰文作了介绍。在广州这段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交谈了各自的经历，周恩来在空闲时还向彭湃等介绍了法国的政治、经济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到广州以后，即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同月，中共广州地委改选，彭湃当选为地委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参与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九月底彭湃考虑到原来的住所五个人合住<sup>②</sup>实在太挤，便把它让给了周恩来。彭湃和另外三位同志迁到东皋大道仁兴里三号居住。

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工作一直十分繁忙，部长彭素民因病辞职，李章达被派接任部长职务，但李章达的其他工作很多，部里的实际工作仍由彭湃负责。十月，李章达辞职，国民党中央另派黄居素出任农民部长。黄居素原是陈炯明的高级幕僚，属于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向持消极态度。因此，他上任的时候，就遭到农民部全体职员的总工反对。彭湃曾对黄居素说过，不支持农民运动的人，就不能当农民部长。于是，黄居素提出要撤掉彭湃的农民部秘书一职，但国民党中央没有同意。最后，黄居素只得自己辞职。十一月，孙中山任命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长，彭湃仍任秘书。稍后，在彭湃离开广州外出工作期间，秘书职务由罗绮园代理。直到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以后，彭湃才辞去了农民部秘书的职务。

---

<sup>①</sup> 《回忆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2页。

<sup>②</sup> 原住彭湃、林甦、林务农，后来又来了周恩来、罗振声，共五人。

## 二、在广宁减租斗争前线

广宁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反动的地主武装便起来进行对抗，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一九二四年四月建立的江屯、潭埗等地的农会于六月即遭地主武装捣毁，农会会所也被地主放火焚烧。后来，在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以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支持下，农会又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了九、十月间，参加农会的已有一万多农户，便于十月十日正式成立了广宁县农会。

县农会成立后，根据农民的要求，立即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他们在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减租四成的决议，并于十一月初在各地陆续宣传并付诸行动。十一月中旬，县农会又先后发出了《减租宣言》和《给田主的一封信》，指出减租是全县农民的正当要求和正义行动，表示了“不达减租额数，以收回应得利益之目的，誓不甘休”<sup>①</sup>的决心。减租运动在农民的热烈拥护下蓬勃地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地主豪绅们纷起反对。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他们多次举行集会，成立了所谓“保产大会”、“业主维持会”，建立了统一的反动武装“业主军”。他们提出了向农民运动进攻的口号，说什么“乱世无主，强奴反主，大祸压眉，武力反抗”等等<sup>②</sup>。以江汉英、江淮英为首的广宁地主集团，纠集了反动武装业主军八百多人，在被撤掉了广宁县长职务的反动份子李济源的支持下，决定武装镇压减租运动并进而扑灭农会。

在强大的地主武装的威胁面前，广宁县农会一面紧急集合各

---

① 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农民运动丛书》第2种第37页。

② 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农民运动丛书》第2种第33页。

地农民军于群众基础较好的拆石，以应付地主武装对农会的进攻；一面将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

中共广东区委获讯后，即派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赶往广宁，领导这一斗争。

十一月二十五日，地主武装向农会发动进攻，战斗正式展开。二十六日，彭湃抵达广宁拆石，立即向周其鉴等县农会领导人了解减租斗争的经过，分析当时的状况，研究对策。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形势，彭湃等作出了采取守势、静待时机的决策，并决定：一、十二月一日召开关于减租问题的农民代表会议，讨论以后进行的计划，并争取和县长、地主代表一起谈判，合理解决减租问题；二、各地农军必须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对付地主武装的进攻，并虚张声势，使敌人不敢轻易深入，以争取一个短暂的停战时期；三、继续深入做思想发动工作，坚定农民对减租斗争的决心，进一步增强农会的实力。<sup>①</sup>

彭湃虽然担负着整个斗争的领导重任而十分繁忙，但他还是随时注意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他把思想发动工作看成是增强农民力量的重要环节。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认识到减租的重大意义，其中有些农民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一些年纪较大的农民受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较普遍地认为租田应交租，减租“不公道”，因而对减租运动表示犹豫。于是，彭湃便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详细解析农民终岁劳苦，不得一饱，地主不但不耕田，坐吃现成还要压迫农民等等许多不公道的地方”<sup>②</sup>，使农民认识到地主是可恶的。彭湃更深入一步向农民说明，减租完全是公道的；甚至完全不纳租、杀死为富不仁的地主也是公道的。彭湃

<sup>①</sup> 参见《广宁减租运动经过》，《彭湃研究史料》第210页。

<sup>②</sup> 《广宁减租运动经过》，《彭湃研究史料》第208页。

的逐步深入的分析，农民们都表示同意，改变了认为减租不公道的看法。这样，彭湃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达到了统一思想、统一步伐、增强战斗力的目的。

为了贯彻县农会的决策，彭湃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亲赴县署与县长蔡鹤朋交涉，使蔡鹤朋同意在十二月一日召集佃业双方和平会议。但是，到了开会那一天，各区乡的农民代表五十多人已经齐集县城准备参加会议，而地主方面的代表竟在蔡鹤朋的包庇纵容下拒不出席，以致会议遭到破坏。更加令人愤慨的是，反动地主头子江汉英、江淮英，趁农民代表及农会领导人远赴县城的机会，纠集地主武装业主军一百多人，向社岗等地的农军发动突然袭击，使农会方面遭到相当损失。第二天，业主军又袭击塘径农军。

彭湃接得这个消息以后，先后两次找蔡鹤朋交涉，根据国民党的扶助农工政策，批驳了蔡鹤朋袒护地主的所作所为。彭湃还到粤军第三师驻广宁的旅司令部，要求派兵协助农民。但是，这些交涉只得到一些口头的许诺，并没有取得有利于农民的实际效果。

十二月一日会议的被破坏和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说明通过谈判解决减租问题已经是不可能了。因此，彭湃和县农会全力领导农民，更加紧张地进行备战，以便在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下能够坚守阵地，保卫农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最后战胜地主武装，就必须大大增强农民方面的武装力量。十二月二日和五日，彭湃接连向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出报告要求支援，报告提出：“情况很危急。我们请求尽快、尽快、尽快从花县派出队伍前来支援。”<sup>①</sup> 报告分析了这场减租斗争的重大意义，认为“斗争的结果如何对于所有邻县的农民运动将有决定性的

---

<sup>①</sup> 彭湃《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五个报告》《彭湃文集》第68页。

意义”<sup>①</sup>。“我们在与广宁地主的武装冲突中一定要得胜。只有这样农民运动才会顺利发展。”<sup>②</sup>报告还反映了农民对建立武装的迫切要求：“农民总是向我们的宣传鼓动员指出：光有宣传鼓动而无武器是什么也干不成的。”<sup>③</sup>

中共广东区委接到彭湃的报告后，首先争取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对广宁减租斗争的支持。廖仲恺本着国民党应“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主张，决定派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卫农民的减租运动。铁甲车队虽然是刚组成不久的部队，但它是经过军事训练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连长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因而无论从政治素质和战斗实力来说，都是一支坚强的队伍。所以，当铁甲车队奉命前来广宁支援农民斗争的消息传开时，给彭湃和广宁县农会领导以及广大农民群众，都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彭湃由始至终都把坚定农民的斗争信心，增强农民本身的战斗力摆在首位。因此，为了在铁甲车队到来以前，再一次显示农民的雄伟力量，彭湃和周其鉴等决定举行一次请愿游行。

十二月十日，各区农民代表五百余人，在荷木嘴举行大会。彭湃在会上发表了鼓励农民一定要把这场减租斗争进行到底的演说。会后，农民代表情绪激昂地前往县城请愿。当农民代表同县长蔡鹤朋辩论的时候，彭湃则将蔡鹤朋的讲话作了记录。彭湃的这个举动，使蔡鹤朋一时摸不清究竟是何用意，这就迫使公开袒护地主的蔡鹤朋顿时不知所措。彭湃进而援引国民党的党纲，驳斥了蔡鹤朋为地主辩解的言论，指出只有接受农民的请愿条件，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彭湃和农民代表的批驳下，蔡鹤朋理屈词穷，非常狼狈，被迫答应接受农民代表提出的“解散业主维持会”、“解除地主

---

① 彭湃《关于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的五个报告》《彭湃文集》第70—71页。

②③ 同上书，第71页。

武装”、“缉拿祸首江汉英、江淮英”等九条请愿条件。接着，在农民代表的坚决要求下，蔡鹤朋不得不到县署外向请愿的群众讲话，但声音很小。显然是仍然想讨好土豪劣绅。彭湃看到这种状况，便有意将蔡鹤朋的每一句话都大声重复一遍，急得蔡鹤朋连忙叫彭湃“小声点”、“小声点”，免得被江淮英他们听见。在整个请愿过程中，彭湃巧妙的斗争，使这个地主阶级的辩护人弄得极其难堪。请愿斗争取得胜利，大大地增长了农民的斗争意志。

十二月十一日，铁甲车队在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率领下，抵达广宁农军的据点社岗。当晚，即和彭湃、周其鉴等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早上七时，以农军为前锋，铁甲车队为后续部队，向埧埧地主据点发动攻击。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敌人不支，最后退守以江姓炮楼为中心的几个据点，负隅顽抗。江姓炮楼高达五层，建筑坚固，土炮无法攻破。农军便于当晚撤回原防。并由廖乾五返回广州报告敌情，请求增派兵力及重武器支援。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下，廖仲恺根据廖乾五报告的情况，于十二月十六日命令就近驻防的粤军第三师，立即派兵一营前赴广宁协助农军，并决定组织绥缉善后委员会，委派蔡鹤朋、彭湃、廖乾五和第三师派出的一名高级副官为委员，共同负责处理广宁事件。<sup>①</sup>

廖仲恺的态度是鲜明的。他以大元帅府的名义发给第三师师长的命令中，郑重声明：“此次调兵，全为护卫农民，清除土恶，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sup>②</sup>。但是，第三师的官兵开始时都是站在地主方面。十二月十五日，第三师的官兵两个

<sup>①</sup> 廖仲恺《关于广宁农民运动为大元帅草拟的命令》《廖仲恺集》第230页。

<sup>②</sup> 《廖仲恺集》，第230页。

连，由副官长詹学新率领从四会开抵广宁，随即进驻地主的据点潭埗，江汉英、江淮英等地主头子立即设宴及酬金“犒劳”。第三师的两个连在受地主款待以后，便连续两次致函铁甲车队，为地主集团辩解，诬陷农会。十六日，詹学新等又亲到社岗铁甲车队驻地会见徐成章，表示不能支持农民的减租要求。

第三师官佐的这种态度，给减租斗争增加了许多困难。面对这种情况，彭湃等经过研究，采取了争取第三师保持中立的对策。一方面，彭湃、徐成章等通过回访联系工作等，更多地同第三师的官佐接触，以加深彼此间的了解和增长感情；另一方面，发动农民群众，欢迎第三师官兵，当第三师官兵到社岗，或农民赴潭埗时，都向三师官兵表示友好态度，消除他们的敌意。同时，决定在社岗举行一次盛大的“农兵联欢大会”，进一步加强农民和第三师官兵的联系。

十二月十九日中午，“农兵联欢大会”在社岗乡田垌举行。到会的农民四千多人，第三师的官兵代表约五十名应邀参加，铁甲车队则全体出席。彭湃、徐成章和第三师的营长李汉魂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彭湃在演说中着重指出：广宁县的地主劣绅，就是效法军阀，进行反革命行动。他号召农民士兵团结起来，“以反抗那不利于农民士兵之特殊阶级。”<sup>①</sup>演说以后，军民各方相继表演了游艺节目，拆石、社岗的农民做了“革命糍”（一种点心），送到会场分发给出席大会的农兵。这次大会开得十分热烈，给第三师的官兵以很大的教育，连李汉魂也在会上公开表示必须“实现农兵联合”<sup>②</sup>。因此，大会以后，第三师官兵的态度有了极其明显的改变，他们对农民普遍表示好感和同情，在后来与地主的斗争中，詹学新

---

① 彭湃：《在广宁农兵联欢大会上的演说》《彭湃文集》第66页。

② 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农民运动丛书》第2种，第73页。

也大都赞同彭湃等人的意见，站在农民一边。争取第三师官兵中立的决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第三师的态度转变后，一贯袒护地主的蔡鹤朋便陷于孤立。在彭湃、廖乾五的一再催促下，他不得不同意举行绥缉善后委员会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廖仲恺又给第三师师长郑润琦发出漾电，强调“勿任土豪劣绅狡逞，混乱黑白，良以恶草不锄，将来滋蔓”<sup>①</sup>。漾电进一步促成了善后会议的召开。

十二月二十五日，彭湃、廖乾五、詹学新等以及第三师一营和铁甲车队，联同开赴广宁县城。二十六日，蔡鹤朋、彭湃、廖乾五、詹学新四委员在县城举行绥缉善后委员会的预备会议，确立了议事日程。为了争取农民的权益，树立农会的声势，彭湃提议由广宁县农会派代表二名列席会议，在廖乾五、詹学新的支持下，这一建议获得通过。二十七日，是正式会议的第一日，通过了缉拿江汉英、江淮英、谭侣松等八名广宁事件的祸首，收缴反动地主的武器等两个决议，取得会议上斗争的初步胜利。

十二月二十九日，要被缉拿的祸首之一的广宁县团保总局长谭侣松，竟通过县署号房发出请柬，邀请中央农民部特派员、铁甲车队和第三师的带队长官以及县长，于当晚八时到县团保总局赴宴。这是广宁县地主武装头子施展的一个阴谋。他以为彭湃等人如果赴宴，就可以在社会上制造特派员、铁甲车队、第三师都和县长一样站在地主一边的假象，借以离间、欺骗群众，达到打击县农会的险恶目的。

彭湃、廖乾五等立即研究对策。彭湃认为，谭侣松是造成此次广宁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已列于通缉名单之内，但依靠蔡鹤朋去

---

<sup>①</sup> 廖仲恺：《致郑润琦漾电》，《廖仲恺集》第232页。

执行绥缉善后委员会缉拿谭侣松是不可能的。因此，彭湃建议，应趁赴宴的机会，一举拘捕谭侣松归案。这个计划，得到了廖乾五、徐成章的支持，并取得了詹学新的同意。但广宁县农会领导方面，则因考虑到各种后果而未能作出决定。正当这时，突然接到驻社岗农军的特急报告称：二十九日下午，潭埗地主武装又随意枪杀农民四人。正当双方静候绥缉委员会会议解决的时候，地主武装竟敢如此嚣张，再一次说明仅仅依靠会议是不可能彻底解决减租问题的。于是，农会领导一致决定，赞同彭湃提出的方案，捉拿谭侣松，然后将铁甲车队拉回社岗，最后以武力解决战斗。

二十九日晚，彭湃、廖乾五、徐成章身佩短枪，依约赴宴。当谭侣松正为自己的阴谋得逞而高兴时，彭湃等即将他拘捕起来。团保局的武装也被赵自选、周士第率领的铁甲车队解除了，缴获了四十二枝枪。谭侣松被押解回县农会会所以后，蔡鹤朋闻讯，急忙前来要求将谭侣松转给县署处理，遭到廖乾五的痛斥、拒绝。蔡鹤朋便故意制造障碍，使绥缉委员会中断，绥缉委员会实际上解体了。当晚，彭湃等留下函件给詹学新说明事情的原委，便和铁甲车队官兵一起，押解谭侣松返回社岗。并连夜派赵自选往广州报告事件经过，请调大炮前来增援。

彭湃和廖乾五等率领农军和铁甲车队返回社岗以后，继续包围地主武装的主要据点——江姓炮楼。同时，收缴了一些零星据点的武器拨归农军使用；又没收不法地主设在拆石、螺岗的粮仓，充当农军的食粮，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军的实力。

在战争间隙，广宁县农会在社岗举行公祭烈士大会，对在同地主武装斗争中的牺牲的农军致哀。彭湃在会上发表了演说，高度评价烈士们的革命精神，赞颂“烈士是为农民利益奋斗而死之急先锋”。葬礼开始，彭湃、周其鉴等亲自抬棺，并由廖乾五、徐成章执

绑，铁甲车队还发炮二十一响，表示对烈士的崇敬，到会的农民群众都甚为感动，斗争意志更加坚强。

这时，争取“神打团”的工作也初见成效。“神打团”又叫“大刀会”，原是贫苦农民组织的封建迷信的武装团体，后来被地主阶级利用，成为反对农运的一股势力。广宁县农会在彭湃和周其鉴等领导下，派人去做争取“神打团”的工作，使一部分“神打团”脱离了地主的控制，对农会表示同情，在斗争中采中立态度，有些还倾向农会一边。

这样，经过这段期间的工作和斗争，农会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地主方面的优势便逐渐消失了。

一月九日，由廖仲恺派遣前来支援的大元帅府卫士队，在队长卢振柳的率领下，携带大炮一门，到达广宁。江姓炮楼的地主武装开枪扫射前往欢迎卫士队的农民群众，铁甲车队予以还击，战斗遂又在潭埗附近展开。刚抵广宁的卫士队听闻枪声，迅速赶至前线，随即决定全队进驻潭埗，并在附近安置炮位，发炮攻打江姓炮楼。卫士队的炮兵于当日下午、傍晚、及次日清晨，共发六炮，虽都命中，但坚固的炮楼只受轻微的损伤，农民群众和农会各级领导人都感到大失所望。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卫士队长卢振柳，无视国民党中央的多次有关保卫农民利益的指示，竟然偏袒地主，指责农会；甚至背着县农会和铁甲车队，暗中派人与破坏农运的祸首密谋“和平解决”。一月十二日，卢振柳便下令卫士队停战，要求县农会及铁甲车队停止进攻江姓炮楼，撤回队伍停战五天，召开全县业主会议，以解决减租问题。

卢振柳的这种做法，适应了地主阶级的需要，使本来已转为处于有利地位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形

势陡转，彭湃和广宁县农会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新的对策。

就在卢振柳下令停战的当天，彭湃等以广宁县农民会协的名义，接连二次致函卢振柳，对所谓停战、和平解决的办法提出异议，并对卢振柳的决定的错误之处作了详尽的说明。同时，县农会向各地农军发出命令：即使卫士队单独停战，农军断不能松懈，对各地的地主武装仍需继续包围，严密监视。县农会又派出宣传队前往各区、乡，向农民讲解斗争形势，鼓舞斗志。

地主武装利用停战的机会，加紧向农民进攻。虽然，农军已有戒备，奋起还击，将来犯的地主武装击退。但是，农民方面还是遭到相当损失：一些村庄被抢掠焚烧，一些农民被掳或遭残酷杀害。这些情况，卢振柳虽然得到了彭湃等人的详细报告，但仍然熟视无睹，置之不理。相反，就在“停战”那几天，卢振柳公开和地主头子勾搭，亲自出席地主的宴会，还要把地主拉进国民党，充分暴露了卢振柳的国民党右派的面目。一月十八日，卢振柳根据地主的要求，命令农军撤回步哨，不得带枪外出，这实质上是解除了农民的武装，表明了卢振柳已经完全站到地主一边。

彭湃领导广宁县农会，对卢振柳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方面致函卢振柳，指出：“农民协会系完全独立不受任何拘束之团体”<sup>①</sup>，严正拒绝服从卢振柳的实质上是解除农民武装的命令。另一方面，由县农会致电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农民部长廖仲恺，并通电全国，声讨卢振柳勾结地主压迫农民的罪行。为了妥善解决卢振柳及卫士队的问题，确定今后斗争的方式、方法，彭湃于十八日立即返回广州，向中共广东区委及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请示报告。

彭湃到广州后，积极进行活动，仅仅几天，就取得了显著的成

---

<sup>①</sup> 周其鉴《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效。一月十九日，廖仲恺以胡代帅的名义，发出四个命令。撤掉了卢振柳的卫士队长职务，由卫士队第一连连长谢星继代理队长，廖乾五兼任党代表。任命谢星继、廖乾五、彭湃组织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广宁的一切军事行动<sup>①</sup>。

二十三日，彭湃携带大元帅府颁发的命令和炸药一批，从广州抵达广宁。彭湃等人根据命令，在卫士队的官兵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经过几天的教育，取得了卫士队对农民的支持。官兵都表示拥护政府命令，接受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决心荡平地主武装，争取农民减租斗争的最后胜利。

一月三十一日，广宁绥缉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二月一日向地主武装盘踞的据点发动全面进攻，并以炸药来摧毁江姓炮楼。

当卫士队、铁甲军队包围江姓炮楼以后，彭湃亲自率领农军工程队十二人，在铁甲车队的掩护下挖掘地道，准备将地道挖至江姓炮楼底下，然后安放炸药，一举将炮楼炸毁。第二天，地主武装明瞭我方意图，即派出突击队数十人向农军工程队猛扑，又以土炮及炸药包猛烈袭击地道洞口。土炮及炸药就在彭湃附近爆炸，彭湃毫不畏惧，仍然坚持指挥挖掘地道。二月三日下午，地道工程完成，安放的炸药也于六时二十分爆炸。炸药威力很大，附近泥土抛到几百米以外，但炮楼并未倒塌。彭湃由于废寝忘餐地在地道内坚持了三天两夜，身体已十分疲劳，加上看到炸楼没有获得成功，一时深受刺激，立即晕倒在地，经过救护队的抢救才脱险。

彭湃苏醒过来以后，又立即工作，他迅速将当时情况写成详细报告，并派赵自选赴广州要求增拨大炮、炸药、子弹前来支援。并与军委会研究决定：继续紧紧包围潭埗江姓炮楼等据点，日内改用

---

<sup>①</sup> 罗绮园：《回忆》，《犁头周报》第13期。

火攻。彭湃不顾疲劳，又在二月六日赶到石嘴前线向驻守当地的农军和铁甲车队布置任务。

农民对火攻炮楼积极支持，斗志昂扬。地主武装在久受围困的情况下开始动摇。二月六日，潭埗江姓炮楼附近的黄姓炮楼的敌人害怕火攻，表示愿意向农军投降。二月十日，赵自选从广州携带子弹一批回到社岗农军总部，潭埗墟的商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害怕战争将更加激烈，便出面劝说江姓炮楼的地主武装投降。江姓炮楼的地主武装，在被围困了十天，毫无补给的情况下，连吃水也成问题，只得接受商人的意见。二月十三日，江姓炮楼的地主武装正式向农军缴械，战斗便告一段落。随后，农军在卫士队、铁甲军队的配合下，又扫清了占据螺岗等地的地主武装。十六日，广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胜利结束。

广宁减租斗争的胜利，使广宁农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农会组织迅速扩大，受地主利用的“神打团”，以及学生、小商人，甚至资本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农会。在广宁农民胜利的影响下，广宁附近的西江、北江各县的农民运动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二月十九日，彭湃和卫士队、铁甲军队在广宁农民的热烈欢送中，离开广宁返回广州。

### 三、重兴海陆丰农民运动

一九二五年初，正当彭湃在广宁领导农民反抗地主的武装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盘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了广东各地的反动武装，阴谋进攻广州，推翻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

东征军分左中右三路：以许崇智的粤军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军

为右路军；杨希闵的滇军为左路军；刘震寰的桂军为中路军。共产党人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与东征军的领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对东征非常重视。在东征前夕，中共广东区委召集东江方面的同志到广州开会，具体研究了如何发动群众配合东征军作战的问题。一月中旬，彭湃从广宁回广州汇报卢振柳问题时，得到了即将举行东征的消息，十分兴奋。他立即托人带信给在海丰坚持秘密斗争的农会领导人，通知他们发动农民支援和接应东征军；同时又根据上级指示，通知海丰的陈修到广州取电报密码，建立秘密电台，把海丰方面的情报及时发回广州。彭湃还与周恩来等研究，决定派李劳工等发动在广州作人力车夫的五十多名海丰籍农民，组成海丰农民自卫军。这支海丰最早的农民自卫军，在广州只训练了一天，便奉蒋介石校长、廖仲恺部长的命令，随东征军出发，并作东征军的向导。<sup>①</sup>

二月一日，东征军的右路军誓师出发，进军神速，于二月二十一日即攻克惠阳平山。彭湃从广宁返回广州后，即赶到东征军前线。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指导员的名义，担负起发动农民支援东征军以及恢复和发展粤东农民运动的重任。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彭湃和先头部队一起进入海丰。

由于彭湃等人的努力，东征军一进入海丰境内，就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配合。彭湃在一份报告中说：“由白云入鹅埠。赤石、梅陇一带，农民欢迎我军异常热烈。或插青天白日旗或插农会旗，沿途并插，旗上都写标语；摆茶摆水，欢呼‘革命万岁’者不绝于

---

<sup>①</sup> 参见《吴振民在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5号第7页。

途。”<sup>①</sup>农民对东征的支援是各方面的，“或为党军内应，或作外援，如当冲锋队，充伏役，向导，侦探及截击逆军等等，无不踊跃去做”<sup>②</sup>

彭湃一回到家乡，前来探望的人便络绎不绝，竟达七、八千人之多。第二天，从陆丰、惠阳、惠来赶来的农民有一万多人，使彭湃应接不暇。有的向他叙述受陈炯明压迫的痛苦；有的控诉地主豪绅的残暴；有的询问如何恢复农会；有的提出要建立武装。农民群众强烈要求“减租、取消苛捐、发给武装。以上三项，尤以武装之要求为最切。”<sup>③</sup>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使彭湃受到极大的鼓舞，他对东江农民运动充满信心，认为“现在东江农会运动的发展当已不成问题”<sup>④</sup>

周恩来、谭平山等也于二月二十八日到了海丰县城。彭湃同他们商量以后，决定尽快恢复海丰农会，建立农民自卫军。

三月一日，海丰各界群众一千多人，在县城的林祖祠和东征军举行联欢大会。周恩来、彭湃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三月三日，海丰农民举行欢迎东征军的大会，有三万多农民群众参加。原来的海丰县城，经过陈炯明的军队劫掠以后，本已十室九空，极为萧条。但到开大会那天，“城乡一带行人拥挤异常，各商店亦纷纷开始营业，骤呈盛状。”“农旗蔽野，欢声雷动。”<sup>⑤</sup>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彭湃在大会上宣布正式恢复农会，“在县代表大会未召集前，由旧时职员组织临时县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sup>⑥</sup>。

县农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大力开展工作。彭湃看到

---

① 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彭湃文集》第84页。

② 同上书，第89页。

③④ 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彭湃文集》第85页。

⑤⑥ 《陆安日刊》1925年4月28—30日。

县农会的实力较坚固了，便建议县农会注重基层工作，派出宣传员到各区、乡宣传，推动区、乡农会的恢复工作。彭湃自己也经常前往各区、乡指导农会的恢复工作。各区的农民代表大会或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他几乎都出席参加。以四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天为例，彭湃就分赴第二、八、九等区参加了大会，并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sup>①</sup>。在彭湃等的努力下，海丰农会的重建工作很快就取得卓著的成效，各区、乡农会陆续建立和健全起来。

县农会恢复以后，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军阀”等鲜明的政治口号，引导农民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借以提高农民对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认识。又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发展农村教育”等口号。在彭湃和县农会的推动下，海丰县公署还通过决议，严禁谷米出口，稳定粮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许多区、乡都免除或减少了农民的军需负担，并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

为了培训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干部，彭湃于四月二十日，在县城准提阁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男女学生四十余名，由彭湃担任所长。

彭湃对于建立农民武装格外重视。他在《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中说：“当此镇压反革命之时，农民非有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sup>②</sup>彭湃为建立海丰农民自卫军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原来在广州随东征军出发的海丰农民自卫军，于二月二十七日 and 彭湃一起进入海丰。三月十六日，农民自卫军正式成立，最初成员有六十多人，一个多月后就扩充到二百多人。在彭湃建议和周恩来的积极支持下，县农会委派李劳

---

<sup>①</sup> 《陆安日刊》1925年4月28—30日。

<sup>②</sup> 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彭湃文集》第85页。

工任总队长，黄埔军校派出吴振民、卢德铭等军官担任教官。吴振民还兼任第一队队长，后来又兼任总队长<sup>①</sup>。农民自卫军集中在桥东林祖祠进行军事训练，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彭湃和海丰农会积极争取各方面对农军予以支援，粤军总司令部拨给了四十枝枪，广州革命政府还专门派林魁运来三千发子弹供农军使用。随着海丰农民运动的发展，海丰农民自卫军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是领导群众运动的公开、合法机关，彭湃本人的公开身份也正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指导员。因此，彭湃到达海丰以后，即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兼国民党东江潮梅组织主任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参与了建立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并在农民群众中发展了大批国民党党员。在三月三日海丰县党部第一次会议上，彭湃被推为县党部的宣传委员。以后，海丰县党部的每一次会议，彭湃几乎都参加了，并积极发言，提出意见<sup>②</sup>。

不久，彭湃又兼任国民党县党部的机关报——《陆安日刊》的编辑员。《陆安日刊》原是军阀陈炯明把持的海丰唯一的日报，是陈炯明和海丰豪绅地主的喉舌，恶毒攻击彭湃和海丰农民运动。东征军攻占海丰后，接收了《陆安日刊》，由海丰县党部主办，使它成为宣传革命的报纸。它从三月十六日开始刊行，每日出版四开四版报纸一张，主要是刊登有关海丰工农群众运动以及东征军、广州革命政府的活动等消息，宣传国民党的政策和主张。该报还经常出版各种“专号”，仅五月上旬就有“五一劳动节专号”、“五四纪念专号”、“五五纪念马克思诞辰及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四周年专号”、

---

① 参见《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5号第7页。

② 参见1925年3月—5月《陆安日刊》。

“五七国耻纪念专号”等等。《陆安日刊》事实上成了海丰一个重要的开展革命宣传的阵地，在当时县办的报纸中是不可多得的，它对海陆丰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彭湃在海丰新政权的建设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向革命政府和东征军领导人推荐海丰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国民党左派彭汉垣任海丰县长，共产党员陈魁亚任教育局长。新政权的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废除了海丰原有的乡里约正的旧制，取消了陈炯明时代的苛政，实行禁鸦片，禁蓄婢，兴修马路，整顿警察，取消陋规，取消“伙头鸡”、“三下盖”。这些革命措施的实行，使海丰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彭湃除了以主要的力量重建海丰农民协会外，还十分注意开展工人运动，领导工人组织工会，支援农民的斗争。在彭湃等的领导下，海丰县城和汕尾等墟镇的工人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各业工人踊跃加入工会，纺织、织布、制药、理发、打银、渔业等工会组织先后建立。四月下旬，正式成立了海丰县总工会。

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海陆丰农民运动中涌现出一批革命积极分子。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海陆丰革命工作的领导，一九二五年四月，建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成员包括彭湃、林甦、郑志云、李劳工、李国珍、张威<sup>①</sup>、吴振民、林务农等，由彭湃任支部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陆丰特别支部。在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的领导下，海丰还建立了妇女解放协会、商民协会、新学生社、教职员联合会、青年农工俱乐部等群众团体，海丰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

---

<sup>①</sup> 张威(1902—1928)，广东陆丰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陆丰农民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后任陆丰县代理县长，中共东江特委委员，参加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1928年被捕牺牲。

正当海丰在东征后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时，毗邻的陆丰县却仍然没有显现出革命的生气。陆丰的农民群众多次派人来找彭湃，要求支援。原来，在东征后担任陆丰县长的徐健行，竟是一个站在地主阶级一边的反动人物，他支持地主豪绅干涉农会事务，使工农运动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障碍。县农民协会为此派代表到县公署质问时，徐健行竟蛮横无理，以军警相威胁。为了发展陆丰的工农运动，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决定派彭湃前往开展工作。

五月四日清晨，彭湃和吴振民等率领由军校十余人、海丰农民自卫军四十名、海丰农讲所学员四十余人组成的宣传队，出发开赴陆丰。队伍启程以前，彭湃向全体人员发表演说，介绍了陆丰农民的艰苦状况以及他们的不懈斗争的精神，号召宣传队成员必须认识此行的重大意义，尽力协助陆丰农民取得斗争的全胜。他们一路步行，沿途宣传，情绪十分高昂。陆丰反动县长徐健行得知彭湃率领宣传队前来的消息，十分恐惧。彭湃等尚未到达县城，徐健行就畏罪逃走了。

彭湃等当晚到达陆丰后，即到陆丰县公署同县的代表商议，订出了县署必须执行的若干协约，包括组织粮食救济委员会，提供县农民协会经费，不得向贫苦农民募捐征饷，支持农会严惩土豪劣绅的行动，取消各种陋规等等。

第二天，彭湃派农讲所学员分赴各地调查反动县长徐健行的劣迹，同时在群众中宣传广州革命政府的各项革命主张。晚上，为了解决农民度荒问题，又联同各有关单位代表，召开了陆丰粮食救济委员会筹备会议，作出了几项有利于改善贫苦农民生活的决定：“1、严禁运米出口；2、调查富户租谷，令即时开仓平粜；3、筹款购米来县。”<sup>①</sup>会议还决定成立陆丰县粮食救济委员会，立即开展

<sup>①</sup> 《陆安日报》，1925年5月11日。

对贫苦农民群众的救济工作。

五月六日，在彭湃的推动下，召开了陆丰全县农会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达九百人，彭湃、吴振民及陆丰县党部代表张威相继在会上讲话。彭湃在讲话中，对徐健行的丑行进行了公开的揭发和批判，伸张了正气。代表们在会上一致提出驱逐徐健行，另委新县长。这次大会通过了驱逐徐健行的决议，反映了全县人民的要求，也提高了陆丰农会的威信。

六月二日，我党推荐优秀共产党员、原任汕尾市政局长刘琴西<sup>①</sup>为陆丰县长，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批准。刘琴西就任以后，立即开始新政权的建设工作。

彭湃在陆丰工作的时间很短，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彭湃还分别派人分赴潮阳、惠来、普宁等县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为粤东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基础。

七月上旬，在彭湃亲自领导下，召开了海丰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多人，代表着全县三万五千多会员。陆丰、紫金、普宁、惠阳等县都派出代表参加。大会开幕那天，举行“七五”农潮一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农民群众达七万多人，“为海丰亘古未有的大会。”<sup>②</sup>代表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工农联合、封锁香港、武装全县农民、巩固各级协会的组织、肃清反革命派在海丰的武装势力等多项决议案。值得指出的是：在七月九日的会议上，彭湃和李春涛一起，向到会一百二十六位代表，测验了他

---

<sup>①</sup> 刘琴西(1896—1933)，广东紫金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是海陆丰、紫金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3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广州。

<sup>②</sup> 《海丰县农民一年来奋斗报告大纲》，系郑志云向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转引自《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5号。

们对土地问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没有一个人承认田地该归地主所有;认为该归农民所有的十二人;认为该归农会所有的二十九人;认为该归社会所有八十人;无表示的有五人。这个测验,表明海丰农民代表的政治觉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正如李春涛所说:“这样的对于土地的观念,算是极为正确,这样的农民运动的前途,才算是光明远大。”<sup>①</sup>彭湃在参加东征期间,一面发动和组织东江人民群众支援东征,并利用当时的有利的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促进革命的发展;一面对东征军中的那些有旧意识的官兵的错误言论,对他们的有损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他愤慨地指出:“此次农民充革命军夫役向导侦探等职异常出力,但粤军对农民夫役仍然不免残酷,凡到一地不肯放回,即放回亦每不给夫价。农民向前理论,每以刀刺之,有一农民手掌刺伤长寸许,我带往见总部副官长,该官长只说待查办,夫价仍然不给。本来农民向农会报名,愿充党军挑伕为党服务者,有五千余人,但粤军偏偏不找农会,反要自己去拉伕才快意,真不知何故。”<sup>②</sup>他发现有些东征军队,对不筹款、不拉伕、取消苛捐杂税的宣言,根本没有执行,“款则筹了又筹,凡从前陈炯明所抽的捐项,除了烟捐禁止之外,其余杂捐亦依旧抽收”<sup>③</sup>。他及时将这些现象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不久,发生了黄晓元被杀事件。黄晓元是农会特派员,他和林道文<sup>④</sup>出发公平宣传的时候,查获了一批鸦片烟土。贩运烟土的流氓勾结驻在当地的军队,开枪把黄晓元打死,林道文幸而脱险,

<sup>①</sup> 李春涛《田地究竟是谁底呢—海丰农民对于土地的观念之正确》《李春涛文集》第141页。

<sup>②③</sup> 彭湃《关于东江农民运动情况的报告》《彭湃文集》第85—86页。

<sup>④</sup> 林道文(1902—1930),广东海丰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1930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广州牺牲。

赶回县城报告。彭湃闻讯，立即同林道文前往公平向驻军头目张和交涉。张和被迫交出凶手，彭湃对这杀害农运干部的反动士兵极为愤恨，亲手枪毙了这个家伙。然后，用汽车把黄晓元的尸首载回海丰县城。第二天，彭湃组织了工农学商各界上万人在桥东龙舌埔举行追悼会。彭湃号召群众要化悲痛为力量，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彭湃、李劳工、吴振民、林铁史<sup>①</sup>、李国珍等为烈士抬棺，彭湃还为烈士设计墓碑并题字。黄晓元烈士的追悼会的召开以及对凶手的处决，使海丰的驻军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农民和农民运动的态度有了变化，不敢再肆意横行。

#### 四、支持省港罢工和推动第二次东征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我国最早召开的省农民代表大会，因此，它成为广东以至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彭湃当时正在海丰，从事海陆丰以及粤东的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是，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同彭湃的努力分不开的。广东的农民运动，是由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开始的。在彭湃的努力奋斗下，在一九二三年，粤东一带就有近十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一九二四年以后，他和阮啸仙、罗绮园等挑起了领导全省农民运动的重担，亲自到广州市郊、广宁、花县等地发动和组织农民，指导农运的发展；他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适应农运的迅速发展培养了许多干部。正是由于彭湃和他的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使广东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二五

<sup>①</sup> 林铁史(1898—1928)，广东海丰人，1921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丰县委书记，是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年7月在领导反“围剿”战斗中被捕，壮烈牺牲。

年四月底止,全省有农会组织的县达二十二个,农会会员达二十二万,为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准备好条件。也正因为彭湃为广东农运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广大农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虽然没有出席会议,大会仍然选举他和阮啸仙、罗绮园三人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常务委员,组成领导全省农运的核心。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同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联合举行的。五月一日上午,两个大会的代表,联同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和青年革命军人,举行一次十万人以上的工农兵大示威游行,邓中夏同志称“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sup>①</sup>。在这次农民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工农联盟问题成了中心内容之一,大会决议认为:“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这次大会还决定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省农协会“成立宣言”的中心思想也强调了工农联盟,号召组成“工农革命战线,向压迫阶级进攻”<sup>②</sup>。

彭湃对于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工农联合的决议是衷心拥护和认真执行贯彻的。本来,彭湃在从事农民运动的初期,对于工人运动是不够重视的,对于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认识也不够明确。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他给李春涛的信中说:“彭湃觉得农民运动比都市的劳工运动有几点的确是好的”,一、农民“和田主的距离很远,凡什么运动,田主都不知,不比工厂的工人,一经给资本家知道,马上就解雇;二、农民虽然少有团体的训练,不比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有忠义气,能老老实实尽忠于自己的阶级;三、他们亦可用同盟罢耕,因为田地不是和

---

<sup>①</sup>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邓中夏文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50—551页。

<sup>②</sup>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7页。

机械一样的关在资本家的工厂里，而且是绝对不可移动的。将来占领田地，是极容易的。四、海丰现在做官钱很多，竞买田地，地价骤增，农民之纳田租，当然亦增加，佃主的争议，亦必多起来。五、海丰物价日贵，农民生活日益困艰，他们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彭湃在这里对农民运动的一般原因及海丰的特殊原因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农村早就存在着阶级斗争，是由于“农村的纯无产阶级对于田主资本家的敌视是很深的。”<sup>①</sup>可见，彭湃还是认识到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在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为海陆归农会起草的《五一宣告》中说到：“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财富无限制地集中到资本家和田主手里，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益贫困，“陷于饥寒交迫无智的地位。”提出了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和人道上，都不得不要求自身的解放和世界的改造。五月一日这一天，“是我们工人和农民开始解放运动的日子！”<sup>②</sup>彭湃这时已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摆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九二四年到广州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从两年多来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斗争深切感受到，农民要想革命成功，首先要有工人阶级领导，通过共产党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去发动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加上他在广州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于是开始注意工人运动。这一年六月，他和李劳工深入到人力车工人中去做宣传发动工作，为了容易接近工人，他们拜工人为师，学会了拉人力车。他们常常拉着车到工人聚集的“车仔馆”，去同他们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很快就组成了“广州市人力车工人第一协作社。”到了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时，彭湃就更

① 李春涛《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第49—50页。

② 彭湃《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彭湃文集》第28页。

加重视开展工人运动了，他不仅在恢复农民运动的同时注意开展工人运动，而且还明确地说：“农民组织农会，工人组织工会，同心协力，向田主宣战，向资本家宣战！”“现在农民已有农会，已有自卫军，工人也应赶快组织工会和工团军。”<sup>①</sup>他派出人员分别建立起各行各业的工会，他本人也常常出席工人的集会。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中共广东区委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为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举行了有二十多万工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

在彭湃的领导下，海丰农民全力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他们示威游行，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省港大罢工的海丰籍工人回到家乡后，受到了热情的欢迎，生活上也得到妥善的照顾。海丰农会根据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决定，派农民自卫军封锁了海丰的各个港口。他们发动海丰人民群众，每人捐钱一角援助罢工工人。海丰农会提出了“工农联合万岁”的口号，并举彭湃为代表，前往广州慰问罢工工人。

八月四日，彭湃自海丰到广州，立即应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邀请，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作报告。彭湃代表海丰农民对罢工的工人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情的支持，并论述了工农联合的意义。他说：“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阶级：一种是压迫阶级，一种是被压迫阶级。工人与农民就是被压迫的人，两种人的地位，是一样的，工人直接受压迫的，是资本家，农民直接受压迫的，是大地主，资本家与大地主可靠的力量，是依赖军阀、帝国主义。”彭湃接着说：“我们工人要求解放，农民也是一样要求解放，”“所以我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革命——打倒一切压迫阶级。”彭湃还指出：“工人农民

---

<sup>①</sup> 彭湃《在海丰农工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上的演说》《彭湃文集》第83页。

要求解放，除了革命一条路，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跑，所以我们应该一致联合起来”<sup>①</sup>。彭湃的报告，受到罢工工人的热烈欢迎，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决议高度评价了海丰农民在支援革命军东征，支援省港大罢工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我们更认识农民确是我们的好朋友。”<sup>②</sup>

十月十八日，彭湃应邀再次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作报告，他进一步阐发工农必须联合起来的思想。他指出：“现在社会中有两种人主张革命最彻底的，这两种人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团结，然后彻底革命才能成功，这两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由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欧洲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农民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工人，这已成为铁律。”他说：“我们工人要革命成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工农联合问题”<sup>③</sup>。

彭湃关于工农联合、互相支援的认识的不断提高，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革命实践，对于广东农民运动以及省港罢工的深入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正当彭湃和粤东一带的农民群众以极大的力量来支援省港大罢工的时候，作为东征军左路军和中路军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却按兵不动，并同北洋军阀段祺瑞及西南军阀唐继尧勾结，阴谋发动叛乱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于是革命政府决定调动在前线的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五月下旬开始，回师的东征军从潮汕一带陆续出发，彭湃动员海陆丰农民，以各种方式帮助东征军回师。“东江各地农友为驱逐刘杨帮助黄埔军，以三千

---

① 彭湃《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的报告》《彭湃文集》第87页。

② 《工人之路特号》，第42期。

③ 彭湃《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彭湃文集》第94页。

余人的运输队使党军迅速到广州平乱。”<sup>①</sup>八月间，仍然盘踞在闽粤赣边的陈炯明的军阀部队，趁东征军撤离粤东、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以及广州国民政府忙于巩固内部的机会，卷土重来。他们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金钱、武器的资助下，气势汹汹地向革命反扑，接连攻陷潮汕各属及五华，他们一路上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九月中旬，陈军进犯海陆丰。

九月二十日，海丰农会派出农民自卫军四百余人，协同驻防军扼守公平、樟树坳等地，抵挡陈军。陆丰农民自卫军也在大安等地构筑战壕防守。后来，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作战略性转移。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根据彭湃和省农协会的密令，向广州方向撤退，十月三日晚，到达了广州，驻扎在惠州会馆。随同撤退的，还有县农会、工会等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县党部的职员。

原任海丰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的李劳工，后来调到陆丰工作。当陈炯明的部队进攻陆丰时，他率领军民顽强抗击，但因撤退的通知他未能接获，以致孤军奋战，寡不敌众，不幸被地主民团陈丙丁部抓获。第二天被押往海丰县城，一时有几千群众围拢过来。李劳工从容镇定地向群众宣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陈丙丁害怕群众设法营救，急令刽子手就地枪决。李劳工中弹以后，仍然高呼“打倒反动派”的口号，全场群众十分愤激悲伤。广东农民运动的杰出战士，彭湃的亲密战友李劳工，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陈炯明的部队攻占了海陆丰后，土豪劣绅乘机而起，勾结陈军，向农民群众反攻倒算。他们放火烧了彭湃的家，捕捉彭湃的亲属，屠杀农会干部和群众。“陈军每到一村，闾阎为之一空，而放火

---

<sup>①</sup> 阮啸仙《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报告大纲》《阮啸仙文集》第25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下同）。

烧毁有二三十乡，打死五六百人。”<sup>①</sup>

彭湃对陈炯明的暴行非常愤慨，他代表东江广东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盼望广州的国民政府再次进行第二次东征，彻底荡平陈炯明的反动势力。于是，一九二五年九月间，彭湃写了《革命政府应如何对待东江问题》一文，具体地阐述了他对东征的必要性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中，彭湃回顾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意义，指出东征胜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军队的奋勇作战，另一方面是由于得到了东江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才有把陈炯明这班反革命派打得这样痛快淋漓。”<sup>②</sup>

文章接着列举了许多具体事实，说明了自革命军回师广州镇压杨、刘以后，陈炯明的反革命军队卷土重来，潮梅东江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在五华县，陈炯明的军队驻安流、棉洋一带，“所经之地，奸淫劫掠，无所不至。”“共计被宰牛七十余头，大小猪三百余只，割去田禾四百余亩，男妇老幼杀害者无算。自鲤鱼岗直至安流、棉洋五十余里，万室皆空，继绝烟火。”<sup>③</sup>

彭湃指出，陈炯明在粤东死灰复燃，对广州的革命政府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如陈部洪兆麟军进入汕头以后，严厉镇压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工农群众运动；同时又“运输大帮粮食进香港，为换得英帝国主义者之大帮军饷”<sup>④</sup>。他们就是这样来破坏省港大罢工和扩充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从而严重威胁着广州革命政府的安全。所以，彭湃认为：“此事如政府果确是坐视不救，东江革命人民对于革命政府必至大失所望，同时东江的革命群众亦必至牺牲于反革命派之手而无疑。如是则革命政府抛弃了东江之

<sup>①</sup> 彭湃：《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的报告》《彭湃文集》第99页。

<sup>②③④</sup> 彭湃：《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彭湃文集》第89、91—93页。

革命群众，而与东江反革命派倒用协调主义，更难免为中国及全世界所大惑不解，同时，革命政府所树立的基础，亦势必跟着而松懈。”彭湃在文章的最后，大声疾呼：“只有马上下动员令，出兵潮梅，收复东江，彻底的把一切反革命消灭个净尽，才能够把东江的老百姓解放出来，同时革命政府也才能够有对外发展之余地。”<sup>①</sup>

在撰写《革命政府应如何对待东江问题》的同时，彭湃还在旅省的惠潮梅各团体中进行联络，以敦促国民政府再次出兵东征。九月十五日，彭湃出席了惠潮梅旅省人民大会，并被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九月二十七日，又出席惠潮梅各团体联合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被推为农民部长。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军事委员会，配合东征军，随军行动。

十月一日，第二次东征开始了。这次东征，以国民革命第一军和黄埔学生军的一个教导团为主力。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是第一军的党代表并兼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征军中许多下级军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在战斗中起了英勇的模范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东征军的士气高涨，进展神速。十月十四日攻下惠州；二十二日进占海丰；二十六日攻克陆丰。

东江和海陆丰、潮汕一带的农民，在这次东征中同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配合作用。不仅是欢迎、欢送、带路，以及后勤支援，而且各地的农民武装还主动地配合军事行动，阻击或追歼陈炯明的反动军队。原撤退到广州、后又到石龙守卫兵站的海丰农民自卫军，一直是东征军的前导，他们首先进入海丰，并在海丰城郊同陈炯明军的激战中包抄敌军，取得了俘敌、缴械各三百多的重大胜利。因而，周恩来指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李侠公（共产党员），将所缴枪支拨出二百多支给海丰县农会，以便进一步武装农民。

<sup>①</sup> 彭湃：《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彭湃文集》第91—93页。

东征军克复海丰以后，彭湃随即进入海丰。十月二十五日，在彭湃的主持下，召开了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彭湃在会上报告了东征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的进军情况，大会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发动农民、恢复和扩大农会组织等问题。

中共广东区委非常重视海陆丰方面的工作，决定将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海陆丰地委，由彭湃任书记，郑志云为组织委员，李国珍为宣传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海陆丰地委也宣告成立。在海陆丰地委的统一领导下，海陆丰地区的工会、农会以及各种群众组织，都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海丰农会的会员，至一九二六年八月，达到四万三千名，比一年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sup>①</sup>一九二六年八月还成立了海丰县工农商学联合会。农会恢复后，“即派农军查缉逆党及查缴逆军遗落枪支。”“农军受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之托，兼任省港罢工纠察队，在汕尾、妈宫、田墘、捷胜等处，尽封锁香港之责。”一九二六年六月间，“农军奉命往惠阳、黄埠等处，协同党军剿灭受香港接济的蔡腾辉逆军。”维持了地方治安。<sup>②</sup>此外，在海陆丰地委的领导下，还举行过有海丰各界群众参加的反日出兵示威大会、援助省港罢工周、援助北京“三·一八”惨案等集会。由一九二五年八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在一年之内，这类群众集会达四十九次之多。<sup>③</sup>在第二次东征后，在彭湃和海陆丰地委的领导下，海丰的群众运动达到了空前高涨，从而使海丰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因此，十月革命后曾到过莫斯科的《少年先锋》记者杨白，在参观了海丰之后，称海丰为“小莫斯科”<sup>④</sup>。彭湃和海陆

---

① 参见《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10号第6页。

② 参见《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5号第7页。

③ 参见《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8号第4页。

④ 《小莫斯科纪游》，载《少年先锋》第1卷第9期，1926年11月20日出版。

丰地委，团结了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让他们参加各级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从而使各项工作更加顺利地开展起来。

## 五、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农民部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彭湃从海丰回到广州，随即参加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工作。

国民党对广东地区的工作，原来是由中央党部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加强广东方面党务活动的领导，着手筹备建立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彭湃和阮啸仙一起，参加了筹建工作。他们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提案》。这个提案包括“广东农民及农业现状”、“广东农民协会发展状况”、“农民自卫军与民团”、“一年来农民协会发生之重要事件”等共十一章。其中着重阐述了“广东农民现在的要求”，提出：要取消“预征钱粮”、“苛捐杂税”、“附加费”等；要求“规定最高限度租额，严办重利盘剥农民者”；“解散各县摧残农民协会之商乡民团，取消民团统率处”<sup>①</sup>等等。

彭湃和阮啸仙起草的提案，分析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回顾了国民党关于农民政策的确立以及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农民目前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痛苦境遇。“农民在政治上所受痛苦最惨酷，最切肤，而且为农民运动之最大障碍的，就是民团。”<sup>②</sup>“除了民团之外，就是本党政府治下之驻防军队与地方官吏。这种军队与地方官，他们表面上是挂名革命，且到处自称老党员，但是他们都是升官发财，不奉行本党党纲，不遵守本党纪律，到

---

<sup>①②</sup> 《阮啸仙文集》第153、156页。

处都是勾结土豪劣绅以压迫农民，摧残农民协会，本党农民运动所得之结果，几乎为若辈摧陷殆尽。”<sup>①</sup>在经济上所受之痛苦，主要是高利贷、当押店的重利盘剥、买卖之垄断居奇、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等等。提案要求国民党必须解决农民的痛苦，才能获得农民的同情，才能吸引农民参加国民革命。

《关于农民运动之报告及提案》，是广东现代农民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它全面地论述了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及当前所应采取的措施，它第一次严肃地斥责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和不法军队破坏农民运动的行径，对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此，这个文件经过大会讨论通过，并且一字不改地作为大会的决议发表，也几乎一字不改地作为广东省向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农民运动的提案。

十月下旬，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彭湃没有出席，但被大会选为由何香凝、杨匏安、刘尔嵩等共九人组成的省党部执行委员。

十一月四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正式成立，彭湃参加了于同一天召开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推选为农民部部长。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二六年六月彭湃提出辞职止，他担任省党部的农民部长有半年多的时间。彭湃利用省党部农民部长的公开合法地位，放手领导广东农民运动，大力促进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

彭湃很重视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国民党的作用，对省党部的活动十分关心。省党部委员会的会议，他几乎每次都出席。他与省党部的其他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一起，在会议上对开展群众运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同破坏、阻挠群众运动发展的现象作斗争，争取省党部作出有利于群众运动发展的决议案。彭湃在省党部的这些活动，对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还在此以前的一九二五年九月间，彭湃再次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主任，后来因为忙于第二次东征，到了前方，直至十一月初才又继续领导农讲所工作。

由彭湃主持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前几届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这届农讲所开始大量招收外省学员<sup>②</sup>，为全国培训农民运动干部。在一百一十四名学员中，湖南、湖北、山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的学员占七十一名，超过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为了使外省学员能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学习理论以及参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实践活动，彭湃特将外省学员单独编班，并提前于九月十四日开课（原定开学日期为十月三日）。这样，第五届的外省学员的学习期间近三个月，比前四届的学习时间都长。

第五届农讲所的另一特点是更加注意培养学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农讲所学员成立了学员自治会，负责处理有关学员的生活、学习等问题，对学员在训练期间的工作能力的锻炼起了有益的作用。

第五届农讲所在训练期内，全体学员先后赴番禺、曲江等地参加农民运动的实习，还于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分赴广州市各地宣传演讲。赴曲江的活动是由彭湃亲自带领，他们参加了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以后，又分成若干小组，赴曲江各地宣传演讲。在乘车赴曲江的往返途中，彭湃组织学员们在火车上讨论“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谁能领导国民革命”、“怎样才能成为真正革命者”等问题，提高学员们联系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sup>③</sup>。在十二月八日的毕业典礼上，彭湃还和全体学员合影留念。彭湃和学员们在工作、学习方面都打成一片，给学员们以深刻的印象。

---

① 《阮啸仙文集》第158页。

②③ 《中国农民》第2期。

彭湃虽然担任了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和第五届农讲所主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仍是以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的身份来开展工作,接近群众。一九二六年初,他先后主持过省农民协会欢迎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农民党员代表、欢迎海员工会代表、欢迎省港罢工工友等大会,并都致开会词。他还代表省农民协会在广东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省农民协会主办的《犁头旬刊》(后改周刊)创刊以后,他不仅常常为刊物写稿,还帮忙审阅稿件,提出刊物出版的改进意见。

一九二六年一月,省农民协会在各地区设立办事处,具体领导各地区农会的工作,这就使得各地区的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大大加强。潮梅海陆丰是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影响很大的地区,彭湃亲自兼任了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在汕头市志成里一号,彭湃就在这里具体领导潮梅海陆丰农民,进一步开展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中旬,普宁农民在县城遭到了方姓地主的打手的无理殴打,激起公愤,爆发了一场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方姓地主勾结县长,并利用家族主义情绪,提出方姓人联合打倒农会的口号,又煽动城里居民同农会对抗。几天之内,普宁各地农会连续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农会方面忍无可忍,奋起反抗。但在开始时由于偏激情绪,竟提出了“打倒方姓”、“打倒城内人”等错误口号。后来在潮梅海陆丰办事处的帮助下得到了改正,明确提出:农民是与方姓几个坏地主、土豪劣绅为敌,不是与方姓人为敌;是同住在城内的土豪劣绅斗,不是与城内人斗。这样,便使方姓的土豪劣绅很快遭到孤立,并且得到了海丰、揭阳、潮阳等地农会的声援,整个斗争形势朝着农民胜利的方向发展。

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以及省农民协会,十分关心普宁县农民的

斗争，决定派彭湃作为省农民协会的代表，前往普宁慰问农民并协助工作。普宁农会接得这个消息后，决定利用彭湃来慰问一事向地主阶级施加压力。于是立即布置各区、乡农会：届时召开全县农民大会热烈欢迎彭湃，并举行示威游行。地主方面得悉了这个消息，极为恐慌，深怕全县农民大会并示威游行，将会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他们于彭湃抵达普宁的前一天，即派出代表到潮梅办事处求和，以便彭湃到达之前把事情了结。一月二十九日上午，双方按照普宁农会提出的条件签了字。这场斗争便以农会的胜利宣告结束。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彭湃到达普宁时，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七千多男女老幼和五百多农军战士，从县城出发步行到离县城二十多里的地方去迎接。农民热爱自己的领袖，把彭湃看作是“万岁”，许多农民妇女和儿童，热烈欢呼，“看万岁来了”、“看万岁来了”。<sup>①</sup>在欢迎大会上彭湃发表了演说，他强调指出：此次普宁农会能够得到胜利，主要是有代表着八十万会员的省农会的支持，因此，今后必须加强农民的团结。彭湃还指出：“地主阶级正在运买枪支，建筑堡城，明明是将来要与我们农民作一次最后的战争！我们此时更要加紧努力，购买枪弹，不要忘记了团结和武装的自卫！如果能这样，将来一定可以取消地主对于农民的各种不平等待遇。”<sup>②</sup>彭湃精辟的演说，博得在场农民的热烈拥护。

普宁农民斗争的胜利，使潮阳、揭阳等地的农民也深受鼓舞，农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农会的威信也大大提高。

二月十六日，彭湃又到海丰，在海丰农民武装大检阅会上发表了演说，对农民武装予以大力支持。

<sup>①</sup> 《普宁农民同地主冲突的经过》《彭湃研究史料》第227—228页。

<sup>②</sup> 彭湃，《在普宁县农民欢迎省农民协会代表时的演说》《彭湃文集》第189页。

这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和各地的土豪劣绅相互勾结，使许多地方的农民运动遭到破坏，农会运动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面对这一新情况，省农民协会决定召开执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彭湃从粤东赶回广州参加会议。

二月二十二日，省农协扩大会议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林伯渠<sup>①</sup>主持下开始举行。彭湃在会上作了《农民部工作经过的报告》。会议总结了省农协前一阶段的工作，特别针对农民运动遭到国民党右派破坏的情况，着重讨论了各地区办事处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问題，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召开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提醒各级农会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对刚建立不久的各区办事处的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贯彻省农协扩大会议精神和准备省二次农大的召开，彭湃于三月中旬又奔赴汕头。三月十八日，为了普宁、揭阳担粪农民争取合理待遇一事，他和农民代表一起，亲赴汕头市政厅交涉，终于获得完满解决。三月下旬，他在汕头亲自主持召开潮汕地区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各县农民踊跃参加农会，并在农会领导下开展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等斗争。这次大会为把潮汕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推向深入作了准备。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是国民党右派向革命进攻的一次试探。四月，彭湃从汕头回到广州，对中山舰事件的发生非常气愤，明确主张要抛开国民党的旗帜，由我们党领导工农群众向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他说：“农民是要求自己的政权的”。在实际工作中，他决心把省农协工作做好。于是，便

---

<sup>①</sup>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所收买的凶手杀害后，农民部长由陈公博继任，1926年2月起，又由林伯渠接任。

投入了紧张的省二次农大的筹备活动。彭湃等在审查二次农大的代表时，发现曲江县农民协会显然是被土豪劣绅所操纵，竟然指派一些坏分子作为出席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经过省农协常委研究，决定派彭湃等亲自到曲江处理这一事件。彭湃到曲江后，领导曲江农民，改组了曲江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机构，重新选出了真正能代表曲江农民利益的代表。曲江事件的及时发现和正确处理，既纯洁了省二次农大的整个代表队伍，又健全了县一级的农会领导机构。

经过充分准备，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起在广州举行。代表着全省六十一个县、六十二万多农协会员的二百一十四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河南、山东、山西、贵州等十一个省，也都派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实际上起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率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也参加了大会。彭湃和阮啸仙等担负大会的领导工作。

广州各界人民群众对这次大会的召开非常关心，在各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几无虚席”，表示了对省二农大的支持。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历时十五天，头三天是与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联合进行。

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诞辰，两个代表大会联合在番禺学宫广场举行纪念大会。参加纪念会的工农代表及各界群众约二万余人，由苏兆征、彭湃等七人组成主席团。彭湃在纪念会的开会词中说：马克思“指示我们，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必然崩溃；他告诉我们，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够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够求得自身的解放，建设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共产社会。”彭湃指出：“我们今天来纪念

他，不仅只信仰他的主义便够了，我们要努力去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这才不辜负今天的纪念会。”<sup>①</sup>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废除地主对于农民苛例》、《工农兵大联合》等决议案，并通过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修正章程》，发表了《敬告全国农民兄弟书》等通电。大会选出了十三名省农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由三人增至五人，彭湃和罗绮园、阮啸仙继续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是广东农民运动空前高涨的标志，它对广东以至全国的农民运动的发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彭湃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期间，除主持第五届农讲所外，还为培训革命干部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举办宣传讲习班，他被聘为教员，讲授《海丰农民运动》。广东区委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开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彭湃又被请去讲课。稍后，彭湃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员，为学员们讲了《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等课。七月、八月间，他又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开办的青年夏令会讲习班多次讲授《农民运动经验》。彭湃的讲课，生动具体，通俗易懂，受到各类训练班的学员们的一致欢迎。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以后，粤东地区的农民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在这同时，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也更加猖獗，潮汕方面的许多工作都急需彭湃亲自处理。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彭湃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第三十次会议上，辞去了省党部农民部长的职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潮汕方面去。

---

<sup>①</sup> 彭湃《在纪念马克思大会上的开会词》《彭湃文集》第192页。

## 六、《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在领导广东农民运动斗争的十分繁忙的日子里，彭湃还十分注意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一九二六年一月，彭湃所著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先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民》<sup>①</sup>第一期发表一部分，以后在《中国农民》第三、四、五期陆续刊完。

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全书六万多字，开始写作于一九二三年，最初的部分草稿，“七五”农潮时被毁，以后彭湃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等鼓励支持下，又重新起草，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才完成。

在这个报告里，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分析了海丰社会的阶级状况，严格区分了地主和农民两大营垒，揭露了地主压迫农民的真相，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运动必然发生和发展的根源。

彭湃指出：地主阶级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军阀、官僚、绅士，是属于压迫阶级。他们不只是通过占农民收成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的高额地租，来剥削农民；而且，还采用殴打、逮捕、强占、迫勒等手段来压迫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是被压迫阶级。他们之中又可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以及自耕农兼小地主五种。其中“自耕农兼小地主及自耕农这两种农民本可自给自足”，经济地位比较优越，但由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农村日趋衰败，许多人也逐渐破产而沦为佃农，“二十年

---

<sup>①</sup> 《中国农民》，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出版的十六开的大型月刊，1926年1月创刊，目前见到的共出版了十期。

前自耕农有十户之乡村，最近只有二三耳。”<sup>①</sup>

最为艰苦的是占农民总数达百分之五十五的佃农。彭湃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述佃农的状况。他以充分而又具体的材料，形象生动地分析了“佃农亏空”这个结论。他认为，一个身强力壮的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需要交纳是收获总量百分之五十的地租，以及除去肥料、种子等成本以外，剩余下来的仅够这个农民自己维持十个月的伙食。因此，彭湃写道：“难道他们除了食之外不用穿衣吗？房屋坏了不用修理吗？夜来不用点灯吗？都不用养父母妻子吗？自己老了无力耕作时，都不用养一个孩子来代替工作吗？”<sup>②</sup>所以，佃农为了解决生活，只得典押房屋，借高利贷，甚至嫁妻卖儿，最后，“遂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为猪仔，或逃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sup>③</sup>

农民由于在政治、经济上遭到地主阶级如此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在文化方面也是处于极端低下的地位。教育只是为地主、富商而设，农民有负担教育经费的义务而没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彭湃指出：“全县教育经费之收入大约百分之八十是抽诸农民，而农民倒不知教育是甚么东西！全县的农民能自己写自己的名字者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他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sup>④</sup>地主阶级还通过文艺、宣传来大量散布封建传统思想，毒害农民，使农民以为自己千世万代做奴隶，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地主阶级在文化方面的控制，巩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统治地位。

彭湃以主要的篇幅，系统地回顾了自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一九

---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06页。

② 同上书，第107页。

③ 同上书，第108页。

④ 同上书，第109页。

二四年初海丰农民运动的发展经过,并总结了这段期间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

首先,彭湃认为,农民运动的发展,由始到终,都必须对农民进行艰苦的、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

由于在封建势力的长期压迫和统治下,农民对于自己所遭受的痛苦境遇,一贯以为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争取自身应有的政治经济权益,则是绝对不敢想象的事情。因此,要使农民起来参加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就必须使农民认识到地主阶级压迫农民是不合理的,认识到农民痛苦的根源在于封建统治制度,认识到农民有力量来争取得自身的解放。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彭湃从事农民运动的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启发农民的觉悟。彭湃在教育农民时,所讲的“就是农民痛苦之所由来,及地主苛待压迫农民之事实,农民应如何解救”等道理,对他的这些讲话,农民“很赞成”<sup>①</sup>。正是这样的宣传教育,才能使农民逐步地发动起来。

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彭湃用了相当的篇幅,回顾了他自己发动农民的历程。农民由不敢和他接近到欢迎他;由不愿听他演说到支持他。表明了要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确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工作。

当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彭湃针对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落后意识,毫不放松地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例如在海丰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彭湃就用各种方式,经常向农民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还注意使农民相信自己的力量以及“养成农民有公共的观念”等等。

其次,彭湃认为,农民发动起来以后,必须引导农民尽快组织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16页。

农会，并加强农会的组织建设，使农会成为领导农民向地主展开斗争的指挥部。

当彭湃开始农民运动不久，只发动了五个农民的时候，他们就立即建立了包括彭湃在内的“六人农会”。稍后，又成立了赤山约农会和海丰总农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建立了惠州农民联合会和广东省农会。

彭湃对农会的建设十分重视。还在赤山约农会时期，农会的领导人就实行民主选举，在农会会员证中印上“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组织原则。到海丰总农会的则制定了严密的《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还发表了包括有十七条之多的《农会利益》传单。海丰总农会设立了农业、宣传、教育、卫生等九个部，分工负责各项工作的开展。

农会不仅替农民办理各种事务，并举办许多教育、福利事业，还领导农民开展了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农会建立后，“乡村的政治权力，已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农会。”<sup>①</sup>“在有农会的时候，地主不敢十分加租、吊田、逼旧新租等等去压迫农民，土豪劣绅、警察以及县城的流氓都不敢鱼肉农民；农会解散之后，他们就向农民进攻”。“在有农会的时候，军阀官僚抽派军饷不敢十分硬派农民，即有之，如以农会团体之名义去请求，也可取消或减轻；农会取消之后，农民如无主孤魂，任人派勒。”<sup>②</sup>因此，农会组织在海丰出现以后的不长时间里，广大农民便已切身体验到，农会确实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自己的组织，因而，农会在农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当海丰的农会组织被反动派摧残以后，农民仍然纷纷表示：“生为农会人，死作农会鬼，杀头也是要干的。”<sup>③</sup>充分表明农会组

---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20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③ 同上书，第174页。

织在农民运动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第三、彭湃认为，农会组织建立起来以后，必须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封建势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还在赤山约农会成立前后，即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大约二、三个月以后，彭湃就领导农民进行了一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如“同盟非耕”、“取消码头捐”等等。这些斗争，对于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海丰总农会成立以后，彭湃和海丰总农会领导了全县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封建势力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其中一九二三年五月反对地主串通法院扣押农民的斗争的胜利，以及同年七月因受风灾、水灾而开展的减租斗争，都对当地以及全省的农民运动发生深远的影响。

通过参加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而且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阶级觉悟不断有所提高，逐步成长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地主阶级看到农民力量的雄伟和农民运动的不可抗拒，他们知道：“农会愈解散，愈发展，愈压迫而愈长大。”<sup>①</sup>因此，迫使地主阶级不得不作出表面的让步，甚至连陈炯明这个反动头子，也不敢公开反对农会，并且不得不说出了：“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这样的违背自己心愿的话来。

第四、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注意斗争策略的运用。

海丰农民运动发展的整个进程，彭湃都注意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中，他着重叙述了“七五”农潮以后，在为恢复农会而同陈炯明展开斗争的过程中的斗争策

---

<sup>①</sup>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彭湃文集》第175页。

略的运用。从这场斗争一开始，彭湃就依据客观实际情况，注意避免提出过高的即“免租”的要求，当农会被解散，一些领导人被捕以后，又利用了陈炯明集团内部的矛盾，争取了释放被捕的农民。虽然农会的恢复最后没有获得成功，但彭湃正确地运用斗争策略，对于这场斗争取得部分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仅从上述的简略介绍就足以表明，《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的发表，是我国现代农民运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它以详尽而具体的事实，阐明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对推动全党加深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主要的力量在领导工人运动，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的认知，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以后，党对农民运动较为重视，农民运动开始迅速发展。但是，从理论上来阐明农民运动的重要性的著述仍然是为数不多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是我党较早发表的专门总结农民运动的、阐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的著作，所以，它的作用不能低估。

第二、《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对早期的海丰农民运动作了系统的总结，成为指导农民运动最好的教科书之一。

海丰是在我党领导下较早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又是农民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地区，关于这点，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已作过充分的肯定。《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对海丰农民运动的全过程作了详尽的记述和总结，这就给革命者，特别是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树立了一个活的样板。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四月曾经把这本书，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一书作了同样的赞扬，他

写道：“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在莫斯科时于一九二九年九月编辑出版的《纪念彭湃》一书中，收入了《海丰农民运动》，并作了序言，向各国革命者作了介绍。

第三、《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既详尽地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全过程，又记载了彭湃本人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的革命活动以及思想发展状况，为研究海丰农民运动和彭湃的革命活动保存了大量的资料。所以，它本身又是一本现代历史著作，成为研究建党初期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并且，由于这本书的文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所以又是一本很有吸引力的文学作品。

正因为《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有着如此广泛的影响，所以，它于一九二六年刊出以后，受到广大革命者的欢迎，因而曾经多次重印出版。一九二六年九月，本书编进《农民运动丛刊》第十九种，初次印出单行本。同年十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这本书改名为《海丰农民运动》，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丛书》之一种出版，周恩来为本书题了书名。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党部农民部又翻印了这本书。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在武汉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翻印这本书作为该所教材。建国以后，一九五三年，这本书被收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重印，一九五九年作家出版社又重印了单行本。在国外，有英文和意大利文等译本。十分明显，《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

## 第四章 逆流中的奋斗

### 一、省农会八月扩大会议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转入一个困难时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所载的《广东农民运动概况》，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

“各地反动势力，在此两三月来，最为高涨，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时时勾结土匪、民团，向农民自卫军及农会尽力摧残。农村中流血惨事，几无地无之”。“各县县长，亦多左袒，予农会以不利。现时全省农民运动，可谓已暂时陷于困难地位。”<sup>①</sup>

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陷于困难，因素固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要求工农群众支援北伐，一方面又对工农运动加以限制打击，这就使得许多窃踞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这时公开地跳出来反对农民运动，尤其是广东各县的县长，成了攻击农民运动的先锋。正如罗绮园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现在各县的县长，没有一个没有一天不攻击农会，与从前的情形很不同了，从前各县县长虽然不帮助农会，但也没有明目张胆的攻击农会，现在他们是很显著的向农会进攻，并且各县一致，好似他们曾经在一块儿开过大会，彼此约定了要取一致的政略一样。”<sup>②</sup>

<sup>①</sup>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下同）。

<sup>②</sup> 《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后广东农运情形》，1926年7月22日罗绮园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同上书第334页。

各县的反动县长破坏农民运动，有些是支持、纵容地主武装——民团，到处摧残农会，屠杀农民，花县、广宁、开建、中山等县的县长就是如此。另一些则是亲自出马，利用职权，压制农会，直接镇压农民运动，如五华、惠阳、三水、海康等县的县长。

这些反动县长敢于明目张胆地破坏农民运动，乃是由于得到广东省政府的负责官员，甚至国民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的默许或公开的支持，这些人是国民党的右派势力。国民党右派掀起这股逆流，严重地阻挠着农民运动、革命运动的发展。

面对着这种严酷的客观现实，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成了革命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不打退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农民运动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前进。为了要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使广东农民运动取得新的发展，广东省农民协会举行了一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彭湃等省农会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的召开。

这次会议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举行。彭湃这时正在海丰参加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海丰的大会还没有开完，彭湃便于八月十八日赶回广州，出席这次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全体执行委员外，还有六个办事处以及四十个县、两个市郊的代表和列席代表共一百零八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十分重视此次会议。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甘乃光、工人部长陈树人、妇女部长何香凝等，都出席了会议。中共广东区委向会议致了祝词，再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的党，同时是代表工农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的党，本党在广东曾经并且永远帮助广东的农民”<sup>①</sup>。

会议听取了《会务总报告》、《全国农民运动最近形势及其在国

---

<sup>①</sup> 《犁头周报》第15期，第39页。

民革命的地位》等报告；通过了《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整理会务》等决议案。

彭湃在会上对《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作了说明，会议讨论了彭湃的说明以后通过了这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提出了广东农民当前最低限度的斗争纲领；在经济方面，要求最少减原租百分之二十五，废除一切杂捐附加税及不法苛抽，规定借贷利率不得超过二分，废除贴租、押租、上期租等；政治方面，要求乡长由乡民大会选举，组织各乡公断处处理乡民纠纷及讼累，公断处委员由乡民大会选举。<sup>①</sup>决议还提出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已有农民自卫军成立的乡村，不得再成立民团”，“民团团董、团长、队长之类应该由全乡人民大会公举。”<sup>②</sup>

提出和讨论广东农民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这次扩大会议的中心议程，目的是制定一个行动纲领，从而团结农民实现要求，“起来打倒反革命派”<sup>③</sup>。

会议闭幕的翌日，八月二十五日，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广州近郊的农民一千多人，组成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七路代表团请愿示威大队”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请愿。这次请愿，由彭湃担任总领队。队伍沿途高呼口号，精神抖擞，到达各个领导机关后都得到有关领导的接见，并表示了对农民运动的支持，这次示威，大大地长了农民的志气。

八月扩大会议的召开，对于动员农民起来为克服困难而奋斗，有着重大的意义。彭湃是会议的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以后，也就以全部精力，投进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去。

---

① 参见《犁头周报》第15期，第13—15页。

② 《中国农民》第10期，第60—70页。

③ 《人民周刊》第20、21两期合刊，第12页。

## 二、调查花县惨案

在省农会扩大会议后，全省农民投入了反击国民党右派、战胜逆流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彭湃站到了最前列，成为在广东省农民协会中反对国民党右派斗争最坚决的领导人之一。调查和处理花县惨案，便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集中的表现。

一九二六年八月下旬，花县的民团勾结土匪洗劫农村，奸淫妇女，惨杀农民，制造了惨不忍闻的花县惨案。彭湃等省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听了花县农协会员的血泪控诉后，都十分愤慨。

花县也是广东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县份。一九二四年就已经建立了一批区、乡农会。一九二四年六月以后，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曾多次赴花县指导农会开展工作。花县的土豪劣绅、封建地主对农会极其仇恨，时时进行挑衅，伺机镇压。一九二五年一月，他们将花县农会的副委员长王福三杀害，造成广东最早发生的地主武装杀害县农会领导人的事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花县民团头子江侠庵又一次向农会发动进攻。

江侠庵本是陈炯明的老师，陈炯明得势后，委任江侠庵当过海丰县长和花县县长。他与陈炯明的关系很密切，彭湃深刻地指出：“陈炯明的反革命，是受他的教诲，他的反革命，是受陈炯明的提拔！”<sup>①</sup>陈炯明失败后，江侠庵在花县专办民团，取得花县民团总局局长的地位。

一九二六年七月，吴佩孚为了牵制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任陈炯明为广东讨赤总司令，大本营在香港，专来扰乱后方治安”<sup>②</sup>。于是，江侠庵紧密配合陈炯明，先从花县发难，招集了四五百土匪、

<sup>①②</sup>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16页。

民团共约千人，集中于平山，于八月二十七日把农民协会所在地宝珠岗、黄麻埗等乡奸淫焚烧，抢掠一空，甚至连灶龕也毁坏，筷子也折断。江侠庵指挥民团制造惨剧的罪行，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恨，广州的报纸也纷纷报道花县惨案的消息，谴责民团的罪行。

花县农民到广州请愿，国民党中央党部即令国民政府出兵前往保护农民，并允许广州市郊及南海、番禺的农民自卫军前往援救。但中央农民部和省农协的代表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领取命令时，总司令部的参议伍观琪却出面制止，不容许农军前往。后经中央农民部及省农民协会再三催促，总司令部才不得已派出国民党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六十团第二营开赴花县。由中央农民部发起，组织了调查委员会，随同军队一起进行调处。委员会由中央农民部邓良生、省党部农民部王岳峰、省农民协会彭湃、团务委员会关元藏、总司令部伍观琪组成。

调查委员会于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三日调查处理了十三天。彭湃由始至终参加了调查委员会的活动，事后写出了《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的报告。

作为省农民协会的代表，彭湃在调处工作中处处从维护农民利益出发，既无情揭露破坏农民运动，残害农民的地主豪绅、民团、土匪罪恶，又同包庇、袒护民团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国民党右派分子伍观琪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抵达花县的第一天，彭湃就阻止了伍观琪想将军队带往民团的大本营驻扎，以造成军队支持民团的假象的企图，而争取了军队进驻民团和农民自卫军对峙的中间地区，保证调处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调查过程中，彭湃经常接近农民群众，认真倾听当地群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同时，又密切注意民团、豪绅的活动以及他们同

伍观琪之间的勾搭。彭湃掌握了大量的有关民团罪恶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这些材料，多次有力地批驳了伍观琪和花县县长敌视农会、袒护民团的反动言行。

抵达花县的第二天，民团和土匪还明目张胆地抢劫了离军队驻地不远的天和圩，被军队捉获民团三名。伍观琪竟然胡说错抓了“好人”，应该释放。彭湃根据调查所得的真实情况，当面给伍观琪予以驳斥：“第一点，民团抢天和圩四次，经过三、四小时之久，圩内没有人做内应是不成的，据圩人说：这三人是开圩门并侦探九湖村农军的动作的；第二点，这三人是本圩的人，受其亲戚民团长的利用，对于国民党及农会是时常造谣破坏的，姑不论他所牵的牛是自己或别人的，断没有跟匪一齐跑的，古今天下只有牵自己的牛去避匪，断没有牵自己的牛去就匪，并和匪一齐跑埋<sup>①</sup>。倘如先生所说岂不是千古奇闻吗？再有一点，假使牛确是他自己的，但他是通匪入天和圩的内应者，人家的东西通通被匪抢尽了，为何他们三人的牛没有被抢呢？……总括一句，这三人就是匪，我们不可把一切归诸误会去抹煞！”<sup>②</sup>彭湃的驳斥，使伍观琪哑口无言。

花县县长李思轅，与伍观琪串通，诬陷农会，在他写的报告中说：“民团有土匪，农团也有土匪”。彭湃在花县见到李思轅时，向他提出质问：你们“的报告书，内面有一句话说：‘民团有土匪，农团也有土匪’。革命军现在是打倒民团的土匪；农民协会如有土匪，可不用革命军出气力，省农民协会是会打的；请你指出匪名和证据来，等我们打给你看！”彭湃的质问，弄得李思轅十分狼狈，不得不说：“没有这回事，农团里是没有土匪，我的报告不是这样说罢！”<sup>③</sup>

① “一齐跑埋”，广州地方方言，即一起跑掉的意思。

②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25页。

③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28页。

当调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要缴那些反抗政府、开枪打国民革命军的民团的枪以后，伍观琪还是竭力为民团开脱。他千方百计地减少民团缴枪的数目，拖延民团缴枪的时间，说什么“因为缴是很困难的，他们散在各处是不容易的，你们没有在乡间办过事，就不知道。实在不比缴军队的那样快！”彭湃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唯民团的枪易缴，因为他们是有身家性命，跑不了，如他们负责的人一根究，不在二三点钟，通通可以交来的，比军队更要容易”<sup>①</sup>。这样，伍观琪便不敢再在缴枪问题上为民团辩解。

在调处过程中，彭湃除了向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外，还十分注意斗争策略，他在扩大革命力量、分化瓦解敌人营垒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奉派前往花县制止民团屠杀农民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师六十团第二营营长雷德，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军人，他拥护革命政府支持农民运动、保护农民协会的主张，痛恨那些为非作歹、破坏社会治安的分子。但他最初对民团制造花县惨案的真相仍是半信半疑，强调要经过调查、弄清事实才能得出结论。特别是对以总司令部参议身份参加调查的伍观琪的面目，认识不清。所以，调查开始时他持着中立的态度，这是不奇怪的。争取雷德站到革命方面来，乃是使调处工作顺利进展的关键。因此，彭湃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对雷德进行思想工作。

彭湃抵达花县的第一天晚上，即同雷德谈话达三小时之久。彭湃请雷德主持正义，“站在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即革命的观点说话。”不论是民团还是农民协会，谁的举动不合于革命的就严办。彭湃说：“不过我敢用头颅来担保花县农民协会是革命的，现在是被

---

<sup>①</sup>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32页。

反革命的劣绅土豪利用民团压迫得可怜不过的。”<sup>①</sup>彭湃接着说：“总理和廖党代表他一生的经验，就是能够用革命的眼光观察和评判一种事实，他就是把革命派团结在自己一边去反对反革命派。可是我们党里现在仍有一部分人暗地里去扩大民团的组织，去扶植民团来与总理的遗产农民协会对抗和破坏，这真可痛心！”彭湃还向雷德介绍了伍观琪的情况：“他从前是民团长，是民团的先辈，现在仍做江村民团养成所的所长，平山的民团，他有许多学生在内。……请你看看他的行动”<sup>②</sup>。彭湃同雷德的长时间交谈，使雷德深受启发，连连表示要坚决维护革命利益，站在革命立场去处理一切。

经过这次谈话以后，在调查过程中，彭湃常常和雷德在一起，引导雷德注意民团和伍观琪的非法行径，又支持雷德在调查委员会中提出的各项正确主张，同雷德建立了密切的友谊。

彭湃争取雷德的工作收到了效果。雷德终于认清了花县惨案的真相，得出了花县民团以及支持民团的土豪劣绅是反革命的正确结论。从而，及时作出了一些正确的决定和行动，包括：必须收缴民团的枪械；请国民政府增派军队前来镇压民团；向上级反映了伍观琪的言论行动，确有包庇民团，为反革命派所利用的重要情况等等。<sup>③</sup>后来，在花县的农工商学兵联欢大会上，雷德又发表了坚决支持农会，表示愿“为民众利益而牺牲”的演说，博得与会群众的热烈赞扬。

伍观琪的心腹，原任江村民团讲习所教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绥靖股员魏尧励，这次作为伍观琪的随员同赴花县。开始时事事

---

①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12页。

③ 参见上书，第244页。

支持伍观琪的意见，为伍观琪奔走联络。为了孤立伍观琪，彭湃也注意对魏尧励进行思想教育。彭湃利用和魏尧励下乡去调查的机会，同魏尧励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彭湃指出，“革命是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奋斗的”，“民团是少数地主劣绅土豪巩固他私人的利益来压迫大多数贫苦农民的”，“所以就要帮助农民去反对劣绅土豪大地主的压迫。退一步不讲革命，来讲天理良心也应该这样做”<sup>①</sup>

由于魏尧励知道花县民团及伍观琪的许多罪恶事实，加上了彭湃的合理合情的劝导，思想上逐步起了变化，开始认识民团和伍观琪的行动是法理所不能容。于是，魏尧励将伍观琪包庇花县民团土匪的许多内幕，向彭湃作了披露，尽管他一再请彭湃不必将这些事实去质问伍观琪，但表明了彭湃对他的谈话已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后来，在调查过程中，农民因受民团压迫而造成的极端困苦的景况，也给魏尧励以很大的教育。最后，当魏尧励被民团枪击负了重伤时，终于觉悟过来，认清了花县民团制造惨案的真相，更加相信彭湃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正确。他在临终前请彭湃记录的口述遗嘱中说：“我现在才觉悟到，因我太过于相信民团，至有今日的日子！”“彭先生，我们以前虽不相识，但你为社会努力，久为我所钦仰，你所讲的话很对的，到了今日我更加相信。彭先生，社会受你福利不少了，请你更加努力奋斗！”<sup>②</sup>

在彭湃以及(除伍观琪以外的)其他委员的努力下，在国民革命军的配合下，调处工作进展得颇为顺利。九月十二日，在调查委员及国民革命军官长的主持下，民团、农会双方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民团应执行赔偿抚恤被焚房屋、缴枪六成、交出凶手等项。彭

<sup>①</sup>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33—23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39页。

湃提出增加的三条款，也获得通过，列入协议，即：“（一）农友被民团打死者，应由民团抚恤其家属；（二）天和圩被劫，商民损失，应由民团赔偿；（三）平山民团应解散。”<sup>①</sup>至此，花县惨案的调处工作宣告结束。

九月十三日，彭湃等回到广州。十四日下午，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省党部农民部、广东省农民协会发起召开欢迎大会，欢迎支援解决花县惨案的国民革命军归来。广州各界参加大会的达五千多人。雷德、彭湃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

接着，彭湃立刻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发表于九月二十日出版的《人民周刊》。《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采取记事体裁，按日记载调查委员会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篇关于花县民团勾结土匪迫害农民的调查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彭湃首先详尽和具体地揭露了花县民团的罪恶。彭湃指出：花县“平山民团局是最反动的，一向是以摧残农民运动为能事”<sup>②</sup>。他们不仅是肆无忌惮地屠杀农民，还勾结土匪，进攻农会和农民自卫军。他们招土匪来助战，每名平时每日二元，战时每日三元，伤者百元不等，死者五百元。

花县民团的这些罪行，地方政府也早有所闻。但是，当县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前往制止时，民团“堵截路口，断绝交通，不得通过”<sup>③</sup>。不仅如此，彭湃和其他调查委员以及国民革命军一个营到达花县以后，民团的嚣张气焰依然如故，竟然与调查委员、与国民革命军为敌。他们发炮和开枪扫射追赶劫天和圩匪徒的国民革命军，呼喊“打哀革命军”等反动口号，并向革命军发起冲锋；他们

---

①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48页。

② 同上书，第216页。

③ 同上书，第217页。

还打伤了国民革命军的班长和士兵，打死了总司令部的军官、调查委员的随员魏尧勋。甚至当农会和民团双方的代表，在调查委员的主持下进行协商，“静候和平解决的期间，民团仍处处向农民进攻”，杀死“稍不满于民团的暴行”<sup>①</sup>的群众。

国民革命军撤离花县返回广州的当天，花县民团又联合土匪对农民进行第二次惨杀。从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几天内，他们在圩镇捕杀农民，抢劫、焚烧有农会会员的乡村，“各处被劫，乡村农民，不得回家安业。”他们还“造谣威吓，说吴佩孚胜利，陈炯明回粤，一切工会已被解散，凡属农会会员定要枪毙等等。”<sup>②</sup>“总之，自革命军撤退后，花县团匪，到处焚劫掳杀，无所不至，不单农民受害，即各界亦不蒙其祸。”<sup>③</sup>所以，彭湃在他的报告上半部于九月二十日发表以后，还特地将这些情况补写在报告的下半部，于十月二日继续发表，及时地将民团的罪恶作全面和深刻揭露。

其次，彭湃在《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中，系统地揭发了国民党右派分子伍观琪，与民团、土豪劣绅勾结破坏革命后方的阴谋。彭湃在文章的开始以至终结，几乎每一个部分，都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伍观琪的反动所为。

彭湃指出，花县惨案发生后，中央农民部和省农会代表前往总司令部请求协助解决时，伍观琪就在替民团辩解，说是“民团与农团械斗，双方都有勾结土匪”，不准农民自卫军前往支援。后来，由于舆论压力，中央组成了调查委员会，伍观琪参加了。但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却处处为民团的罪行开脱，甚至公开偏袒民团，替民团通风报讯，完全站在民团一边，阻挠调查工作的正常进行。

---

①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45页。

② 同上书，第254页。

③ 同上书，第255页。

伍观琪抵达花县的第一天，即以总司令蒋中正的名义，发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说什么“今该民团农团等竟敢抗令，互相残杀，为祸地方，殊堪痛恨。”<sup>①</sup>彭湃在文章中除了全文录出布告外，还加上了评语，说明伍观琪从调查开始即站在民团一边。

当国民革命军遭到民团土匪开枪扫射，革命军决定要解除民团武装时，伍观琪先是以这是“误会”来加以阻挠，断而主张只能解除最小部分的民团武装——乌石冈武装，“就可以保全洛场平山的团匪，不至受政府的打击。”<sup>②</sup>后来，民团再次以猛烈炮火抗拒革命军，革命军准备全部消灭平山的民团土匪。伍观琪深恐怕明日天和圩的革命军去打平山洛场的团匪，并恐怕平山的民团土匪不能抵御革命军而致被消灭，便嘱随员从公文包里取出已盖好有总司令蒋介石印的空白笺，起草了一道制止革命军向平山民团进攻的命令。命令营长雷德率队仍驻天和圩静候命令不可径自动作。<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雷营长也只有按兵不动，听候上峰命令行事罢了。”<sup>④</sup>接着，伍观琪见势不妙，于调处工作还未结束即先溜回广州。此外，伍观琪在平山私自和民团头子的一段关于如何包庇民团的谈话，彭湃在文章中也将大意加以披露，使伍观琪的右派面目，原形毕露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文章的最后，彭湃明确指出：“总司令部参议，并且可以代理蒋总司令署名颁发命令的大权之伍观琪先生，则站在反革命的一边，去包庇匪团，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sup>⑤</sup>

---

①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226页。

③④ 同上书，第241、242页。

⑤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56页。

再次，彭湃在《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中，提出了当前革命存在着的严重问题和今后的出路。

彭湃认为：当前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已转入一个新的形势”，不仅是要肃清广东内部的军阀，而且“非把农村中反革命军阀的根苗铲除不可。所以革命的斗争，由都市而转入于农村，现在正是农村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不断的冲突到最利害的时期。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中，农村的大多数农民，工人，小商人，觉悟的学生，国民党左派的分子，及军人，团结在革命的一边。劣绅，土豪，恶地主，国民党右派，及贪官污吏，逆党匪棍，民团，站在反革命的一边。”<sup>①</sup>这场斗争的关键，在于国民政府的态度。彭湃说：“我们相信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所指导，当然是依照党纲，政策，去努力实现的。”<sup>②</sup>但是，也出现了许多破坏农民运动的事件，象伍观琪就是其中之一。对于此类事件，国民政府如果“不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则一般民众对于革命军，对于政府，对于党，恐怕从此失尽信仰”<sup>③</sup>。

出路何在呢？彭湃认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象这次花县的和平调处会议的办法，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唯有我们真正革命的分⼦站定革命的一边，去消灭一切的反革命势力。尤其是国民政府更应该把里面的贪官污吏加以肃清，而站在革命这一边。积极的去保障民众的集会自由，尤其是农民协会的组织。在目前至少须使农民得到减少重租和高利剥削之痛苦，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势力，那么国民革命的前途，才有些希望！”<sup>④</sup>

---

①② 彭湃：《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文集》第255页。

③ 同上书，第256页。

④ 同上书，第256—257页。

彭湃的《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是在国民党右派向农民运动进攻，广东农民运动转入困难时期的情况下写成的。是当时在广东较早发表的反击国民党右派的重要著述之一。它对捍卫孙中山制定的“扶助农工”政策，促进广东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三、声援五华农友

正当彭湃在调查花县惨案的时候，五华的地主劣绅，勾结陈炯明的余党和土匪，在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纵容下，肆无忌惮地向农民进攻。从九月九日至二十一日的短短十三天内，接连发生地主反动武装和土匪围攻农会、屠杀农民的事件达六起之多。五华第一、二、三区许多乡的农会被捣毁，十多名农会干部、农民自卫队员被杀伤或掳去，农民财物被劫一空，房屋被焚者数以百计，遭难农民达数百人，酿成了五华空前未有的惨剧。声援五华农友，是彭湃在广东农民运动处于逆境的情况下，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另一个集中的表现。

五华也是广东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县份，一九二三年初已有农会组织。一九二三年夏，因风灾水患，农会领导农民要求减租，遭到了陈炯明的武力镇压。革命军进行第一次东征时，受到五华和海陆丰一带几十万农民的热烈拥护，他们配合革命军驱逐陈炯明，立下了很大的功勋。正因为这样，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陈炯明重新占据东江一带以后，五华农民“被其屠杀者，不知凡几，家散人亡，尸骸遍野，号哭连天。”<sup>①</sup>第二次东征开始，“五华、海陆丰的农友，也再死不要命的起来响应党军，驱逐陈逆。参

<sup>①</sup>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64页。

加东征的革命军人，都知道五华农民反抗军阀之决心，和参加革命之勇气，即许崇智也引为世所罕有，遇人必谈。”<sup>①</sup>五华农民对革命的忠诚以及不惜牺牲的精神，受到了广东革命人民的敬佩。

第二次东征胜利，革命军驱赶了陈炯明的军阀势力，统一了东江。五华农民欢庆革命胜利，并向国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惩办仍在农村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陈炯明余党。二是严禁谷米出口，以稳定粮价，保证民食，使农民免受饥荒之苦。三是要求减租二成，以缓解因近月以来水灾、旱灾造成的祸害。尽管这三项要求符合国民党的扶助农工政策和政府的法令，但却触动了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利益，遭到他的强烈反对，甚至五华县长胡諄、东江行政委员徐桴、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刘纪文等政府大小官员，也出面公开指责和阻挠。

一九二六年春，地主豪绅在胡諄支持下，提高粮价，运粮出境，使处于青黄不接的农民群众生活陷于困境。在共产党员宋青、古大存<sup>②</sup>的领导下，五华农会发布了“禁止米谷出口，不准抬高粮价”的布告。地主、奸商有胡諄作后台，有恃无恐，仍继续偷运米谷出境，古大存率领农军武装阻拦。胡諄竟联合地主、奸商，诬告农会破坏工商，扰乱民生。古大存针对这些诬蔑攻击，给予有力的驳斥。经过三天的辩论，地主、奸商理屈词穷，终于迫使县长胡諄按照农会的规定，将农会扣留的粮食没收，低价卖给农民。胡諄恼羞成怒，从此更加怀恨在心。到了六、七月间，五华先旱后涝，作物失收，农会决定减租二成。但胡諄、徐桴、刘纪文上下串通，竟认为“减租殊属

---

①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64页。

② 古大存(1896—1966)，广东省五华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团团长、中共五华县委书记、东江特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红军第十一军军长兼代政委。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等职。

不合”，明令禁止，于是五华地主豪绅磨刀霍霍，准备屠杀农民。

从九月九日起，他们先后围攻、捣毁了一、二、三区农会会所、乡分区办事处多处，掳去农会职员、自卫军人员多名，给以监禁和杀害。他们所到之处，烧房抢物，牛猪米谷，洗劫一空。例如，“二十一日上午七时，大田土匪三百余名，围攻第一区南英乡，农民力薄，不堪与敌，全乡房屋被焚，财物劫尽，难民数百，无家可归，妻哭子号，行将待毙，悲惨情状，实所罕有。”<sup>①</sup>

对于五华所发生的惨剧，彭湃十分气愤，并清楚地看到，这是国民党右派分子反对“扶助农工”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于是，在九、十月间，彭湃接连写了《“敬惜字纸”》和《为五华农友哭一声》两篇文章，声援五华农民，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

彭湃在这篇文章中，首先阐述了五华农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所立下的功勋，以及这次惨剧给五华农民带来的严重祸害，然后集中主要的篇幅，声讨国民党右派的罪行。

彭湃写道：“在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贪官，污吏，保卫团，土匪——这班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派利刀白刃活杀底下的五华农友，断头碎尸，血肉横流，已经是惨到极点了！”<sup>②</sup>但是，这种惨剧不是发生在千百年以前，也不是陈炯明统治的时代，而是发生在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扶助农工政策以后，这实在是耐人寻味。

彭湃指出，五华农民提出的三项要求，是光明正大的，是拥护政府、拥护革命的具体表现。惩办陈炯明的余党，“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巩固革命基础，免致逆党之扰乱；二是保障农友们生命，不至再被逆党的残害。”禁运谷米出口，乃是由于“五华米贵，民食恐慌”，

<sup>①</sup>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68—269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263页。

五华农民联合各界所作出的决议。“谁都承认以地方人民的团体，来救济地方的民食，早成为农村美尚之惯例。”<sup>①</sup>至于因风灾水灾而要求减租，更是国民政府所容许的，早在一九二五年发布的《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二次宣言》中，就已经确定。宣言标明了农民可以减租若干的规定；而且，宣言申明，“如有不遵奉党纲，保卫农民者，政府应即褫夺官职，永不叙用。”一九二六年一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又重申：“本党无论何时，应站在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可见，支持农民的减租要求，乃是政府官员的职责。

可是，在五华县长胡諄的控制下，农民的正当要求不仅全部落空，反而成了反革命势力镇压农民的口实。惩办逆党，“几百次之函电交驰，并屡派代表向政府请愿，而逆党卒至逍遥法外，没有动着毫毛”。胡諄反而“起用屠杀农民之刽子手刘志清（刘志陆杀农民时委为五华县长）为顾问，穷凶极恶，巍冠大帽，出入公门”<sup>②</sup>。胡諄又“受了五华少数包运米谷奸商之运动，竟不顾地方民食，而骤然下令取消米禁，使五华民众，特别是大多数之农民，突起恐慌”<sup>③</sup>。他还“再进一步，瞒报上峰，说五华农会截劫米谷，勾结逆党，危害政府等等大罪”<sup>④</sup>。对于减租二成，胡諄在给上级的报告中竟说农会通告减租“殊属不合”，还污蔑说“五华农会如前清之三点匪，并且到处宣传，今日实行共产，每石谷抽四斗，以打倒官场，并阻挠军饷，贻误戎机”<sup>⑤</sup>等等。

对于胡諄的反动言行，彭湃在文章中除了一一加以揭露外，还

---

①②③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65页。

④ 同上书，第266页。

⑤ 同上书，第267页。

毫不留情地予以严厉驳斥。彭湃指出，胡谔的这些无耻行径的罪恶在于：“其一则利用政府之政治力量，压迫大多数贫苦农民维持活命之减租要求。二则中伤我孙总理所手创之农民协会，谓为三点会匪。三则制造共产谣言为中伤政府之一种手段。四则违抗政府之宣言，即所以破坏政府对于民众之威信。五则直指我政府劝销有奖公债为派题军饷。”彭湃进一步指出：“胡县长之种种行为，为破坏国民党之革命策略，及中伤我国民政府对于人民之威信，此种反革命之官吏，应根据党纪国法，严加究办。至可应根据宣言，褫夺官职，永不叙用”<sup>①</sup>。

然而，胡谔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乃是得到了他的上级、东江行政委员徐桴以及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刘纪文的有力支持。当胡谔诬陷农民的报告送交东江行政委员公署以后，徐桴公然胡说：“该县各区农民协会通告减租各节，殊属不合”<sup>②</sup>，并命令五华县长禁止。稍后，徐桴还下达了一道授予五华县长胡谔全权镇压农民的命令，说“该县农会所有以前种种不法行为，正在须待拿究之列，嗣后一切动作，自应痛改前非，按道而驰。……仰即查照前令，先行布告所属人民，一体知照，嗣后遇有关于所控农会之事，径呈该县查明，依令办理，毋庸再由本公署核转，以尊重政府命令森严之至意。”<sup>③</sup>彭湃指出，“徐桴这个命令，差不多要厉害过陈炯明、刘志陆、钟景棠的机关枪大炮和斩首刀。……就是教胡谔彻底的反革命，快快把五华农民杀个清光。又教五华一般反革命派……加紧进攻，向农民下总击令。”<sup>④</sup>所以，彭湃十分愤慨地说：“徐桴这个

---

① 彭湃《“敬惜字纸”》《彭湃文集》第261页。

② 同上书，第259页。

③④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68页。

森严的命令，固然把农民打坏了，即总理的三民主义，农工政策，党纲，宣言，遗嘱，都跟着五华的革命农友负着重伤！”<sup>①</sup>

农工厅长刘纪文，支持胡谔，破坏农民运动的手段更加狠毒。当他收到五华土豪劣绅反对减租的电文以后，利用他所窃踞的职权，竟以广东省政府的名义，下达了“查五华农会违法越权，种种骚扰，昨据农工厅呈请核办前来，业经省务会议议决，行县拿办”<sup>②</sup>的批示。这样，五华县长和地主豪绅，破坏农会、拘捕农民的反革命行径，却得到了广东省最高当局的支持而成为合法的行动了。另一方面，当国民党“五华县党部，控告胡谔摧残党部，解散工会，压迫农民种种不法，证据确凿，由省党部咨省政府处置”的时候，“刘纪文则复谓，‘调查结果，并无其事’。”<sup>③</sup>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刘纪文，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造谣污蔑，奉若神明；而对国民党省党部的严肃的咨文，则拒不接受，其破坏农民运动、反对革命的立场实在是昭然若揭。彭湃讽刺地指出：“这不但陈炯明要感谢他，吴佩孚、张作霖与帝国主义者，都要向刘纪文先生，致反革命的敬礼。”<sup>④</sup>

彭湃在文章中对胡谔、徐桴、刘纪文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揭露和批判，既反映了五华农民所遭受到的灾难的根源，又暴露了这些人的反动嘴脸。彭湃在文章的最后，对酿成五华惨案的根本原因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是政府对于逆党太过宽大，所以一般陈刘余孽得以公然在乡村活动；第二是县长胡谔违背党纲政策，并与逆党互相勾结；第三是行政委员徐桴，农工厅长刘纪文，也不要了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也忘记了政府对于农民运动迭次之宣

---

①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68页。

②③ 同上书，第267页。

④ 同上书，第268页。

言,竟为反革命派有力之援助,使农村之反革命势力得到政治上的帮助,一爆发而不可制止;第四是国民政府这次北伐,一般逆党乘机来扰乱后方,摧残革命势力,尤其是农民运动。”彭湃更加明确地指出,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谁呢?“可以说是胡淳、徐桴、刘纪文三位陈炯明的信徒罢!”<sup>①</sup>

通过五华惨案,暴露了革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彭湃在他的文章中,阐述了他对革命存在的困难和今后斗争的方向的看法:“广东目前国民党革命的对象,对内方面,已经不是打倒军阀的势力,而是在如何消灭军阀势力之根源——农村中逆党、劣绅、土豪、大地主、民团……等反革命势力。也就是国民革命到了一个难关。这个难关,如果我们很勇敢的通过去,国民革命就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倘我们懦弱无能就通不过,那吗,国民革命要因此再经一度的失败”。<sup>②</sup>怎样才能克服这个困难呢?彭湃认为,关键在于支持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农民运动。他说:“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本党无论何时,应站在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这就是打破这个难关最有力量的口号。给我们一个革命的方针!”所以,彭湃号召五华的农友,“你们不要灰心,你们鼓起从前的勇气,……你们继续努力吧!最后的胜利,终属于你们!”<sup>③</sup>

《敬惜字纸》和《为五华农友哭一声!》两篇文章,既声援了五华农民以至广东各地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又和《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一文一样,声讨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罪行,表现了彭湃在困难时期继续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

---

① 彭湃:《为五华农友哭一声》,《彭湃文集》第270页。

② 同上书,第269页。

③ 同上书,第270页。

#### 四、领导潮梅地区的斗争

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五日成立，彭湃以省农会常务委员兼任办事处主任，他主持办事处工作一年多，直至一九二七年三月离粤赴武汉时止。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前，彭湃担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主要任务还是负责省农会的工作。六月以后，彭湃的工作重点才转移到潮梅方面来。一九二六年十月，中共汕头地委成立，彭湃是地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这样，潮梅地区的农运领导力量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起，潮梅地区的革命形势和全省一样。一方面，工农群众运动仍然不断地发展；另一方面，反革命势力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也十分猖獗，斗争极其尖锐复杂。

以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非常关心潮汕地区的斗争，他们听取了地委书记罗明的汇报后强调指出：一、地委应加紧巩固和扩大工会、农会组织，不断加强汕头工人纠察队和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二、党应对工人、农民进行宣传，要拥护和支持北伐战争，如果北伐军的右派军官敢于侵犯工农的利益，我们应当组织工农反对他们；三、要警惕资产阶级新右派叛变革命，提防他们的突然袭击。<sup>①</sup> 汕头地委和彭湃都是坚决执行区党委的指示，为发展潮汕地区的革命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正式出师以后，广东各地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借口支援北伐，压迫工农群众，破坏工农运动，甚至还企图取消省港大罢工。彭湃了解到，这种情况在潮汕地区特别严重。为

---

<sup>①</sup> 参见罗明《风雷激荡闽粤间》、《广东党史资料》第3辑第104页。

此,彭湃写了《〈公债票与农民〉篇后》和《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八月份的《犁头周报》和《人民周刊》。

在前一篇文章里,彭湃揭露了潮汕地区的贪官污吏、劣绅土豪、陈炯明余党借“北伐军饷”名义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彭湃说:“潮梅得到政府要派公债二百万元的消息,就有三种人是喜欢不过的,……第一种是贪官污吏;第二种是劣绅土豪;第三种是陈逆余党。”<sup>①</sup>贪官污吏“把政府发出的‘有奖公债’,换转过个名目叫做‘北伐军饷’。……并且口口声声说奉总司令电严催军饷,刻不容缓,更使一般人民俯首贴服,不敢过问。那么贪官污吏就和少数劣绅土豪合作,从中渔利”<sup>②</sup>。彭湃指出:他们摊派公债是采平均负担的办法,“贫穷的家,虽三岁小孩不免,和那几百万的财主佬,同样的负担。这种摊派方法,不但使政府得不到钱,贻误了财政的收入,并且惹起了大多数穷人来反对政府,只有劣绅土豪从中发财罢了。”<sup>③</sup>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借派“北伐军饷”来破坏农民运动。他们“专来派那些加入农会的会员,尤其是农村较为革命的农友派得更多而且重。……倘你退出了农会,以后不要加入,倒容易磋商一点。”<sup>④</sup>如果农会支持贫苦农民减免,他们就说“农民协会在那里阻挠,……大骂农民协会是反革命了。”如果农会劝说农民“宜极力负担”,不但农民“无法可出”,而且会说农会“反坐视那富者不用出钱,贫者负担得很重而不救”<sup>⑤</sup>,从而对农会产生怀疑。所以,彭湃愤怒地指出:“我们一面北伐去攻城夺地,后方拼命来弃掉民众。不但北伐无胜利的保障,国民政府的革命基础,且要

---

①② 彭湃:《公债票与农民》,《彭湃文集》第198页。

③④ 同上书,第199页。

⑤ 同上书,第200页。

断丧在一般贪官污吏、劣绅土豪、逆党之手。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啊！”<sup>①</sup>

彭湃的后一篇文章，则是针对“省港罢工妨碍北伐”的论调而写的。彭湃认为，“这种见解，是非常错误的。”<sup>②</sup>彭湃在文章中，以吴佩孚比作前方的敌人，以香港的英帝国主义比作是后方的敌人。他说：“香港帝国主义在过去的历史和最近的事实，处处都足以证明是破坏我们广东革命基础唯一的大敌。”<sup>③</sup>彭湃认为，我们的后方是比过去巩固了，但反革命势力也正在滋长，“就是一些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动地主买办阶级，土匪，散兵，流氓和陈炯明的余党，……这几种人差不多有意或无意，直接或间接，受了香港英帝国主义的指挥。”<sup>④</sup>因此，一旦取消罢工，撤销封锁，则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和陈炯明余党，便乘虚而入，与内地的反革命势力联成一气，“广东就会变成腹背受敌的局势，北伐不会因此而失败？”“所以省港罢工是巩固革命基础的一种力量，一定要和北伐军军事行动联结在一起，才有互相掩护之效能。”<sup>⑤</sup>因此，严密封锁香港和讨伐吴佩孚，应该有同样的意义。

彭湃进一步指出：即使没有省港大罢工的封锁香港，“国民政府在北伐的计划里面亦应采用封锁香港的政策，封闭这个‘危险之门’才能担保革命基础得着安全巩固。不然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北伐恐怕没有成功的希望”。彭湃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们为着拥护北伐的胜利，必定要赞助省港的罢工；为要拥护省港罢工的胜利必定要赞助北伐”<sup>⑥</sup>。

---

① 彭湃：《公债票与农民》，《彭湃文集》第201页。

② 彭湃：《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彭湃文集》第202页。

③④ 同上书，第203页。

⑤ 同上书，第204页。

⑥ 同上书，第205页。

彭湃的这两篇文章,是农民运动处于困难时期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进攻,彭湃领导潮梅地区的农民,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九日,海丰召开了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人。到海丰参观的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三百多人也列席了会议。大会期间,还同时举行海丰工农商学联合会成立大会。

大会开幕那天,海丰农民群众六万多人,举行了“七五”农潮三周年纪念大会。八月十七日,举行慰劳农军大会,彭湃以广东省农会代表身份发表了《慰劳词》。彭湃指出:农民要解放,只有“联合工人兄弟等,向革命的路上跑,使革命成功。”彭湃认为:“农民必须有了武装,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因为我们的敌人,也是有武装的,我们要打倒敌人,就要先武装自己。”<sup>①</sup>彭湃在这里把农民武装提高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次大会对当时的反对逆流的斗争有着重大的意义。

与此同时,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广东省农民协会举行了一次以研究如何对付国民党右派进攻为中心议题的执委扩大会议。彭湃参加并领导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稍后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联席会议,都着重讨论了农民运动问题;十二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也作出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尽管这些会议对国民党右派产生着道义上的压力,但没有能力制止右派向革命的进攻。

十二月十一日,揭阳县的土豪劣绅周伯初、李德萱等,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竟然指使流氓,绑架了赴揭阳指导工作的中共汕

---

<sup>①</sup> 《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第7号第3—4页。

头地委工运负责人、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石魂。流氓用棉花塞住杨石魂的嘴，用布蒙住他的眼睛，将他秘密囚禁在潮阳县属的柳岗乡山洞里。那伙流氓，拳脚交加，毒打杨石魂，直把他打到昏死过去。然后，又剥光他的衣服，往他身上泼冷水。杨石魂苏醒过来后，流氓又将他拉到荆棘丛中，象拉锯一样来回拉动，杨石魂皮开肉裂，鲜血淋漓，但他仍然没有屈服。

彭湃听到了战友杨石魂被绑架的消息，立即从梅县赶回汕头参加了汕头地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领导工农群众开展示威斗争，并派彭湃会同汕头各团体及潮梅警备司令部的代表，组织查缉委员会，当夜前往揭阳。彭湃到揭阳后，义愤填膺的农会会员，已将揭阳县城团团围住，彭湃与农会领导人商量后，一方面组织群众，前往县府请愿示威，向县长提出释放杨石魂、严惩凶手、保护工会农会干部安全等三项条件。同时，彭湃又和查缉委员会成员一起，直接向揭阳县长交涉。彭湃指出：杨石魂是在揭阳被绑架的，县长应负责任。杨石魂是潮汕的工人领袖，不放出杨石魂，不仅揭阳的工人农民不会罢休，而且整个潮汕的工人农民也是不答应的。揭阳县长起初支吾推搪，装作不知此事，彭湃列举事实进行质问，使这个右派县长无言以对，十分狼狈。

查缉委员会同县长的交涉没有结果，便限令周伯初等劣绅克日将杨石魂释放，但也被置之不理。汕头等地的工农群众闻讯，十分激动，纷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岭东民国日报》等社会舆论又纷纷谴责揭阳右派分子的卑劣行径。最后，在农军包围了县城向反动派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他们终于不得不将遍体鳞伤的杨石魂放出。

十二月二十日，杨石魂在彭湃的陪同下回到汕头。工农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大会，欢庆斗争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彭湃和杨石魂等主持下，在汕头召开了东江工农商学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大会通过了在农村中进行减租退押等多项决议，并推选出参加即将在广州举行的全省工农商学代表大会的代表。

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汕头召开，粤东十七个县的代表近四百人出席了大会。彭湃担负了从大会筹备到召开的领导工作，倾注了他的全部精力。

在大会开幕以前，彭湃就发表了《为什么要开这个大会》一文，说明这次大会是为了检阅本身力量及扩大组织、巩固内部，以便更好地对付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彭湃又向大会作了《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

彭湃在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办事处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在组织方面，粤东十七个县都有了农会的组织，其中有七个县已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三个县的农民协会在筹备中；成立了区农民协会的有六十二个，成立区农会筹备处的有十七个。潮梅海陆丰全区的农会会员达二十七万人。

在领导农民斗争方面，报告指出：一年来，粤东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展。其中最为重要、最有影响的是普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五华农民反抗贪官污吏的斗争以及海陆丰农民反对陈炯明的余党的斗争。彭湃在报告中对普宁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彭湃在总结了所有这些斗争后指出：从这些斗争看来，地主劣绅和贪官污吏勾结起来破坏农民运动，已成为当前农民运动发展中一股逆流；特别是“那般挂着党的招牌的假革命者，是站在土豪劣绅方面来压迫农民兄弟的。”<sup>①</sup>因此，彭湃认为，政府的许多官员，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所以，“我们不

好靠政府的力量，还要应用自己的团结的力量，使各路的农民兄弟和民众，都互相帮助。”<sup>②</sup>在这里，彭湃已经清楚地看到，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动，各级政权机关已逐渐变成革命发展的阻力了。

为了战胜假革命者，即国民党右派分子，彭湃强调指出，必须大大增强农会的力量，进一步健全农会的组织。但是，“现在各县农会除海陆丰外，组织还是很很不健全，一方面各县的土豪劣绅是很厉害，近在筹备和我们战斗。我们为着要百战百胜，所以，应先检查我们本身的力量。”<sup>③</sup>在报告中，彭湃号召各县的代表，随时警惕假革命者的阴谋。

大会根据彭湃的报告，着重讨论了增强工农群众的团结，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斗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大会通过了十六项决议及宣言，并以大会名义要求省农民协会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

大会闭幕以后，彭湃于三月上旬离开汕头前往广州，参加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扩大会议于三月十日至十七日在广州举行。会议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试图讨论出一个方案，来挽救处于危急关头的广东农民运动。但由于整个革命形势的逆转，这次扩大会议未能提出一个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

扩大会议闭幕后，三月十七日，彭湃和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参加中共的“五大”。

---

①② 彭湃《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彭湃文集》第274—275页。

③ 同上书，第275页。

## 五、在全国农协和出席党的“五大”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彭湃作为出席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同广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离穗北上。

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代表团从广州乘火车到乐昌后，便得步行及坐轿子前往湖南郴州，再从那里改乘小船经衡阳到长沙，在长沙才又乘火车至武昌。他们沿途跋涉，跨过粤湘交界的山区时还冒着日晒雨淋，这样经历了将近半个月的旅途，于三月底才抵达武汉。

在彭湃到达武汉的前一天，即三月三十日，已由粤、湘、鄂、赣农民协会代表发起，组成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彭湃被推为临时执行委员。

自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以后，在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的影响下，在第六届农讲所学员返回各地工作的推动下，湘、鄂、赣的农民运动，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高潮。据一九二七年三月的统计，全国除粤、湘、鄂、赣四省正式成立了省农民协会外，桂、皖、苏、浙、闽、川、直、鲁、豫、陕、热、察、绥等十三个省，都成立了省农协筹备处，全国有组织的会员达九百五十万人。其中湖南近五百万，湖北二百五十万，广东七十万，江西三十一万，部分地区还建立了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

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正式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彭湃和阮啸仙、易礼容、陆沉等共七人为委员。在中共中央农委积极建议和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武汉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组织全国农民协会的筹备

问题。毛泽东、邓演达、方志敏等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由湘、鄂、赣、豫的有关代表负责会议筹备。三月三十日下午，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省的农民协会代表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谭延闿、谭平山、彭湃、方志敏、易礼容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组成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所以，彭湃到达武汉以后，就参加了全国农协的日常领导工作。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举行欢宴大会，欢迎国际职工代表团以及由广东来到武汉的苏兆征、彭湃。彭湃刚卸下行装，便出席了欢迎宴会。宴会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致欢迎词，他在谈到欢迎彭湃的意义时指出：彭湃同志“领导广东八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作了好几年的种种斗争，此次北来对湖北的农运必有更好的指示，对全国的农民运动必定有更好的贡献，对于农工联合必定有更好的团结。”<sup>①</sup>第二天，《汉口民国日报》也发表了由高语罕写的欢迎社论，社论说：“彭湃同志代表广东八十万、也可以说代表全国八百万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站在我们全国被压迫的人民面前，告诉我们全国的农民起来了，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进攻了。”<sup>②</sup>

四月二日，湖北省农协又举行大会，欢迎国际职工代表团和参加筹备全国农协的各省代表，彭湃出席了欢迎大会并发表了讲话。彭湃说：“我这次是代表广东农民协会到湖北筹备全国农民协会的。兄弟代表五十万农友向各位致敬！广东的农民在民国十一年的时候就起来了，他们看着俄国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工人管

---

①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②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理工厂，农人得了解放，也起来革命了。”“现在他们的组织非常巩固，他们在讨伐杨刘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只要努力，胜利总在你们。”<sup>①</sup>

彭湃到达武汉以后，就住进了毛泽东的住处——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这是一座老式的普通庭院，进大门后经过一个小天井至大厅，大厅右边房间是毛泽东的住室，隔壁的房间就是彭湃的住处。彭湃在这里经常同毛泽东一起研究工作，交流情况，共同领导全国农协的工作。

还在彭湃到武汉以前，毛泽东已经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已于三月七日先行上课，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也列为学员的必读书籍。四月四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彭湃出席，并发表了演说。他鼓励学员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技术，把自己培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后来，彭湃又到中央农讲所为学员讲授《海丰农民运动》，分两次讲完。彭湃的讲课语言生动，善于运用图解，既有革命理论，又有实践经验，深受学员们的欢迎。

四月上旬，彭湃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农协负责人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负责人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重新分配土地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的主张，彭湃和方志敏都表示积极支持。

要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分别设立的土地委员会里，还是在全国农协的临时执行委员会里，它都是人们热切关注，且争论很激烈的问题。

---

<sup>①</sup>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3日。

彭湃早在一九二一年发表的《告同胞》一文中，就明确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土地公有。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召开的海丰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彭湃和李春涛专门向一百二十六位代表调查对土地问题的看法，结果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民代表都主张土地应该归公有或集体所有。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彭湃作了发言，他引用了上述的调查材料，强调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减租虽有利于农民，但不能解决农民痛苦。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他说，“政权在农民手里的地方，土劣势力不大，土地问题还容易讨论，至土劣势力甚大的地方，则农民必先要求武装。”<sup>①</sup>彭湃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能够贯彻，对推动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正当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紧接着，四月十五日，留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也叛变革命。武汉的国民政府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主持下，声讨蒋介石叛变的罪行，准备东征“讨蒋”。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并下令通缉包括彭湃、彭汉垣在内的一百九十七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彭湃的革命义愤，决心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派他的哥哥彭汉垣迅速潜回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以及吴振民、郑志云等取得联系，寻找时机举行武装暴

---

<sup>①</sup> 1927年4月19日《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动，以反抗蒋介石的屠杀。在中共海陆丰地委的领导下，海陆丰人民第一次武装起义于四月三十日夜间爆发，吴振民指挥海丰农民自卫军很快便占领了各机关，并收缴了当地反动武装的枪械。起义胜利后，海丰、陆丰和紫金分别建立了人民政府，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

海陆丰人民的武装起义给国民党叛变者以很大的震动，惠州的师长胡谦派兵进剿。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农民自卫军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海陆丰，由吴振民率领北上，准备前往武汉同彭湃会合。沿途经过五华、梅县等地，又同敌人进行了几次遭遇战，才辗转至湘南汝城，与宜章农民自卫军会合，就地进行休整。中共湖南省委得知海丰农军的到来，便向中共中央建议：“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农军他调”<sup>①</sup>，以便壮大当地的革命力量。但是，海丰农军的行踪被国民党反动军队范石生部侦悉，他们以两个团的兵力袭击汝城。在激烈的战斗中，农民自卫军伤亡过半，吴振民也在战斗中因伤重而牺牲。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彭湃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在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了批评。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只作出一些调和性的决定。彭湃在五大的发言支持瞿秋白、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会上未加讨论。五月九日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

“五月二十日，中央常委讨论了广东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决定

---

<sup>①</sup>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运动大纲》（1927年8月）。

陈延年不再回广东，由彭湃、穆青、黄平另加赖玉润、阮啸仙等组织广东省委。”<sup>①</sup>后来由于时局急剧变化，彭湃便暂留武汉，负责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同时，还兼任两广接待委员会书记，负责接待来自两广的同志。

六月初，彭湃离开武汉，秘密到达南昌巡视工作，他住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黄家巷五十八号，在那里会见了朱德和罗亦农。彭湃到达南昌的时候，南昌的局势已日趋紧张，到处出现了“欢送共产党出境！”“制止工农运动的过火”等标语。六月四日，江西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提出“分共”，限令方志敏等二十二名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物离开江西，并通令各县禁止工农运动。第二天，朱培德的部队包围、封闭了省农协、省总工会，各县的反动份子也乘机向农民协会进攻，吉水、新建、弋阳、泰和等地相继发生捕杀农会会员事件。六月五日晚，彭湃和罗亦农、方志敏以及江西省委的其他同志举行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在这以后的几天里，彭湃和方志敏住在一起，彼此经常交谈，研究工作，建立了非常密切的战斗友谊。稍后，在江西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彭湃作了《关于当前形势与农民运动》的报告。

六月中旬，根据省委的安排，方志敏赴吉安坚持开展农民运动。临出发前，方志敏和缪敏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彭湃和其他几十个同志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为了庆贺他俩的结婚，彭湃即席写了一副对联：“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彭湃的词句虽短，但结合了当时的形势，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容。

参加了方志敏和缪敏的婚礼以后不久，彭湃离开南昌，经九江

---

<sup>①</sup>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党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44页。

秘密回到武汉。

由于武汉政府日趋反动，形势日益紧张。六月底，彭湃对广东留在汉口的同志说：全部同志都要回广东工作。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武汉国民党可能叛变，但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黄琪翔部（有许多共产党员在内）可能与我们合作，打回广东去。彭湃要求同志们回广东以后，要发动地方武装配合，并随即布置杨石魂、陈启昌、杨雪如等回潮汕工作，迎接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 第五章 创建海陆丰苏维埃

### 一、南昌起义前后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反革命政变。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坚持革命斗争，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在武汉根据周恩来等的建议，作出了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彭湃被推为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离开武汉经九江赴南昌，投进了一场新的战斗。

七月二十七日，作为南昌起义的领导中枢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彭湃、李立三、恽代英等为委员。前委于当天召开了会议，详细讨论了有关起义的一系列问题，决定起义于三十日晚举行。

七月二十九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两次从九江发电来阻止起义的进行。三十日，张国焘赶到了南昌，并在前委紧急会议上，提出了起义没有绝对成功的把握不能举行；没有张发奎的同意不能举行等错误主张。“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sup>①</sup>彭湃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一起和张国焘争论了数小时，但因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以简单的多数来作出决定，双

---

<sup>①</sup>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原载1927年10月30日《中央通讯》第7期。见《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2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下同）。

方意见无法统一，只得继续开会讨论。原定三十日晚起义的计划不得不推迟了。经过三十一日上午前委长时间的会议争论以后，张国焘才不得已表示服从多数。起义遂决定于八月一日凌晨二时举行。后来，发现叛徒的告密，前委又临时决定将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发动。

二月一日零时刚过，南昌城内外就已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南昌起义的战斗打响了。以贺龙指挥的二十军，叶挺指挥的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和朱德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官教育团为主力的起义部队共三万余人，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将国民党三、六、九军留在南昌的部队约一万人完全解决。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

起义胜利后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革命政权，前委决定组织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机构。八月一日上午，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了包括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市及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产生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政权采用这个名称，是表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的汪精卫政府。革命委员会下设参谋团、秘书厅、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以及财务、宣传、农工运动、党务几个委员会。彭湃以广东省党部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席会议，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农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八月二日，南昌各界群众数万人隆重集会，庆祝“八一”起义胜利暨革命委员会就职。彭湃和其他委员一起在会上庄严宣誓，决心“为全国大多数民众利益奋斗到底，绝不妥协，以完成国民革命工作。”<sup>①</sup>

---

<sup>①</sup> 江西《工商报》1927年8月3日。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蒋介石，汪精卫都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前委和参谋团决定撤出南昌，南下广东，计划“迅速地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sup>①</sup>，以广州为革命基地，重新北伐。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彭湃和农工运动委员会一起，随军南下。

农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共约四十人，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工农运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政权。起义军沿着赣东山区南下，道路崎岖难行，又值盛暑，不少战士患病，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当了逃兵。因此，加强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振奋士气，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彭湃亲自参与这一工作，他在行军的路边写标语，画漫画，他和战士们一起，一边行军，一边唱《国际歌》、东江山歌、广东戏，讲革命故事，勉励战士们克服困难，勇敢向前。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歌声和笑声，战士们十分欢迎彭湃，称他为“快乐之神”<sup>②</sup>。彭湃的言行中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有力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增加了战胜敌人的勇气。

起义军经过广昌后，分左右两路纵队前进，商定在壬田会合后进入瑞金。农工运动委员会随左纵队前进。八月中旬，部队抵达宁都附近宿营，农工运动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那时，蒋介石不仅调集军队在壬田一带堵截起义军，而且指令反动的AB团分子潜入起义军的驻地，伺机进行破坏、袭击。当时有二三十个AB团分子曾拟定了袭击农工运动委员会的计划，并派人到农工运动委员会驻地侦察动静。一个AB团侦察人员的鬼祟行动引起了彭湃的注意，彭湃便故意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套取AB团的实情。这个家伙竟然中计，把彭湃带到一个山岗的树林深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摘要（1927年），《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88页。

② 吴明，《彭湃印象记》，《彭湃研究史料》第356页。

处，和另外几个同党会面。在谈话过程中，彭湃出其不意拔出手枪，将这几个家伙制服，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从而使AB团分子夜袭农工运动委员会的计谋被打破。<sup>①</sup>

部队经过宁都以后，八月二十七日，左右两路纵队都进驻瑞金。起义军在瑞金驻扎了一个星期。前委则抓住间隙时机，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土地政策等问题，彭湃参加了会议。

起义军离开瑞金后向福建长汀进发。过长汀后，彭湃跟随前锋部队行军，于九月十二日和周恩来一起第一批进入上杭城。

在上杭，彭湃参加了前委召开的再一次讨论土地革命政策问题的会议。土地革命政策，是当时党内争论较多的问题。还在南昌起义前夕，党的领导机关就曾在九江讨论过土地革命的政纲。当时，恽代英、李立三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谭平山则反对，认为这样会引起反动势力的进一步联合和革命军队内部的分化。后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指出南昌起义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要一路实行土地革命。南昌起义后，农工运动委员会提出了《农民解放条例》，具体规定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政策。南下途中，来自广东农村的战士，在议论土地革命问题时尖锐地指出，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根据这些群众意见，前委在瑞金召开的会议上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取消了亩数限制，并对原有农民解放条例提出修正。在上杭召开的前委会议上，张国焘又认为“没收土地”会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对小地主应予保护。他提出把“没收土地”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方案，但遭

---

<sup>①</sup> 参见萧三《彭湃》，原为俄文，写于1932年，由李辉译为中文（未刊稿）。

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正是这时，中共广东省委送来一份关于土地革命的详细政纲，其中规定没收三十至五十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对于其他依靠田租为生活者的土地，不予没收。于是，张国焘借此提出要再次召开前委会议讨论，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主张。这个只没收五十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纲领，显然是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在南方大地主极少的情况下，它保留了为数很大的中小地主的土地，这对于发动农民参加反封建斗争起着消极的作用。对于这样的土地革命纲领，彭湃历来都不同意，在几次会议中，他都反对谭平山、张国焘的意见。他在和福建省委派来上杭与起义军联系的罗明交谈时，曾向罗明讲述过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和张国焘争论的情况，彭湃说：起义军一路上没有实行土地革命，没有分配土地，当然是因行军急骤的限制，但主要的还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张国焘、谭平山不主张实行土地革命的缘故。<sup>①</sup>

上杭停留只有几天，彭湃和农工运动委员会还是召开了群众大会，惩处了一批土豪劣绅，人心大快。接着彭湃便跟随朱德率领的部队向广东进军。进入大埔县境以后，改乘木船沿江顺水直下三河坝，起义军分兵二路，一路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以监视梅县方向的敌军；起义军的主力则直奔潮汕。熟悉潮汕情况的彭湃，改随起义主力部队行动。

彭湃又回到他长期工作过的潮汕，他充分利用自己熟悉情况的有利条件，努力开展工作，主动承担繁重任务。部队到达丰顺时，闻说潮汕铁路工人为了阻止国民党反动部队从汕头开到潮梅，特意将铁路破坏了。这样，起义军南下也将受阻，全军上下都为此而担忧。部队于九月二十三日进入潮州后，彭湃立即通过当地农民

---

<sup>①</sup> 《罗明谈上杭欢迎起义军》，载《南昌起义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协会，动员会员帮助铁路工人，仅用了一夜时间，就把铁路抢修完好。<sup>①</sup>第二天，部队就乘火车直达汕头。

彭湃带领起义军的先头部队进驻汕头，立即成立了东江工农自卫军，彭湃亲自担任总指挥，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潮汕地区的人民武装，并领导群众运动，维护革命秩序。

九月二十六日，起义军在汕头召开了有数万工农参加的群众大会。彭湃和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一起出席了大会，周恩来和彭湃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彭湃在讲话中阐述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号召潮汕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新的胜利。

接着，按照前委的决定，起义军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留下周逸群所部警备潮汕，其余部队由贺龙、叶挺率领继续西进，拟经揭阳、丰顺，准备夺取惠州。彭湃率领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三十八人随行，担任建立地方政权和负责后勤、联络等项工作。部队进入揭阳县城后，在彭湃等指挥下，打开监狱，放出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并发动群众，成立了揭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

九月二十七日，起义军指挥部得到了敌军正在汤坑至山湖一线集结的情报，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彭湃和贺龙、叶挺等都出席，会议决定起义军以全力进击汤坑、山湖。翌日凌晨，起义军主力部队出发，在彭湃和揭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动员组织下，成千的工人、农民为起义军运送粮食、弹药，奔赴战场协助后勤和警戒的农会会员及赤卫队员达到二千多人。

汤坑、山湖之战从二十八日下午起，至三十日凌晨止。起义军

---

<sup>①</sup> 参见吴明：《彭湃印象记》，《彭湃研究史料》第357页。

投入兵力六千余人，敌军的兵力近两万，双方激战了一天多，许多据点反复争夺，战斗空前激烈。尽管是敌众我寡，但起义军士气高涨，奋不顾身，毙伤敌人三千多名。我军的伤亡也近两千，尤其是全军弹药消耗殆尽，不得不撤出战斗，九月三十日凌晨，我军向揭阳城退却。

在这场战斗中，彭湃始终同贺龙、叶挺一起在前线指挥作战。当起义军撤离战场后，彭湃则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他组织在前线的农民自卫军收容伤员，并及时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区；派人通知地方工作同志转入隐蔽；又将贺龙委托他转赠揭阳县委的三十支步枪和九千发子弹，妥善地交给有关负责人暂时保存。彭湃办完了这些事情后，又急忙赶上后撤的起义军，与贺龙一起行军。在撤退途中，起义军的一些官兵对汤坑之役的失利感到失望，情绪消沉，彭湃及时进行思想工作，他向起义军指出，汤坑之役失利，我军稍有损失，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各地的农民群众还是支持我们，他说：根据刚接得的报告，海陆丰三十万农民已起来响应我们。<sup>①</sup>

退回揭阳县城后，领导干部在讨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时，彭湃主张迅速向海陆丰转移。叶挺则主张退往潮汕，与前委、革委机关及其它部队汇合，然后再退到福建。讨论后，采纳了叶挺的意见。部队在转移途中，传来了潮汕失守的消息，便又“改道集中炮台”<sup>②</sup>，向海陆丰转移。

在此以前，还在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的途中，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决定实行土地革命，以武装暴动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号召发

<sup>①</sup> 参见吴明：《彭湃印象记》《彭湃研究史料》第357页。

<sup>②</sup> 焦其恺：《广东回来的报告》（1927年10月25日）。

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在“八七”会议上，彭湃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奉中央的派遣，经上海、香港，于九月下旬到达汕头，向在汕头的前委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张太雷随同周恩来等撤出汕头后又乔装转回汕头处理有关工作。前委、革委机关人员于十月二日到达普宁流沙镇。翌日，周恩来在流沙召开了最后决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彭湃、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等。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报告，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善后办法。彭湃、李立三也作了发言。彭湃的发言强调了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的重要性，还提出今后不要再用国民党的旗帜来作号召，应改用红旗，而且从现在起就马上实行。

会议还在进行中，就得悉敌军准备袭击的消息，会议只得中断。起义部队向海陆丰方向行进，离开流沙才三公里，到了莲花山时，便遭到了敌军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的截击。在激战中，指挥部和部队间的联系被截断。部队伤亡很大，余部由董朗<sup>①</sup>率领，突破敌军的围堵，最后到达海陆丰。起义军其他领导分散突围。彭湃和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等一起到达陆丰县境。十月七日，他们从陆丰的湖东乘船转赴香港。<sup>②</sup>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举行了联席会议，彭湃以南方局委员身份出席。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后革命斗争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重要问题：没收地主土地；建立革命政

---

<sup>①</sup> 董朗(1894—1932)，四川简阳县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湘鄂西的“肃反”中被错杀。

<sup>②</sup> 参见《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载1927年10月30日《中央通讯》第7期。

权；宣传苏维埃。

根据“八七”紧急会议以及这次联席会议的精神，彭湃写了《土地革命》一文，在十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第一期上发表。

彭湃在文章中表明了他对继续革命的基本看法：第一、以武装的暴动来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挽救革命；第二、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第三、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获得解放。

彭湃在文章中以工人、农民、兵士代表在大会上演讲的形式，集中论述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无产阶级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掠夺与压迫，解除全中国大多数人的痛苦，只有实行土地革命。因为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失了土地，已陷于饿死的状态中，一切土地集中少数人手上，供他们享乐，这是最不平的事。”<sup>①</sup>“农友们代代年年，辛辛苦苦把种好的谷子送到地主的家里，自己的父母妻子挨饿得叫救，还说这是公道，你说该死不该死呢！”<sup>②</sup>彭湃认为，必须使多数农民懂得这个道理，才能动员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打倒土豪劣绅，夺回地主的土地。彭湃号召工人阶级，应该“到农村去帮助农友掠取土地，杀尽乡村一切的反动势力。”<sup>③</sup>号召士兵“应为自己穷人的利益而战，”“应起来枪杀反对土地革命的长官，无论他是排长连长也好，一直到总司令也好，如有教我们反对土地革命的，就应该断他的头碎他的骨。”<sup>④</sup>

在文章中，彭湃还提出了工农兵武装暴动胜利以后的任务：

---

① 彭湃：《土地革命》，《彭湃文集》第277页。

②③ 同上书，第278页。

④ 同上书，第279页。

“第一，须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的杀个净尽；第二，工农阶级武装起来，扩大有训练的军队，才能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第三，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军士的家庭去耕种；第四，毁灭一切土地的契约和债券；第五，一切政权统归农工兵代表会”<sup>①</sup>。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

彭湃在《土地革命》一文中所阐发的主张，和中共中央当时有关指示的精神相一致，成为他后来在海陆丰创建苏维埃的指导思想。

## 二、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

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结束后，彭湃受中央南方局的派遣前往闽南<sup>②</sup>，但旋即又回到香港组织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十月二十五日，彭湃发布了海陆丰两县武装起义的命令。

在这之前，海陆丰人民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在中共东江特委和黄雍、张善铭、刘琴西等的领导下，于九月上旬毅然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恢复了海陆丰两县临时人民政府。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又向海陆丰革命政权进行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海陆丰农民武装主动从县城撤出，退守中峒后方基地，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准备了良好的条件。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在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的支持下实现的。南昌起义军在流沙会议后，在莲花山遭敌伏击受挫，起义军的第二十四师余部于十月六日撤退到陆丰东南部。在这里，部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由七十团团董朗“统率经甲子港，以赴海陆丰，图

<sup>①</sup> 彭湃：《土地革命》，《彭湃文集》第278页。

<sup>②</sup> 《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10月23日），《彭湃研究史料》第20页。

与农民结合”<sup>①</sup>，在东江特委的接应下，部队甩开敌人，“经大安、新田，绕过敌人的几处防地，而到农军的激石溪”<sup>②</sup>，十月九日到达海丰的朝面山，其中的一部于十月十二日到达惠阳的中峒。这支队伍共有官兵一千二百余人，其中伤病员很多，“只有枪五百余，机枪五挺”<sup>③</sup>。

中峒地处海(丰)、陆(丰)、惠(阳)、紫(金)边区，属惠阳县高潭区，它距离四县的圩镇均达二、三十华里，四周峰峦重迭，地势险峻，群众基础又好。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这里逐渐成了海陆惠紫四县农民武装的汇合点，成了海陆丰农军的根据地。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革命委员会就设在这里。起义军到达朝面山、中峒后，东江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将起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四团(即红二师)，由董朗任师长兼第四团团长的，颜昌颐<sup>④</sup>任党代表。部队经过整编，指战员的斗志十分旺盛。

十月二十九日，驻海陆丰的国民党军队陈学顺团，惧怕兵力分散易受袭击，将驻防公平、汕尾的部队调回海丰城集中。红二师于同日便进占公平，并向海丰县城进逼。三十日晚，海丰东南五个区的农军进驻汕尾。与此同时，海丰各地的农民也纷起暴动。十一月一日，陈学顺团被迫退出县城，向惠阳方向逃窜；县城的地主武装则纷纷逃往捷胜。至此，除捷胜外，海丰各地均为工农武装占

---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第100页。

② 《王备报告》(1928年5月26日)。

③ 《南方局恽代英给中央信》(1927年10月24日)。

④ 颜昌颐(1898—1929)，湖南安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军委工作。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事委员，1929年8月24日在上海与彭湃、杨殷等同时被捕，30日与彭湃、杨殷等同时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领。在陆丰，农军先后克复新田、大安、金厢、湖东等地，十一月四日，在红二师一部的支援下进逼陆丰县城，守敌戴可雄部被迫连夜逃往碣石。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两县分别建立了临时革命政府。

十一月八日，彭湃从香港乘船赶回海丰，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sup>①</sup>在回到海陆丰后的最初日子里，彭湃以全部精力领导两县人民筹备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苏维埃政权。他反复向群众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要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必须把工农兵都动员起来，同心协力做好革命工作；必须坚决地实行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

彭湃的宣传发动工作短期内收到了巨大的成效，海陆丰的人民群众普遍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十一月十日，彭湃在陆丰主持召开了陆丰县干部会议，讨论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六日，陆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陆丰县城举行，大会产生了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张威等十五人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团执行委员。彭湃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了演说。接着，十一月十八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又在海丰县城召开，彭湃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那一天，海丰县城披上了新装。所有的马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各机关团体和马路两旁，均悬挂红灯红旗红纱。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前面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两旁设置军乐队及参观台，墙上贴着标语，草地则铺满了草蓆和松针，迴廊、走道、泮池周围的石栏杆，挂满了红布花结。海丰全城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海洋。

---

<sup>①</sup> 参见王克欧《红二、四师进入海丰后的斗争》《广东文史资料》第30辑。

十八日上午，彭湃和出席大会的三百一十一名工农兵代表一起，进入会场。代表当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工人占百分之三十，士兵占百分之十。红二师第四团全体指战员，紫金、惠阳、陆丰的农民代表共二百多人，也参加了大会。上午十时，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在大会主席致开幕词后，先后由各机关团体致祝词和工农兵代表致答词。接着，彭湃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彭湃在演说中，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论述了工农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以后革命斗争的任务。他说：“广东杨希闵刘震寰叛变时候，我工农群众牺牲了无数头颅，才能够把杨刘赶走。去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也靠着我工农群众的力量，得以打到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sup>①</sup>但是，当工农提出减租加薪等正当要求时，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叛变，是共产党捣乱。于是到处都杀共产党，杀工农群众。“在湖北被他杀了万余人，在湖南江西广东也给他杀了数万人。”因此，“我们要解除痛苦，惟有团结起来，夺回一切政权，实行土地革命！”<sup>②</sup>

在谈到土地革命时，彭湃作了这样的讲解：“我们更要明白土地是天然的，因被地主资本家霸占，所以我们连一点田没有；他要永久的保护这土地，就组织一个政府——反动政府；他还怕政府不能尽量保护他，他又组织一种军队——军阀；而且他要保护自己的土地，还恐没有证据，又造出一种契约，于是就把土地各人瓜分起来，并划定界限、田坐。”<sup>③</sup>彭湃指出，共产党是支持土地革命的，因为共产党“知道我工农群众要能够解放，除非把这私有制度打破是不行的，所以领导大家起来打倒反革命政府！打倒反动军队！杀尽

---

<sup>①②③</sup>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彭湃文集》第280、281页。

土豪劣绅大地主！把一切契约烧掉！把田垌可以铲去者铲去！这样农民才得着真正的利益。地主资本家打倒后，同时并把一切的工厂归还工人。”<sup>①</sup>所以，彭湃号召所有工农兵群众，要拥护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彭湃在演说的最后说：“全世界最大力量就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我们的口号是：工农兵团结起来！打倒大地主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解除反动武装！一切武装交还工农兵！一切政权交还工农兵！土地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sup>②</sup>

彭湃演说后，董朗、刘琴西、杨望分别代表红二师第四团、东江革命委员会、中共海丰县委，在会上相继发表讲话。

接着，海丰第七区的代表向大会建议：地主武装仍死守捷胜，请大会派红二师前往助战，并派代表慰劳围攻捷胜的农军。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并决定由红二师派出一个连开赴捷胜助战。当天下午，参战部队出发，彭湃和全体代表一起欢送他们。彭湃对这个连说：海丰四十万工农兵群众的代表三百余人，今天来参加这个空前未有的盛会，但尚有一小部分逆党盘踞在捷胜，实在是我们之差，今天大会既然庄严地请诸位前去助战，务请同志们努力奋斗，于十九日攻破捷胜城，二十日回师县城继续参加大会。<sup>③</sup>

下午，大会继续举行，彭湃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彭湃在报告中以通俗的语言，具体、生动地阐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工农受压迫以及起来斗争的状况，特别着重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革命成

---

①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说》，《彭湃文集》，第281页。

② 同上书，第281—282页。

③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

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彭湃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了反动的政党，国民党的统治是新军阀的统治，所以各地的工农群众都起来暴动，尤其是湖南、湖北的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彭湃指出：“中国反革命的潮流一天天的高涨，同时革命的势力也一天天的高涨，我们全国的工农群众，能够象湖南、湖北的农民一样，反革命的势力不久就可以肃清了。”<sup>①</sup>彭湃在报告中再一次肯定海陆丰人民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英勇奋斗精神：“这回海丰工农群众和敌人斗争，确实英勇，不但广东难比，即在全中国全世界也难得。”<sup>②</sup>

十九日，大会转入讨论各种提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向全体代表报告了提案审查的经过，并将八个重要提案交付大会讨论。一、没收土地案；二、杀尽反动派案；三、改良工人生活案；四、改良兵士生活案；五、抚恤遭难烈士及被祸工人家属案；六、取消苛捐杂税案；七、妇女问题案；八、禁止米谷出口案。

没收土地案的讨论最为热烈。提案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中，对没收土地的施行办法列举了六条：第一、拥护工农革命军，消灭民团、保安队等反革命军队；第二、打倒反革命政府；第三、焚烧契约租簿；第四、掘去不妨碍农民工作之田坐，使田主认不清楚；第五、由苏维埃政府发田地使用证给农民；第六、分配田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调查明白，实行分配田地。代表们都认为，这个议案不够具体、详尽，尤其是第六条，分配田地时牵涉到种种实际问题，原案中都没有解决。代表们随即列举了许多问题，例如：对热心农会而无田耕的同志应该怎样？有人田地有余要雇工的，有人田地不够耕的，应该怎样？家庭人数增加、减少或迁移时应该怎

---

①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彭湃文集》第288页。

② 同上书，第289页。

样？是否一次分定以后不再分抑或多少时间再分？分田后每年生产收入应抽出多少交政府及作公益金？红军战士家庭的田地应如何维持？等等。彭湃参加了与会代表的讨论，并在会上提出了分田的四条标准：一、照人数多少；二、照劳动力强弱；三、照家庭经济（有无别种收入）状况；四、照土地肥瘠。他还提出了在分田地中的两个口号：一、不劳动不得田地；二、不革命不得田地。<sup>①</sup>彭湃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支持，最后鼓掌通过。其他各个问题，经过代表们的讨论以后，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掘田垌问题，决定由各县苏维埃认为无妨碍工作者即掘去，限期于旧历十一月十五日以前掘完。现种田地的分配期限，决定不作规定，照俄国办法，由乡苏维埃决定何时需要分配。每年生产所得该缴交多少办公费及公益金，决定应交十分之一，自一九二八年六月起实行。士兵家庭的田地分配及耕种，决定兵士家庭有田地而不能回家耕种者，可以雇工耕种以便能供养家属；没有土地者，则于退伍后由苏维埃政府设法分给土地。

正当彭湃和大会代表提案进行热烈讨论的时候，红二师派出的那个连在农军的配合下，攻下了捷胜，解决了海丰敌人据以顽抗的最后据点。消息传来，大会全体代表欢声雷动，一致通过第二天由大会组织欢迎队伍，到离城十里的谢道山去迎接红军部队胜利归来。<sup>②</sup>当第二天前线指挥员感谢彭湃和代表们远道欢迎时，彭湃说：第一个苏维埃政府郊迎十里算不了什么，将来南京、北京解放了，在北京开大会的时候，几百里几千里也要欢迎呢！<sup>③</sup>

---

① 均见《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

②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

③ 黄雍：《一九二七年我在海丰组织暴动的经过》，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0辑。

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二十一日上午在讨论提案以前，彭湃向大会代表报告了陆丰农民自卫军围攻石守敌的情形，指出：尽管戴可雄的地主保安队据城死守，农民自卫军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进攻敌人，没有依赖红二师的支援。彭湃认为，陆丰农民自卫军这种精神值得学习。彭湃的讲话，词意恳切，代表们极受教育。

在下午的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杨望等十三人，当选为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林彬等四人，当选为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裁判委员会委员。

晚上，代表大会举行闭幕式。当选的政府委员和裁判委员，庄严地接过了代表大会授与的“海丰苏维埃政府”的大印后，宣誓就职。接着，彭湃代表中共中央，再次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彭湃指出：这次海丰工农兵得到政权，是因为敌人内部矛盾，使“反革命派逃走，才乘机会来得到政权的。不是大家执行土地革命，起来杀土豪劣绅、地主及反革命军队夺来的。”<sup>①</sup>所以，政权是不巩固的，反革命派还存在，他们不会死心，定会捲土重来，现在各区各乡的反动派就还在活动。因此，彭湃号召代表们回去要彻底镇压反动派，“每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杀到汕尾港马宫港的水都成赤色，……我们最后一句口号：赤色万岁！”<sup>②</sup>

十二月一日，海丰人民群众数万人，在海丰城的红场举行大会，热烈庆祝海丰苏维埃的建立。彭湃出席了庆祝大会，并讲了话。

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分别建立以后，立刻开展了一系列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土地革命。广泛发动农民，

---

① 彭湃：《在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彭湃文集》第292页。

② 同上书，第293页。

收缴地主的田契、租簿，并集中加以焚烧。据统计，截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止，海丰全县已焚烧田契约四十七万张，租簿约五万八千多本。<sup>①</sup>为了做好土地的分配工作，各区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土地科，负责督促及指导农民分配土地，领导农民将地主甚至是自耕农的土地没收，然后分配给佃农及自耕农，再由县苏维埃政府向分得土地的农民发土地使用证。截至一九二八年二月底止，据海丰、陆丰两县县委的报告，海丰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陆丰没收、分配的土地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百分之四十。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开展了招募志愿兵的工作，从报名应征的青年中选拔了一千多名，组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五团。各乡也组织了不脱产的赤卫队和少量常备赤卫队，据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的统计，海丰全县共有赤卫队员三万七千八百零三人，常备赤卫队员四百五十一人。<sup>②</sup>

彭湃创建的海陆丰苏维埃，就县一级政权的规模、纲领和完备情况而言，“是中国前古未有的”，“这种壮举，实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sup>③</sup>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在实践上回答了用什么形式来取代国民党反动政权这一重大问题，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他提出的分配土地的办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个创举。他重视正规革命军队的建设，在粤东土地上树立了一面鲜明的坚持武装斗争的旗帜。党中央对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苏维埃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在“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海陆丰政权之丰富材料，它的胜利，它的经验，应当充分运用到一切农民暴

---

<sup>①②</sup> 《中共海丰县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

<sup>③</sup> 《海丰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会场特刊》。

动中去。”<sup>①</sup>在这里,也需要指出,彭湃在领导海陆丰苏维埃的初期,由于对反革命的义愤等原因,存在着“左”的倾向,如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每人至少要杀十个反动派”等“左”的过火口号,出现过乱砍乱杀的现象。但当他认识到这种做法有损于革命的根本利益时,就立即设法予以纠正,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为此作出决定:凡需要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经过区(市)苏维埃政府的判决,并要报县苏维埃政府核准,才能实行。它表现了彭湃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 三、领导东江暴动

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广东的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准备以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扑灭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与此同时,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了更好地策应广州起义,广东省委指示东江特委、海陆丰苏维埃的军事工作,要向惠州方向发展。<sup>②</sup>

省委关于策应广州起义的指示,彭湃直到广州起义爆发的前夕才收到。当时,彭湃和董朗一起,率领红二师的一部正在陆丰作战,在收复了碣石城以后,又在部署消灭杨作梅匪部的战斗。杨作梅是海陆丰有名的大地主兼土匪,他拥有一支由数百人枪组成的反动武装——保安队,依靠这支武装力量,以及刚投奔他不久的原国民党十一军的部分士兵,盘踞在陆丰的河口一带,摧残民众,对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1928年1月3日),载《布尔什维克》第13期。

<sup>②</sup> 参见1927年12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抗土地革命，成为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后的心腹大患。彭湃认为，对于杨作梅匪部，如果不加以消灭或给予沉重打击，海陆丰苏维埃的军事力量向惠州发展是有后顾之忧的。因此，彭湃决定：必须集中力量，尽快地解决杨作梅匪部。

对于这次消灭杨作梅反动武装的战斗，东江特委全力以赴，专门成立了攻打杨作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场战斗的军事和政治工作。委员会担负了侦察敌情、拟定作战计划、准备各种军需物品以及传单、标语等等任务。东特委还命令陆丰县委负责组织、发动当地农民配合战斗；又派郑志云、董朗带领红二师四团的一个营前往河口附近的各乡开展宣传工作。这次宣传的中心是：利用原十一军的士兵和杨作梅保安队之间的矛盾做分化士兵的工作。于是，负责宣传的同志，在原十一军士兵的驻地散发或张贴了许多传单和标语，上面写着：“你们从几千里之外跑到此地替地主资本家卖命是不值得的”，“我们都是工人农民，要替工农谋利益”，“你们快到我们这边来！”等等。这次宣传工作收到明显的效果，它极大地动摇了原十一军士兵的军心。

在彭湃的亲自指挥下，攻打杨作梅匪部的战斗于十二月十六日拂晓打响了。战斗的第一天，红二师在陆丰农民自卫军和农民群众的协助下，一举夺回了河口墟，杨作梅部溃退昂塘，我军乘胜追击。在昂塘，我军在阵地前沿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向原十一军士兵进行喊话。在我方军事、政治的压力下，原十一军的士兵派出代表来我方阵地接头。我方也派代表进昂塘村联系，但却被杨作梅扣留了。根据这种形势，我军立即发起猛攻，终于冲进了昂塘，杨作梅被迫退入炮楼固守。这时，杨作梅对原十一军的士兵已有戒心，便收缴了这些士兵的步枪而换之以粉枪，这就更加引起了士兵的反感，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杨作梅自知难

以支持，乃于十九日深夜，带领了十多名亲信冲出炮楼突围，当即被我军击毙九人，杨作梅仅以身免。第二天早上，原十一军的士兵在缴了保安队的枪以后，便开门向我方投降。<sup>①</sup>

攻打杨作梅的战斗胜利结束的时候，广州起义已经举行的消息才传到海陆丰。由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是十二月十一日爆发的，当天立即成立了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苏维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政府领导人名单，彭湃当选为人民土地委员。会议还作出了包括迅速打通通向海陆丰的道路，与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取得联系；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第二军由海陆丰农民武装组成等在内的多项决议。在得到广州起义的消息后，彭湃立即组织海陆丰的革命武装，兼程前往广州。这支武装在进军的途中，获悉广州起义已经失败，才又折回海丰。

广州起义失败后，彭湃分析了惠阳、紫金、惠来、普宁、五华等县的形势，认为惠州有张发奎的重兵驻扎，海陆丰的工作应改向惠来发展，并联络普宁，同时继续在东江各县普遍进行年关暴动。为了作好年关暴动的动员准备工作，在彭湃的领导下召开了东江农民代表大会。

东江农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早在十二月五日就开始进行，并定于一九二八年元旦在海丰召开。但是，在大会即将举行的时候，却发生了“二八”事件。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彭湃接得郑志云从陆丰打来的电话说：从河田传来的报告，进攻海陆丰的陈济棠部的前头部队六百人，已抵达陆丰河田。根据这个紧急情况，东江特委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师及东江特委撤离海丰县城，向黄

---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7年12月24日），载《中共东江特委档案选编》第7—8页。

羌移动。是日下午，由于东江特委以及各种机关的撤退，使海丰县城人心浮动，顿时陷入了混乱局面。东江特委撤至黄羌以后，始知敌军抵达河田的情报不确实，遂于三十日又重新返回海丰县城。因为这次事件发生于二十八日，所以称为“二八”事件。<sup>①</sup>“二八”事件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后来在海丰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上，彭湃就这次错误作了检查，并改组了东江特委和海丰县委。

由于“二八”事件，使东江农民代表大会推迟至一九二八年元月三日才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惠阳、紫金、惠来、潮阳、海丰、陆丰、五华等县的代表共七十九人，会期三天。彭湃在会上作了关于广州起义的经过及其教训、土地问题两个报告<sup>②</sup>。大会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动员东江农民的力量，进行年关暴动，为实现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而奋斗。大会的最后一天，元月五日，全体代表参加了欢迎红四师的大会。

红四师是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到花县整编而组成的，由叶镛任师长，袁裕任党代表<sup>③</sup>，建立了师党委，下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团，其中十一团团长为白鑫，党代表是徐向前（到达海丰后，改任师参谋长）。他们从花县经从化、龙门，于十二月底抵达紫金，后在紫金的龙窝与张发奎属下的李汉魂部遭遇，发生激战，打败了李部，然后移驻于紫金东部的炮子墟。中共紫金县委当时提出要让红四师驻扎紫金，以便协助打开紫金的局

---

<sup>①</sup> 参见《海丰县委关于全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经过给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22日），《彭湃研究史料》第34页。

<sup>②</sup> 参见《中共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14日）。

<sup>③</sup> 叶镛（？—1928），四川省乐至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1928年5月间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后牺牲。袁裕（1904—1941）即袁国平，湖南省邵东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1938年任新四军总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7日在皖南事变战斗中壮烈牺牲。

面的建议，彭湃没有同意。彭湃认为，紫金党组织的力量比较薄弱，而红四师长途跋涉，亟需休整，紫金距李汉魂部驻地太近，容易发生冲突，因此，红四师还是以海陆丰为宜。<sup>①</sup>在彭湃派出红二师五团的接应下，红四师于一九二八年元月五日抵达海丰。

红四师抵达海丰时的情景，徐向前在他的回忆中这样说：“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彭湃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只有二十多岁，身材不高，脸长而白，完全象一个文弱书生。他身穿普通的农民衣服，脚着一双草鞋。海陆丰的农民都称他为‘彭菩萨’。他的声音宏亮清晰，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当他讲到广州起义失败时，把手一挥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畏困难，失败了再干，跌倒了爬起来，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他那逻辑性很强，说服力很大，浅显易懂的讲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使人增加无限的勇气和信心。”<sup>②</sup>

彭湃对红四师的工作十分重视。红四师到达海丰，彭湃立即向师党委书记袁裕了解全师的各方面情况，并主持召开了红四师第一次党员大会。会上，一些党员揭露了师党委存在的不团结等问题。第二天的会议，在彭湃的主持下，改组了师党委，新党委仍由袁裕任书记。彭湃向新的师党委指出，红四师虽然已有三百多名党团员，但仍需积极发展新党员，以增强四师的党组织。

---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13日），《彭湃研究史料》第27页。

<sup>②</sup> 徐向前《奔向海陆丰》《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12月版。

在彭湃的带动下，红二、四师两支兄弟部队会师以后便亲密无间。在彭湃的主持下，召开了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师的主力向东发展。

联席会议以后，红四师除留下第十团驻扎海丰外，其余部队在彭湃、叶镛的率领下，开往陆丰，首先平定陆丰的“白旗会”<sup>①</sup>匪乱。当部队一进入陆丰县境，“白旗会”匪徒便纷纷溃逃。红四师部队配合陆丰赤卫队，于几天之内克服了被白旗会匪盘踞过的各个墟镇。在驱赶白旗会匪的过程中，彭湃针对白旗会匪散布的所谓苏维埃政权要杀害老年人的谣言，指示县、区苏维埃政府全面开展敬老活动。并且，彭湃自己亲自出席陆丰县苏维埃召开的敬老会，还给老人们捧茶、戴大红花。在会上，彭湃对老人们说：老人过去有创造社会的功劳，应该受到尊重。大会结束，又给老人们赠送毛巾、水果和五彩宣传画，使老人们深受感动。此外，对于一些受骗追随“白旗会”的群众，彭湃与红军领导人亲自抚慰他们，释放他们回家，并每人发给路费两块银元。经过这一系列工作，陆丰“白旗会”匪乱便被彻底粉碎。

与平定“白旗会”匪乱的同时，东江特委根据广东省委关于变更东江暴动的方向的指示，改变原来的向惠州方面发展为向潮汕方面发展，以造成东江的割据局面。根据东江特委的计划，彭湃亲自率领红四师十一、十二两个团向普宁发展，海丰县派出农民赤卫军二百人，随红四师行动。在各路红军的带动和帮助下，东江各县的暴动迅速地开展起来。惠阳、海丰、紫金，先取得了暴动的胜利。惠来、普宁一路，由彭湃亲自领导。一月三十一日抵达普宁时，彭湃发着高烧，仍然抱病指挥红十一团和普宁工农革命军，围攻

---

<sup>①</sup> “白旗会”，陆丰的地主阶级利用封建迷信而组织起来的反动武装。

地主武装固守的果陇。激战两天，终于攻克了这个重要据点，俘获敌人五十多名。接着，乘胜进军，于二月五日攻占了敌人的另一据点和尚寮。“红军攻和尚寮时，各区民众参加作战者较多，有数千人。”<sup>①</sup>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普宁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坡沟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普宁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彭湃留下红十一团在普宁休整，自己回到惠来，指挥红十二团和惠来、陆丰的部分农民武装，于二月二十四日攻下了惠来县的重镇葵潭。葵潭是惠来、陆丰两县地主武装的大本营，又是海陆丰通往潮汕的交通枢纽，葵潭的攻克，使海、陆、惠、普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和粤东地区武装暴动的发展，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震惊。他们趁广东各派军阀纷争稍为缓和的时机，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开始，分兵数路，大举向海陆丰苏维埃进犯。一路取道惠来、普宁；一路取道揭阳；一路取道紫金南岭；一路取道惠阳。自汕尾至捷胜一带的沿海，则由敌海军登陆包抄。敌人的这个进攻计划，东江特委至二月下旬，才从俘获一个敌人营长的信中获悉。这时，敌海军的舰只已抵达汕尾附近并开炮轰击汕尾市；敌十一师已进抵接近陆丰边境的河婆。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势，彭湃和东江特委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除了向省委报告以及发出宣言，号召工农起来反抗军阀进攻、誓死保卫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外，还对地方工作及军事行动，作了具体的安排。

对地方工作，彭湃提出，各县，应领导群众继续举行武装暴动，并以断绝敌人交通、武装示威等方式援助海陆丰的斗争。海陆丰两县则以保卫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做好几项工作：一、武装一切群

---

<sup>①</sup> 《中共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

众；二、实行坚壁清野，县城及各墟镇的粮食及一切东西均搬走，群众也撤至安全地区；三、对敌军士兵开展宣传；四、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可以采取抵抗、骚扰、截击、围攻等方法，阻延敌人的前进；五、注意捕杀随敌军回来的豪绅地主。<sup>①</sup>

对军事行动，彭湃和东江特委作了如下部署：一、红二师五团回师海丰，四团流动于紫金、海丰边境；二、红四师十一团留在普宁，分驻陆丰甲子和惠来葵潭的十、十二团，原地待命，相机行动。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领导，东江特委还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要求迅速派出得力军事干部，前来加强领导。并特别强调“四师盼望叶剑英、恽代英同志来”<sup>②</sup>。

但是，由于敌人的围剿已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早已开始行动，彭湃和东江特委的应急计划又制订得过晚。因此，上述的反围剿部署大部分还来不及执行，敌人的部队就已纷纷扑向海陆丰。

二月二十六日，正当彭湃向省委发出紧急报告的时候，由敌十一师副师长余汉谋率领的敌军三千多人，以杨作梅的地主武装——保安队为先导，由河婆进入陆丰。当时，红军主力仍分发在各县，彭湃本人尚在普宁，留在海陆丰的红军只有四、五百人。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红军和海陆丰农民武装进行了浴血奋战，虽曾在沿途经过几次截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能取胜。二月二十九日，陆丰城被敌占领。次日，海丰城也陷敌手。<sup>③</sup>三月二十六日，敌黄旭初部由紫金南岭向海陆丰苏维埃的后方基地中峒发起进

---

<sup>①</sup> 参见《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2月26日），《彭湃研究史料》第39—40页。

<sup>②</sup> 《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2月26日），《彭湃研究史料》第41—42页。

<sup>③</sup> 参见《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载《省委通讯》第15期；又参见1928年3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

攻，并占领了中峒。至此，红色区域的海陆丰，又大部分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 四、转战在大南山

大南山在海陆丰的东边，汕头市的西侧，横直百余里，连贯潮阳、普宁、惠来三县。这里的农民早在一九二三年就在彭湃同志的发动下成立了农会组织，农民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海陆丰苏维埃建立后，彭湃亲自带领红军，在大南山区的普宁、惠来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暴动，以扩大红色根据地。

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当国民党反动军队攻陷海陆丰的时候，彭湃正在大南山深处的普宁三坑。海陆丰苏维埃失败的消息传来，彭湃立即率领红四师第十一团的余部一百多人赶到惠来的兵营村，与从海丰转移到这里的由叶镛、徐向前率领的红四师十、十二团余部会合。彭湃根据东江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及惠来、普宁等地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条件，决定集中红二、四师保留下来的主力，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大南山区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上旬，在东江特委和惠来县委的主持下，在兵营村召开了惠来县农民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攻占惠来县城，实行武装暴动以援助海陆丰的决议。大会还讨论了组织尖串队分路截击敌人以及协助红军攻击等等暴动方法，并决定组织攻城总指挥部。

为了实现这个暴动计划，彭湃和东江特委在会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的：一面指导大会代表分别动员各乡农民群众准备战斗，提出了“土地归农民，政权归工农兵”的动员口号；一面联络普宁和潮阳的农民赤卫队，要他们截断惠来盐岭一带敌军的交通和伺机进攻敌军后方，还动员普宁、潮阳两县农民群众支援惠来的

斗争。

在彭湃和东江特委的领导和动员下，长期受地主豪绅和反动派压迫而蕴积着巨大反抗情绪的惠来农民，起来直接、间接参加这场斗争的不下十万人，组成了一支近万名的手持尖串的农民武装。

根据总指挥部的安排，红军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距离惠来县城三十华里、作为县城屏障的隆江。据守隆江的是敌七十六团的一个营，见红军来势凶猛，于三月十日慌忙退出隆江向县城逃窜。结果，在途中遭到惠来农民赤卫队的伏击，全营被歼。

三月十一日，彭湃和攻城总指挥部经隆江到达县城东面的苗海村。当晚，在这里召开了攻城誓师大会。彭湃在会上作动员时指出：农民要翻身，就要跟着共产党走；只有打倒了土豪劣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才可以分田地。彭湃还说：这次我们攻打惠来县城，有三个拳头，一是惠来的农民兄弟；二是潮普惠的人民武装；三是工农红军。彭湃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攻城部队的士气。<sup>①</sup>

第二天，攻城开始了。总指挥部一声号令，红军指战员和县赤卫队及故乡手持尖串的农民共约十万人，将惠来城团团围住。彭湃头戴竹笠，脚穿草鞋，手持长枪，亲自到扎栅、河沟土乾一带的城墙边上指挥战斗。驻守惠来城的是敌二十七师第七十六团的两个营，他们企图凭借坚固的城墙，死守待援。

经过三天的围困，敌人更加惶恐不安。尽管留驻汕头的敌二十七师师长颜德基调一个营前来增援，也无法稳住军心。于是，当天晚上，七十六团全部撤出县城逃命。彭湃率领攻城部队乘势攻占了县城。

弃城而逃的敌七十六团，当撤至惠普交界的锡溪时，刚好和前

---

<sup>①</sup> 参见《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

来增援的敌第七十七团相遇。敌军两个团合一起，共有兵力达一千七、八百人，他们不甘于惠来县城被红军占领，于是又一起向县城反扑。彭湃和攻城总指挥部鉴于敌军势众，避免作无取胜把握的硬拼，便率领入城部队主动退出。

敌军入城以后，恃着人数众多，枪械较好，城墙坚固等条件，顽强地抵御我军的进攻。因此，我方接连几天的围城攻击，都未能奏效。

三月二十一日，原在紫金南岭、陆丰激石溪的红二师第四团三百多人，在师长董朗的率领下赶到惠来参加攻城战斗。<sup>①</sup>增加了这支颇有战斗力的生力军，极大地提高了整个攻城部队的战斗信心。于是，彭湃立即召开了有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重新部署了攻城计划。会议认为除了加紧围城和抓住战机突击外，还必须大大加强对敌军的政治攻势。

在彭湃的亲自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对敌军喊话的行动在城墙外围展开，彭湃自己也到阵地前沿对守城敌兵喊话。同时，彭湃还和红军战士一起，书写了许多传单。有的传单对敌军士兵作正面教育；有的晓以大义；有的则写上：“红军增兵已到，全县农民将用土填城壕，用云梯进城，你们要从长计议，及时投降，不然走投无路”等等。战士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将传单送进城里散发。敌军士兵争相执拾，并围墙观看，一时秩序大乱。

这场政治攻势极大地动摇了敌军军心。敌守城指挥官、七十七团团团长向卓然见势不妙，亲自登上城墙察看，当即被我击毙。这样，敌军就更为恐慌。于是，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守敌不得不于三月二十二日深夜从县城撤退。

---

<sup>①</sup> 参见《王备报告》（1928年5月26日）。

惠来县城再次被我占领后，彭湃立刻开展了各项巩固胜利成果的工作。他一方面领导惠来县委加紧筹建县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注意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彭湃看到城里许多群众还是住草棚的情况，提出了让群众拆除城墙，利用城墙砖石盖房子的建议。彭湃在一次群众的集会上十分通俗地说：城墙是个封建堡垒，它不但造成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隔阂并影响交通，而且还给反动派利用它来阻止我们进城同他们算帐。现在，很多父老兄弟都还住在茅棚里，我们何不将这个封建堡垒拆掉，利用这些砖石去建房子，让自己住得好些呢？彭湃征求到会群众的意见，群众一致表示拥护。大会以后，县城内外的群众立刻行动起来，仅仅五天，便把整个惠来县城的城墙全部拆除。在拆城墙的过程中，群众十分兴奋，他们边唱山歌、边拆墙。有首山歌是这样唱的：“各乡工农召集来，城墙拆落闹猜猜，今天齐齐拆城墙，明天庆祝苏维埃。”

虽然，惠来县苏维埃政府也在几天后成立了，并开始了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工作。但是，彭湃和东江特委的同志们对于巩固既得的胜利成果还是重视不够，他们对一时高涨起来的群众斗争热情估计得过高，而对敌人的力量则估计不足，因而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产生了急于求成的倾向。他们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在惠来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充分发动农民参军，以扩大红军力量，反而在惠来各级苏维埃政权还不巩固的情况下，决定向潮阳、普宁发展。

根据这个计划，彭湃率领红四师向潮阳发展，进攻成田、沙陇；红二师除留下两个连驻守惠来的兵营村外，其余开往普宁；红四师党代表袁裕则到揭阳领导暴动。十分明显，红二、四师这支年轻的队伍，又经过多次战斗的创伤，战斗人员减少而得不到补充，部队的战斗力天天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分兵三、四路作战，其

后果是可以预见的。

我军在惠来的胜利并没有使敌人全面溃退，敌人在得悉了这个计划以后立即部署兵力，卷土重来。四月初，进占海陆丰的敌第十一师余汉谋部，派出第二团进犯惠来；同时，占据中峒的黄旭初部，则直接指向普宁。由于留驻惠来的只有红二师的两个连，在潮阳、普宁的红军又遭到黄旭初部的截击而无法赶到惠来支援，因此，惠来县城遂于四月五日被敌军占领。

敌军重新占领惠来后，大肆施行烧杀虏掠。在短短几天内，惠来革命群众被枪杀的达二百余人，被逮捕的一百多。兵营村因曾驻扎红军，全村被焚烧殆尽。在白色恐怖底下，东江特委机关和惠来县苏维埃政府，迁到远离县城的山区林樟乡；普宁、潮阳的红军和潮阳赤卫队，也先后撤退至大南山深处的普宁三坑一带。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彭湃立刻在惠来的林樟乡召开了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师委的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当前的局势。会上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徐向前等军队的同志反对回师海陆丰，主张部队经揭阳、兴宁向粤北发展。理由是海丰濒海，没有回旋余地，而粤北地处粤、赣、湘边界的山区，有利于坚持斗争；地方的同志主张回师海陆丰，理由是广东各地的地主民团力量强大，一支小部队长途跋涉，在途中就有遭反动武装消灭危险。彭湃支持回师海陆丰的意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通过了回师海陆丰的决议。

会后，红二、四师和潮阳赤卫队共六百多人，集中惠来盐岭待命。由于指挥机关的麻痹大意，部队于四月八日遭到敌军黄旭初部的突然袭击。红军在慌乱中突破重围，由董朗、叶镛、徐向前等领导，向五华方向撤退。<sup>①</sup>后来，分别转移到海丰的公平和陆丰的激

---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17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石溪一带。

这时，海丰、陆丰县委根据广东省委四月十三日会议关于加紧完成东江武装据割的决定，于五月三日反攻海丰县城。由于各部队和赤卫队配合动作有差，造成了一部分部队潜入城后，无人相应动作的孤立局面。进城部队在遭到敌军的抵抗后，只得撤出。在撤退时，又被驻在五坡岭的敌军夹击，伤亡颇众，省委派来加强对此次攻城领导的赵自选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sup>①</sup>

彭湃当时留在惠来领导潮惠普方面的斗争，没有参与反攻海丰县城的战斗。五月五日至十二日，彭湃在惠来林樟乡召开了三县有关负责人的联席会议，总结了这次反攻海丰县城的教训，成立了三县暴动委员会，选出了彭湃等十五人为委员。<sup>②</sup> 决定将留在潮惠普的红军三百多人及三县的赤卫队，合并组成红军第五师，以袁裕为师长。会议还决定立即分别召开三县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具体安排并实施各县的暴动计划。

五月十二日（农历四月初二），惠来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林樟乡举行，彭湃出席了大会并作了政治报告。在彭湃的动员下，到会的代表纷纷认为，只有暴动才有出路。于是，要求立即暴动的战斗气氛，充满了整个会场。在这种冒险情绪的互相影响下，代表们的暴动调子越来越高。一个代表提出：限十五日（指农历四月十五）以前夺回惠来城。另一个代表则更大声高呼：初十收复惠来城，十五日太迟了！这个意见一提出，全场里高呼“赞成”口号，并一致举手通过。就这样，大会便作出了五月二十日反攻惠来县城的决议。

对于这个决议，彭湃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条件不够成熟，县

---

<sup>①</sup> 参见《海丰县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1日），《红二、四师史料选编》第243页。

<sup>②</sup> 参见《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17日）。

委的领导力量和武装力量也都不足；但另一方面，对于一哄而起的表面上十分高涨的群众暴动热情，他又未能进行说服和制止。最后，经过对具体行动计划的讨论以后，彭湃终于支持了这个经大会通过的意见。

大会以后，彭湃投入了极其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去，由于惠来县委本身认为在八天时间里无法做好攻城准备而主张改期，彭湃同县委进行了多次计议，说服了县委同志全力投进攻城的准备工作。接着，又召开了全县党、团负责人及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落实了各项动员组织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彭湃还提出组织攻城敢死队作为攻城的先锋队伍，并由他自己亲任敢死队队长<sup>①</sup>，后来由于其他同志的反对而没有获得通过。

到了五月十九日下午，原定的各区赤卫队集中的时间已过，但赤卫队都还没有到来，很明显，第二天攻城的计划肯定无法实现了。彭湃立即召开了惠来县委和红五师领导人的联席会议，讨论攻城改期的问题。会上，县委的同志仍然坚持如期于二十日攻城，即使失败也在所不计。他们认为，如果不按原定计划执行，县委在群众中的威信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彭湃对县委的同志作了解释和说服。最后会议决定攻城改期，红五师向普宁转移。

第二天，由彭湃建议召开的惠来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林樟乡召开，这次会议原定是向代表们说明这次攻城改期的原因以及部署今后的工作。但是，召开会议和红五师转移的计划均为敌方侦悉，敌军便于是日派出重兵袭击林樟乡。由于敌军的突然进攻，我方毫无戒备。结果，林樟乡被敌占领，东江特委和惠来县委机关均被冲散，许多重要文件被敌缴获，造成了潮普惠工作的极大损失。

---

<sup>①</sup> 参见《东江特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

彭湃在林樟乡被袭、突出重围以后，在群众的掩护下，来到普宁的白马仔村。白马仔村在大南山的纵深处，是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群众基础很好。彭湃在这里居住了一个多月，同潮梅特委、海陆惠、紫暴动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东江特委的其他同志也陆续来到这里同彭湃一起领导东江地区的斗争。

在白马仔村，彭湃还同他的爱人许玉庆会合，共同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战斗生活。许玉庆原名许冰，广东揭阳县榕城镇人，一九一九年在榕江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在香港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春从香港回揭阳后，担任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席，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和彭湃结婚。一九二八年四月红二、四师在惠来盐岭遭到黄旭初部袭击时，她隐蔽在潮阳县雷岭的蔗尾村，在兰林弟母亲的护理下产下一个男孩。孩子刚满月，许玉庆和兰林弟的母亲就化装成母女，将小孩送到汕头请人抚养。然后，她自己离开汕头，回到大南山地区坚持斗争，在白马仔村同彭湃会合。

彭湃在白马仔村这一个多月较为安定的时间里，同东江特委其他同志仔细地回顾了领导潮惠普暴动的历程，认真地检查和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计议了潮惠普三县今后行动的方针。他们经过充分的酝酿、讨论，制定了一个整顿党组织的计划：迅速恢复县、区、支部各级党组织，恢复后立即建立秘密的交通机关，以便联络。开设县委负责人训练班，借以提高领导骨干的水平。训练班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土地革命、党的策略、苏维埃政权、党的组织问题、东江过去斗争经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在敌人控制严密的乡村中发展党员，加强对新党员和党员中积极分子的教育。

彭湃将东江特委的对前一段工作的总结报告及下一步行动部署，立即派人送报省委。随后，于七月上旬离开白马仔村，转移到

惠来的林樟，准备在那里集中潮惠普三县的武装力量，再一次进攻惠来县城，以支援海陆丰方面红二、四师的斗争。

正当彭湃在惠来准备再一次发动武装攻城的时候，省委研究了东江特委的检查报告和当时的情况，于七月十七日、十八日两天，分别写信给东江特委，对东江各项工作作了详尽的指示。为了统一领导粤东地区的斗争，省委决定：将东江特委与潮梅特委合并组成新的东江特委，以彭湃为书记，郑志云、林国英等参加特委，省委常委黄钊也参加东江特委领导；成立东江特委军委，由彭湃、黄钊、颜昌颐、董朗和红四师的领导人负责军委工作；取消红五师编制，其人员分别编入红二、四师。省委的信件除了作出上述决定外，又着重分析了潮惠普三县暴动失败的原因和东江特委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还对彭湃的一些冒险行动作了批评，指出彭湃要当敢死队长乃是拼命精神的表现，今后必须禁止。据此，省委不同意再次进攻惠来县城的行动。省委的信件支持东江特委整顿惠潮普三县党组织的意见，并指定彭湃必须亲自参加整顿支部的工作。

省委的指示信件对彭湃和东江特委的工作都给予了纠正和促进。不久以后，又传来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消息和大会的决议。在这次大会上彭湃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六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大会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坚决拥护“六大”所确定的基本策略和方针，他针对红军战士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他向战士们说：“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是很可贵的，我们也不惜有代价的牺牲。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水平仍然停留在猛

冲的阶段。”<sup>①</sup>他还对战士们指出：我们要学会适应环境，保存革命力量。情况要不了多久就会改变，我们的党将不断成熟，革命的力量将不断发展，而敌人则注定是要失败的。

为了贯彻“六大”决议的精神和省委的指示，东江特委决定将红二、四师主力集中在海陆丰活动，特委机关迁到潮阳雷岭，领导整顿党的工作。

彭湃到了雷岭后，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而这里的敌情则很严重。他只能晚上出来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和进行发展整党的工作。白天就隐蔽在石洞或废窑里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工作。即使这样，彭湃在这一带的活动，还是给周围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他们都以彭湃还在这里领导他们的斗争而自豪。

九月二十九日，彭湃带同几个警卫人员，到距离雷岭不远的羊公坑村开展工作。这个村的房子都是倚山而建造的。彭湃等的活动地点是村子最上头靠近山顶的房子，从这里跑几步就可以翻过山岗。当彭湃等正在紧张工作的时候，敌人的部队突然包围了这个山村。在这个突然的袭击下，同志们只得突围走避。在警卫人员和群众的掩护下，彭湃翻过山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

<sup>①</sup> 朱道南：《巧遇彭湃同志》，载1961年3月17日《解放日报》。

## 第六章 英勇就义

### 一、战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彭湃和红四师党代表袁裕一起离开大南山，经汕头“赴港转沪”<sup>①</sup>。随行的还有彭湃夫人许冰和出生刚满六个月的孩子。

上海，是我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大城市，是当时已转入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反动的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同帝国主义统治租界的“工部局”互相勾结，对坚持地下活动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采取密探跟踪追捕、严刑拷打、监禁和暗杀、处决等手段，实行残酷的镇压。

彭湃初到上海时，住在大西路（今延安中路）百禄里，化名为王子安，以来沪经商名义进行活动。

翌年四、五月间，迁居到静安寺路万秣里一幢两层楼房的楼上，楼下住的是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黄阶然的一家人，以“房东”的身份来掩护彭湃，使他能更安全地从事革命活动。他们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楼上和楼下两家人平时是亲如一家。一旦有外人或左邻右舍来串门时，则认真按照“房东”和“房客”的关系相待。

---

<sup>①</sup> 袁国平：《给翰君的信》（1939年10月20日），《革命烈士书信》第12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

十一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彭湃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后，他的住所也就成了中央农委碰头开会的地方。他参与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同周恩来、杨殷保持密切联系。还经常到江苏省委去具体指导工作。当时，江苏一些地方武装暴动已先后失败，彭湃与省委领导在研究暴动失败后的工作时，强调指出发展党组织的重要性：在斗争发动起来后要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即使是斗争失败后，群众比较消极的情况下，我们在群众中仍然可以发展小的组织，从这些小组织中去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工作和政治影响。彭湃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着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始终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党小组中过组织生活。当年和彭湃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张纪恩回忆说：彭湃和中央机要处的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机要处的机关设在小沙渡路遵义里最后一条弄堂最后一家的一栋房子里，彭湃每星期都到这里参加小组会，以打麻将、谈家常作掩护，边打边谈，彭湃喜欢画画，也常用香烟盒子画各种图画。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说：我们共产党员，对党要忠贞，努力工作，要是出了问题，要坚决地为党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他讲到阶级斗争时，带海丰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很重，给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sup>①</sup>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十八次会议。彭湃在会上就“农民运动通告”、“汉口水案对日罢工”等问题作了发言。

农民运动通告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通告最主要的内容，是要确立农民运动中对富农的政策。彭湃发言中指出：“在联合富农中包含着反富农的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专谈联合

---

<sup>①</sup> 参见《访问张纪恩同志记录》（1979年8月X未刊稿）。

或打倒都是不对的。”<sup>①</sup>彭湃认为，对于富农的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是不容易了解的，因此，有必要解释清楚。鉴于通告中对这个问题说得不十分明确，彭湃建议通告中对此还需要作具体的说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彭湃由于既重视农民运动中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同时又十分重视农民运动中的雇农工作问题。他在稍后所撰写的《雇农工作大纲》中，就对雇农问题作了详尽的叙述。《雇农工作大纲》的主要观点是：一、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关系，认为“目前中国革命的阶段中，——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他的总任务里的一个扫除封建残余的使命，只有无产阶级起来领导农民推翻现存的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够完成”<sup>②</sup>。二、提出了划分农村雇农成份的标准：“他没有土地，也没有耕种的工具”，或“他仍然有一部分残废的农具与小部分租来的土地”<sup>③</sup>，完全靠出卖劳动力或临时出卖劳动力为生。三、分析了雇农在农民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对革命的态度，指出：“他们阶级觉悟要比一般的农民锐敏”，“对革命特别坚决”，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农民运动中能够起着领导和核心的作用。四、强调了加强对农民的教育问题，指出要通过教育，提高雇农的阶级觉悟，并“使雇农的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富农的动摇的保守主义或反动宣传，肃清农民中的封建思想和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或地方派别的械斗观念等”<sup>④</sup>。在这篇文章中，彭湃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也作了分析，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

---

① 彭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彭湃文集》第295页

② 彭湃：《雇农工作大纲》，《彭湃文集》第316页。

③ 同上书，第317—318页。

④ 同上书，第321—322页。

命深入而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富农就要跟着资产阶级向反革命的方向去，中农就必然表现动摇”，只有贫农、雇农“才能够与无产阶级同路到底”，“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员”<sup>①</sup>。

汉口水案反日大罢工问题，是这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炮车，在汉口同德里附近的马路上轧死了黄包车夫水杏林，因而激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愤怒。一九二九年一月八日，汉口工人决定对日罢工。翌日，罢工实现，受日本人雇用的三千七百多名华工，一致加入了罢工的行列。当时，由桂系军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当局和南京国民党政府，都唱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高调，支持这次罢工。彭湃在发言中，主张中央应该针对这个事件单独发出通告，并说：“桂系在汉口反日运动还是积极的帮助的，因为这于英是有利的。同时英国也有关系，仅知反日而非反整个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一罢工是给日本以大的打击，同时我们也可以料到国民党一定要出卖罢工。我们要使汉口工人明了这一前途，同时要告诉全中国工人来帮助”<sup>②</sup>。关于国民党对水案反日罢工的态度，以及中国共产党当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彭湃在后来发表的《反帝运动的危机》一文中，作了更加深刻的阐述。彭湃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政权，一半是在割据广西、广东和湖南、湖北的桂系军阀、西山会议派手里，这一派投降了英帝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一半是在割据江浙的蒋系军阀手里，这一派投降了美帝国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此外，尚有一个独立的政权，这就是割据东三省的代表封建地主的奉张政权，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桂系军阀和蒋系军阀支持反日罢工，这不

---

① 彭湃：《雇农工作大纲》，《彭湃文集》第317页。

② 彭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彭湃文集》第295页。

只是英美帝国主义所能容忍的，而且还是十分需要的。彭湃说：“因为单独排除日本是英美双方都有利益的。第一，是给日本以打击，尤其是经济上的打击，如抵制日货等，越抵制得利害，英、美货物越畅销，市场益扩大。第二，中国人民的视线都集中到反日本帝国主义，又忘记了背后英美同样的侵略”<sup>①</sup>。彭湃认为，桂系、蒋系支持反日罢工，还有另一个作用：“不只是消极的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而掩蔽他们投降英美的罪恶，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麻醉群众，幻想他们仍然是革命的。”<sup>②</sup>彭湃指出，国民党的单独反日，尽管是秉承英美帝国主义的意旨，但也是有一定的条件和限度的。当反日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和发展下去就会损害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使英美帝国主义利益也受到损害时，是英美帝国主义所不能允许的。水杏林惨死案引起的反日罢工运动的发展，正如彭湃所预料的一样：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汉口国民党当局的高压下，没有按照罢工工人要求惩办制造惨案的祸首，而仅仅由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予水杏林家属四千元抚恤金，不了了之。

同年二月，党中央为加强对江苏工作的领导，决定改组江苏省委，调彭湃兼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在改组江苏省委之前，党中央详细考查了省委的工作，认为省委领导软弱无力，经过中央政治局几次的反复讨论，初步提出由中央兼管江苏省委工作的意见，省委一些负责同志不同意中央的意见，没有按照组织原则，向中央反映，而是采取非组织行动，在一些场合散布对中央的不满。党中央严肃批评了这些错误的做法。彭湃专门为这个问题写了《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一文，指出江苏省委的错误做法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在党内的反映。在具体分析了小资

---

① 彭湃：《反帝运动的危机》，《彭湃文集》第307页。

② 同上书，第308页。

产阶级意识的危害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之后,进一步指出:“非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是终久靠不住的,就是在革命成功,亦是抛不掉自私自利的心理”<sup>①</sup>。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不忘学!学!学!养成政治上的阶级主力的战斗力,向外与敌人奋斗!向内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及非无产阶级化的分子奋斗!”<sup>②</sup>经中央以及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批评、帮助后,江苏省委也很快地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彭湃开始参加江苏省委工作,正值年关将至。年关,对于负债的劳苦大众来说,是难过的日子。在上海街头,逼债的人凶狠异常,负债者被殴打的事件屡见不鲜。此情此景,引起了彭湃和许冰对去年在海陆丰苏维埃时期度过新年的美好回忆。许冰还特意写了一篇《海陆丰赤色新年的回忆》,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上,编者是这样介绍的:“许冰同志是我们东江妇女领袖,是彭湃同志的爱人,她这一篇文章叙去年海陆丰新年情况甚详,本刊特介绍请读者细阅!”<sup>③</sup>

春节期间,彭湃在白色恐怖下,接连两天参加了上海闸北区的区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留学苏联归来的同志的安置问题。会议结束时正是大年初一,彭湃立刻就这一问题写信给中央,汇报了闸北区委讨论的情况,提出“中央对于派赴各省工作的留学生,应该比较具体的指示省委注意和分配工作的方法”。彭湃认为:“从莫回来的同志未必个个愿意做下层工作,而且又受了赤都的好待遇,更不愿意多吃点苦,或者因为到了中国以后,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改良宣传,对党的残破不堪而引起消极的观念也是有的。”这些同志“应

---

① 彭湃《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意识奋斗》,《彭湃文集》第300—301页。

② 同上书,第303页。

③ 《红旗》1929年2月7日,第12期。

再经中央短期的训练”。“以后对于这些由莫回来而去各地工作的同志，中央也应特别的考察，指导各地党部去训练他。”<sup>①</sup>中央组织部在同月二十三日给彭湃的复信中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希望各级党部注意这个问题，指导这些同志寻找社会职业，在社会上在群众中去做好党所分配的工作。

彭湃在主持江苏省委军委工作期间，十分注意斗争策略的具体运用。对于当时宿迁县发生的刀会暴动，彭湃就极其重视。由于这次暴动虽然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军阀压迫的斗争，可是暴动的领导者却是当地的豪绅地主。他们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提出了“党(指国民党)逼民变”，“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对这场暴动的组织和发动，也起过相当的作用。但是，当领导这次斗争的豪绅地主们接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三千元贿赂，群众又因为两次攻城都得不到什么好处，从而对斗争的领导者发生不满的时候，当地共产党组织便改变了对斗争积极支持的态度。在刀会的领袖号召第三次攻城时，宿迁的共产党组织不仅不参加，反而号召刀会的部分群众公开起来反对地主豪绅，结果使整个斗争遭到了失败。彭湃指出：象宿迁这样的暴动，如果我们因为它是豪绅地主所领导便不去参加，“客观上就帮助了国民党与军阀”；如果参加了，“可是没有在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中，同时并发动农民对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斗争，与豪绅地主争取暴动的领导权，客观上又是去帮助了豪绅地主。”<sup>②</sup>因此，彭湃认为，宿迁的党组织在刀会领导者号召第三次攻城时，采取的策略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还是帮助国民党和军阀的，争取不到刀会的群众的。”<sup>③</sup>他

---

① 彭湃：《致中央信》，《彭湃文集》第298页。

② 彭湃：《斗争的转变与深入》，《彭湃文集》第314页。

③ 同上书，第315页。

说：“正确的策略应该积极的去参加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使之继续下去，坚决的去充实这一斗争，去扩大这一斗争，动员党内群众去号召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不仅是暴露领袖出卖群众的利益，特别要扩大党的土地政纲的宣传。而且，同时要使这一斗争深入到反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斗争，党才能使群众在反国民党的斗争中，争得他们的实际利益，广大的群众才能脱离豪绅地主的欺骗，而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之下来，党才能取得斗争的领导。”<sup>①</sup>

在白色恐怖下进行革命斗争，彭湃不仅注意军事斗争的策略，而且十分注意工人运动的策略。一九二九年五月，上海租界电车公司机务间的一个工人，在电车上和车务间的工人发生口角，资本家便乘机挑拨离间，对车务间的工人说，机务间的工人欺侮你们，为什么不去报复？你们去和他们干，出了事由我负责。车务间的工人在资本家的煽动下，成群结队去向机务间工人提出质问，几个受资本家指使的工贼走狗从旁煽风点火，结果两个车间部分工人互相殴打起来，后来由于机务间的大多数工人，明白事体，避开现场，才没有造成伤亡。彭湃针对这个事件，指出：“工人与工人自己打起来这是最不幸的一事。”<sup>②</sup>出现这种的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资本家严重的剥削和压迫下，工人生活日趋贫困，因而工人的情绪很不正常；资本家害怕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经济政治待遇的改善而向资本家展开斗争。因此，煽动工人之间的矛盾，以便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彭湃提出：党组织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办？是不是去做“和事佬”，到双方去劝解劝解，要他们平心静气用和平的方式来调解呢？彭湃强调指出：“如果这样的策略，是

<sup>①</sup> 彭湃《斗争的转变与深入》，《彭湃文集》第31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313页。

资本家所乐意的。因为这一事件是资本家挑拨起来的，如果继续下去必妨害了他生意，当然是要解决的。所以和平调解的策略，客观上是帮助了资本家，再坏没有。”<sup>①</sup>那么是不是去鼓励他们殴打得更凶狠呢？彭湃认为：“这更是要不得。正确的策略是斗争的转变。党应该在群众中暴露资本家挑拨工人打架的罪恶，鼓励他们磨拳擦掌勇气百倍的精神一致的去对付资本家，要资本家认罪，要资本家赔偿，如不答应，就采取怠工或罢工的方法去回答他的阴谋。这叫做斗争转变的策略。”<sup>②</sup>当时，党组织所采取的正是这样的策略。所以，机务工人最后便和车务工人团结在一起，向资本家提出了要燃放鞭炮向工人认罪、赔礼的要求。资本家则因为自己的阴谋败露，怀恨在心，扬言要开除工人。但是，资本家的这一手并没有把工人吓倒，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工人之间的相互团结。

一九二九年七月，党中央根据工作的需要，决定将彭湃调回中央，加强农委的领导工作。虽然，江苏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曾向中央提出要求挽留彭湃继续在江苏省委工作，但中央没有同意<sup>③</sup>。八月十五日，彭湃最后一次参加江苏省委常委、候补常委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罗登贤、李维汉等同志。彭湃在会上，再一次强调了党的发展问题，并就凤阳火柴厂的斗争、徐州雇农的斗争、烈山煤矿的斗争、宿迁的抗租斗争、东海学校中的斗争和问题，以及各县县委的组织问题作了报告，介绍了情况，提出了一些值得省委注意的问题。<sup>④</sup>

---

① 彭湃：《斗争的转变与深入》，《彭湃文集》第313页。

② 彭湃：《斗争的转变与深入》，《彭湃文集》第313—314页。

③ 参见1929年8月江苏省委第一次常委、候补常委联席会议记录。

④ 参见彭湃：《外县工作问题》，《彭湃文集》第323—324页。

## 二、狱中斗争

彭湃得到了中共中央关于调动工作的决定以后，便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召开江苏省军委会议，移交自己所担负的军委书记工作。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军委兵工运动负责人邢士贞和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等同志。这次会议是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的。白鑫当时是江苏省委军委秘书，军委的会议经常在他家里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他负责通知其他同志到会的。

会议正常地进行。与会者谁也没有料到，白鑫已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并且将这次会议的内容及召开时间、地点等，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情报处长、特务头子范争波作了报告。

下午四时左右，载着租界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的五部红皮钢甲的囚车，如临大敌地开到了经远里。在弄堂内外布置妥当后，巡捕便包围了十二号楼房，开始了搜捕行动。

由于这是一次突然的袭击，参加会议的所有同志都无法抗拒和逃避。于是，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同时被捕。他们被推上囚车，送到新闸路捕房关押起来。

二十六日，法院开庭审判。在彭湃等同志被带上法庭以后，租界的法官与上海市公安局的代表装模作样地办了一些形式上的手续，便由租界法官判决：将彭湃等交上海市公安局“引渡”给中国当局。当天，上海市公安局立即派出军警，用囚车将彭湃等押送至水仙庙看守所。

反动派为逮捕了彭湃而兴高采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特为此发电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邀功请赏。当知道同彭湃一起被捕的人中有张际春时，蒋介石为了证实，还特地派人到上海去当面认证。彭湃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和海丰县党部等闻讯，纷纷致电上海市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证实彭湃被捕的消息，并请求将彭湃“就地正法”。上海市公安局接电后，随即作出肯定的答复，还致电广东当局转海丰县，将县里悬赏一万元捉拿彭湃的款项，汇交上海。

在敌人的监狱中，彭湃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二十六日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对彭湃进行了提审。由于彭湃拒绝承认自己的身份，敌审判官又一时来不及找到证人，因此这次审讯只得草草收场。

第二天下午，反动派找到了原来就认识彭湃的国民党广东省汕头市市长方乃斌后，上海市公安局又进行了第二次提审。因为方乃斌的出庭作证，彭湃只得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说道：“我是彭湃，你们要怎样就怎样。”<sup>①</sup>当审判官要彭湃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彭湃慷慨陈词，追述了自己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到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历时一个多小时。当谈到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湃面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审判官，大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sup>②</sup>彭湃的讲述义正辞严，旁听者为之动容，反动派的审判官则惊慌失措。

---

<sup>①</sup> 《纪念我们的死者彭湃烈士》，载1929年10月《太平洋公报》，第5期。

<sup>②</sup> 冠生(周恩来)：《彭、杨、颜、那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载1930年8月30日《红旗日报》(下同)。

第二审过后，上海市公安局深恐将彭湃留在他们那里会发生意外，遂决定在第二天清晨，将彭湃连同其他一起被捕的同志，转送龙华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

反动派的这种恐惧并不是多余的。就在彭湃等同志被捕的当天晚上，当时在上海党中央主持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了军委特科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方法。在获悉敌人的上述计划后，周恩来再一次召开军委特科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利用这一机会在途中进行武装截车营救。本来，在一般情况下，武装营救同志和惩罚叛徒的工作，是由军委特科属下的第三科执行的。但是，为了争取多一些同志参与这次行动，以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动员特科同志，凡是会使枪的都可以参加。

营救前的准备工作连夜紧张地进行着。截车地点的地形侦察清楚了；敲开铁铐的工具买回来了；欠缺的部份枪枝也已派人购置妥当了。负责运送新买枪枝的，是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间，以开“三民照相馆”作掩护的同志。他把新买来的驳壳枪装在小皮箱里，驾机器脚踏车赶到了设在同字路的中央军委特科。特科的同志马上取出了枪，发现枪上涂了一层保护黄油，需要把它洗净后才能使用。于是，又立即买回煤油来洗擦。洗净以后，参加营救行动的同志在李强的带领下，装扮成外出拍电影外景的队伍，乘卡车出发。这时比预定出发的时间已晚了一、二个小时。营救的地点选择在枫林桥附近。这是由水仙庙看守所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地。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可是押送彭湃等同志的囚车却一直没有到来。后来才知道，由于拖延了出发的时间，在他们赶到枫林桥附近时，押送彭湃等同志的囚车已开过去了。<sup>①</sup>

在从水仙庙看守所押解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

途中，彭湃对押解的警察进行了革命宣传。押至警备司令部监狱后，由于是日晚发生了谋刺蒋介石的事件，警备司令部内上至司令熊式辉，下至司法科人员，都忙于将有嫌疑的卫兵统统押至警备司令部严刑拷打审讯，因此一连两天，都没有继续提审彭湃等同志，只是将彭湃加上手镣脚铐，连同其他四位同志关在一起，由特务队严密看管。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彭湃、杨殷和其他同志利用一切机会，向在狱群众与看守监狱的士兵宣传我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投靠帝国主义，屠杀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感动。“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sup>②</sup> 狱中的一些久闻彭湃名字的人，得知彭湃就在监狱中，都争相来看望；还有几位是以前就认识彭湃的，都以旧时相识为荣。

彭湃在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后，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和其他同志给党中央写的信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演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钟以前，我们努力的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们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sup>③</sup> 在传出来的书信中，彭湃等同志“嘱咐党

---

① 参阅《访问李强、柯麟记录》，（1979年8月X未刊稿）。

② 冠生：《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

③ 1929年10月12日《红旗》第48期。

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工夫，以教育全党”。“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sup>①</sup>彭湃在给他的夫人许冰的最后一封信就是这样写的：“冰妹：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sup>②</sup>

在截车营救彭湃等同志的计划没有取得成功以后，我党中央又设法和彭湃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并千方百计寻找其它的营救办法。八月二十九日，江苏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发出《反对拘捕彭湃的宣言》，号召全省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彭湃等同志的斗争。在上海，群众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拘捕彭湃等同志而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为配合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彭湃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为能脱牢笼而努力着。当他与尚在狱中的、与党组织有联系的黄慕兰接上头后，彭湃即嘱咐她对看守他们的特务队做工作。当时在监狱中关押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官员黄干诚，是梅县人，以前就认识彭湃，他对彭湃等同志说及了警司军法处甚为腐败，可用金钱进行贿赂等情况，并说他有个亲戚在警司参谋处工作，可以从中帮忙。据此彭湃在三十日早上和杨殷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提出准备设法与黄干诚进一步详谈，请中央调查黄干诚方面的关系和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在这封信中，彭湃和杨殷还提出了另外的几个办法：（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二）上条若不能做到，则牺牲他们两人而设法营救其他三位同志；（三）运动监狱里的士兵以谋逃脱；（四）调查现任炮兵营长张庸言，看有无变动及希望。（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sup>③</sup>

接着，彭湃又和杨殷给周恩来写了最后一封遗书：

---

① 冠生：《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

② 《彭湃给许冰》，见《彭湃文集》第329页。

③ 参见《彭湃给顺业》，《彭湃文集》第326页。

“我等此次被迫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的人，大表同情。尤其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余人还坚持不认”<sup>①</sup>。

然而，彭湃的挽救其他同志的愿望，都由于蒋介石的关于立即处决彭湃的手令的下达，而来不及行动。

就在给党中央写完这两封信后，彭湃被叫出牢房。国民党反动派在决定枪杀彭湃之前，还妄图通过肉体上的摧残，使彭湃低头。他们使用了法西斯手段，对彭湃施以惨不忍睹的各种酷刑，以致彭湃竟因此而晕死过去达九次之多，弄得体无完肤。<sup>②</sup>但是，彭湃并没有屈服。在他受刑被抬回牢房后，难友们看他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心里都非常难过。彭湃却忍受严重的伤痛，对难友们进行安慰和鼓励，还在墙上画了一条龙，风趣地向大家说：你们看，我要象这条龙一样升天了。<sup>③</sup>

午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同志推上囚车，在一个排步兵以及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租界巡捕的严密看管下，押送到租界法院。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饰杀害彭湃等同志的罪行，竟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为此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合作，演出了一出所谓法院宣判的滑稽戏。在租界临时法院设置的特别法庭开审时，不准任何人参加旁听。法官与陪审的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先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些什么。作为装饰门面的被告辩护律师，也说了一些无关重要的话。最后由法官宣读了早就拟定的判决书。彭湃以蔑视的眼光注视着这一切。在

---

① 《彭湃给冠生》，《彭湃文集》第328页。

② 1929年10月，《太平洋公报》，第5期。

③ 《访问张纪恩记录》，（1979年8月X未刊稿）。

从法庭出来押上囚车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五位同志，态度坦然，相视而笑，颜昌颐还举手高呼：“共产党万岁！”

押回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彭湃知道敌人马上就要下毒手了。在这面临死亡的时刻，彭湃所念念不忘的是其他同志的安全，是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不久，监狱当局即送来一桌酒饭，彭湃等根本就没有理采这一桌行刑前的“赏饭”。约一小时后，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便被押赴秘密刑场。彭湃等同志慷慨激昂，向监狱的看守士兵和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临别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当时的情景使得一般看守士兵及狱犯都失声痛哭，甚至连监狱里的职员也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地点是在警备司令部广场内。这样的秘密处决，在熊式辉任司令期内是没有先例的，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次屠杀事件的紧张和恐惧。临刑前，彭湃面对着刽子手的枪口，神态自若，高呼：“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崇高品质和坚贞的革命气节。牺牲时，彭湃年仅三十三岁。

### 三、烈士英名永世长存

彭湃等就义的噩耗很快传到了党中央，同志们感到非常悲痛。对于亲密战友的遇难，周恩来含着悲愤的眼泪，随即以党中央名义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的告人民群众书，有力地控诉了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的罪行，高度评价了彭湃光辉的战斗的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一生，指出他“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

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身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派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地知道他们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sup>①</sup>九月五日，党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动员全体同志，把彭湃等同志“领导革命斗争的事实与他们英勇的牺牲，特别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惨无人道的罪恶，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宣传。同时要用各种方式号召群众集会与示威，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暗杀政策，追悼他们死难的领袖！”。<sup>②</sup>

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则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位无产阶级忠诚战士的深切悼念。

在江苏，九月九日，江苏省委发出通告和传单，强调各地党组织“必须在农村中间广泛的宣传彭湃”，并把这一宣传“与本地的实际斗争的鼓动相联系”<sup>③</sup>。九月二十九日，上海各界群众举行追悼彭杨颜邢四位烈士大会，大会发出了《为追悼被国民党惨杀的彭杨颜邢四革命领袖告上海民众》书。同日，上海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人道互济总会和上海市人道互济会等也印发了传单。上海工会联合会的传单是用歌词写的，歌词说：“可恨！统治阶级呵！枪杀我领袖，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又遭牺牲了，诸位烈士们，革

---

① 1929年9月2日，《红旗》第43期。

②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1929年9月5日）。

③ 《江苏省委通告第三十二号》（1929年9月9日）。

命的领袖，为我谋解放，打倒众敌人，领导广暴建立苏维埃历史永  
勿朽。革命工友们，大家快奋起，高举旗，红旗帜，勇敢冲上前，巩  
固我团体，抖擞我精神，加紧来斗争，打倒国民党，罢工示威追悼烈  
士，争得最后的胜利。”<sup>①</sup>

在广东，九月十六日，广东省委给各特委、县市委、特支及各种  
党团组织发出通知，号召全省人民“勇敢、勇敢、更勇敢地冲上前  
去！继续着彭杨诸同志的精神奋斗！完成他们未完的任务。”<sup>②</sup>在  
彭湃的家乡海陆丰，革命群众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彭湃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会。

在江西，九月二十日，江西省委在常委会上举行了哀悼彭湃等  
同志的仪式，“并议决数项哀悼办法”，强调指出：“在党内，要使每  
个同志了解先烈之死，只有加重了自己的任务”<sup>③</sup>。在红色区域，革  
命群众臂缠黑纱，呼着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和追悼活动。

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为了纪念彭湃和杨殷的牺牲，还建  
立了“彭杨军事学校”。

中央军委特科在悼念彭湃等同志牺牲的同时，为了惩办叛徒，  
对叛徒白鑫的活动规律进行了周密的侦察。白鑫在出卖了彭湃等  
同志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探听我党同志的行踪，干着他那罪  
大恶极的反革命勾当。稍后，他似乎也预感到难以逃脱被我党惩  
处的厄运，因此深居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八号  
范争波<sup>④</sup>的家里，不敢轻易外出。十一月十一日，特科同志获悉  
白鑫将于是日晚间乘火车前往南京的讯息后，立即制定了行动方

---

① 上海工会联合会：《新苏武牧羊》，（1929年9月20日）。

② 《广东省委通告第七十六号》，（1929年9月16日）。

③ 《江西省委赤字通告第二十八号》，（1929年9月20日）。

④ 范争波，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

案。当夜幕垂空的时候，在旦钟宇的带领下，执行任务的同志埋伏在范争波寓所的附近。晚上十一时许，当白鑫、范争波一起，在保镖的保护下，走出家门准备乘车去火车站时，早已严阵以待的特科诸同志，一齐开火，当场将白鑫击毙，范争波也被击中，伤势严重。此事当时震动整个上海，而敌人始终未能破案。

彭湃的牺牲，夫人许冰更是无比的哀痛。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为彭湃报仇。她在一九三〇年四月五日《红旗》写的文章中说：“半年来的悲哀已给了我的教训，一切敌人完全不会因我的悲哀而消灭，心中的创痕也没有因我的痛哭而填补，深仇大恨丝毫不会因为我的热泪狂流而报复”。从今以后，只有继续彭湃的精神，“踏着他的血迹坚决地到群众中间去磨利我的刺刀，杀尽一切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来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安慰我彭湃同志的忠魂！”<sup>①</sup>经党中央的批准，许冰把孩子送到济难会开办的“大同幼稚院”，回到曾与彭湃并肩战斗过的广东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东江特委委员，负责妇女工作。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为坚持大南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奋斗。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俘，敌人诱劝她投降，她坚贞不屈说：“我生为红军人，为革命而死，光明正大，决不贪生受辱。”英勇牺牲于汕头市。

一九三〇年，在彭湃等同志遇难一周年的前夕，为了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周恩来以冠生为笔名特地发表了他在一年前写的题为《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的经过》一文。这篇文章详细记述了彭湃等同志被捕后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英雄事迹，讴歌了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坚定信心，指

---

<sup>①</sup> 许冰：《纪念我亲爱的彭湃同志》，载1930年4月12日《红旗》第92期。

出“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战绩却永远光明的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是的,广大的人民群众永远不会忘记彭湃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他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丰碑,将永世长存。

## 彭湃生年年表

- 1896年10月22日** 生于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的一个地主家庭。乳名天泉。
- 1901年** 进海城七圣宫读私塾。
- 1903年** 进林祖祠小学读书。
- 1906年** 父亲与嫡母相继去世。
- 1909年** 进海丰第一高等小学读书。
- 1911年10月10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
- 1912年** 家庭为彭湃完婚，夫人是海丰鹿境乡的蔡素屏。
- 1913年** 进县立海丰中学。
- 1916年冬** 和陈复、陈魁亚、林苏等同学一道起来反对劣绅陈月波等为驻军统领林干材立石碑浮雕像。
- 1917年春** 离开海丰到广州广府中学上学。
- 夏** 东渡日本至东京，入成城学校学习日语和补习课程，取名彭湃。
- 1918年5月16日** 闻日本帝国主义与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后，与友人特摄“国丧纪念”照片，“以示国仇之不忘”。
- 5月下旬** 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警察迫害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决定全体罢课归国。彭湃回到海丰，组织学生开展废约救亡的宣传。
- 6月中旬** 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压力下，和其他留日学生不得不重返日本继续学业。
- 9月30日** 考入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
- 1919年4月中旬** 和部分留日中国学生前往东京火车站截拦，痛打回国述职的中国驻日公使、卖国贼章宗祥。
- 5月4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 5月7日** 参加留日中国学生在东京举行的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被日警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悲愤之余，破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寄回海丰县学生联合会。

**约5月下旬** 离开东京经上海回到海丰，开展救亡宣传和抄查日货的工作。暑期过后才返东京。

**9月18日** 早稻田大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成立。彭湃与一、二个友人加入了这个组织，开始研究社会主义诸家学说，不久又单独加入“劳动者同情会”。

**1920年10月** 和李春涛、杨嗣震、林孔昭等在东京发起组织“赤心社”。

11月加入由日本人堺利彦和朝鲜人权无为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宇宙社”。

**1921年5月1日** 在东京参加日本劳动人民的示威游行。

5月初考完毕业试后，离日本回国。回国后不久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5月15日~19日** 在《双周评论》第一、二期发表《日本底“五一”》。

**5月23日回** 到海丰参加祖母的葬礼。稍后，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

**7月30日** 发起组织“劳动者同情会”。

**8月12日** 海丰部分学生请愿，要求彭湃为劝学所长。

**8月中旬** 和郑志云等前往广州。在广州期间，彭湃曾会见了陈独秀。

**9月1日** 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

**10月1日** 陈炯明指令海丰县长翁桂清委任彭湃为县劝学所长。彭湃于是日正式就职。任劝学所长后，彭湃聘请在日本认识的进步同学杨嗣震、李春涛等来海丰任教。

**1922年1月3日** 劝学所改为教育局，彭湃任局长。

**2月8日** 海丰“县议员彭汉垣提出本邑拆城案，全体议员通过”。

**3月2日** “绅者集议反对拆城”。“教局雇工将南北各城拆十丈”，劣绅陈月波于是日“率人到教育局质问彭湃”。

**3月3日** 为拆墙事发表宣言。陈月波指使爪牙前往教育局企图殴打彭湃。彭湃被迫离开海丰前往广州。

**3月12日前后** 在广州参加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组织的白话剧社。

**3月14日** 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于是日假座东堤东园召开成立大会暨马克思纪念会。晚上，白话剧社为到会者演出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六幕话剧。

**3月19日** 电海丰县长翁桂清，要求辞教育局长职。翁桂清复电挽留。

**4月27日** 自广州回到海丰。

**5月4日** 组织海丰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

**5月8日** 陈炯明办的《陆安日报》刊登题为《借教育以宣传社会主义之谬妄》的文章，大肆攻击彭湃。

**5月9日** 被免去教育局长的职务。

**5月14日** 和李春涛等创办的《赤心周刊》刊行。该刊的目的在于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

**6月2日** 在《赤心周刊》第四期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

**6月14日前后** 在《赤心周刊》第六期发表《告农民的话》。

**6月下旬** 深入农村，开始从事农民运动。

**7月29日** “六人农会”在得趣书室成立。成员有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彭湃。

**10月** 派林苏、余创之先后到陆丰的东山、浮头等地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

**10月25日** 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会员有五百余人，推举黄凤麟为会长。

**秋** 到惠阳县的高潭进行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

**11月18日** 给李春涛写信。信中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较之开展工人运动的五个更为有利的条件。

**1923年元旦** 海丰县总农会成立，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彭湃为总农会制定了会旗，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章程。

**2月9日** 给李春涛写信。信中说，海丰农会“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3月3日** 海丰总农会召开“海丰全县农民新年同乐会”。约至三月底，会员人数达二万户，十万多人，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3月中旬** 海丰农会会员与地主第一次发生正面公开冲突。彭湃率领六千多会员前往县法庭举行请愿示威，抗议地主的“粮业维持会”串通法庭无理扣押拒绝加租的六个农民。法庭慑于农会的威力只得立即释放被捕农民。随着这场斗争的胜利，农会组织向周围各县发展。

**4月** 到陆丰推动农民运动，协助成立了“陆丰县农会筹备会”。

**4、5月间** 陈炯明企图控制农会，暗叫林晋亨写信邀彭湃到香港。为

了利用陈炯明，彭湃应邀前往。

**5月1日** 在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会会员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说。是时，三县农会会员达二十余万人。

**5月** 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为会长。

**6月23日** 陆丰县总农会成立。

**7月** “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彭湃参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为广东省农会起草了《广东农会章程》。

**7月26日** 海陆丰遭强台风袭击。彭湃原定是日前往广州，应约和陈独秀商量农会事情，因急需处理台风造成的灾情而不果行。

**7月30日** 给李春涛写信，提出减租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挑战。

**8月5日** 海陆丰再次遭强台风袭击。海丰总农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讨论早造交租的问题，通过了“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

**8月15日** 海丰总农会在海城召开全县农民大会，大会重申“至多三成交租”。当晚，反动县长王作新召集豪绅会议，决定以武力摧残农会。

**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海丰总农会遭反动军警袭击。农会职员杨其珊等二十五人被捕。王作新出布告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是为“七·五”农潮。

**同日** 召集突围出来的农会骨干开会，决定利用陈炯明曾许下的支持农会的诺言，去老隆找陈炯明交涉。

**8月23日** 和林苏、蓝陈润一起经过数天跋涉，抵达老隆。陈炯明同意电令王作新释放被捕入狱的农会职员。

**8月24日** 离开老隆，前往潮安。在潮安适遇由北京南归的李春涛，并请李起草了《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

**9月初** 经汕头回到海丰，旋即和李劳工赴香港找林晋亭，要他催促陈炯明解决释放农友问题。在香港的一个多月里，彭湃在人力车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和为被捕农友募捐。

**9月7日** 给文亮写信。信中讲了不能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并谈及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

**9月7日后** 撰写《广东农会之组织及经过》。

**9月下旬** 阮啸仙写信请彭湃参加行将在十月中旬召开的团广东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10月底~11月初** 根据林晋亭的建议，和李劳工离开香港，经汕头到达

老隆，再一次找陈炯明。

**11月** 发起组织惠潮梅农会于汕头。

**12月下旬** 回到海丰，以惠潮梅农会的强大声势为后盾，利用陈炯明的表面“支持”以及钟景棠和王作新之间的矛盾，迫使王作新全部释放在“七·五”农潮中被捕的农友。

**1924年1月20日** 给刘仁静写信，建议党中央和团中央多派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到农村来开展农民运动。

**2月8日** 海丰捷胜约农会召开恢复大会。彭湃到会并发表演说。

**2月10日** 在陈炯明的私宅博约山房当面驳斥陈炯明、王作新等对农会的攻击、污蔑。

**3月17日** 海丰总农会于是日召开恢复大会。

**3月21日** 海丰县长王作新贴出布告，宣布取缔农会。农会组织又一次转入秘密状态。

**3月26日** 离开海丰。海丰的农会工作交给郑志云、彭汉垣、陈修等负责。四月一日上午，彭湃到达汕头，下午乘船前往香港。

**4月初** 抵达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

**4月中旬** 写信给在广宁开展农民运动的周其鉴。嘱他先照手续具呈县署为农会立案。

**5月11日** 给陈独秀写了《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

**5月中旬** 以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到广宁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宣传发动农民的工作，使农会会员由四千户增至七千户。

**5月21日~6月1日** 在广州参加团广东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6月9日** 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分工，彭湃任农工委员。

**6月18日** 和阮啸仙就广宁农会、花县农会先后被袭事，向团中央作书面报告。

**6月27日** 在彭湃和李劳工的组织下，广州市人力车第一协作社于是日正式成立。

**6月3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彭湃的提议，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派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7月3日**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越秀南路九十三号（现为五十

三号)开学。学员计三十八人,其中中共党员、团员占二十人。

**7月28日** 在广东大学礼堂主持广州市郊农民联欢会。孙中山先生出席了联欢会,并作了题为《农民要自己组织团体》的讲话。

**8月21日** 第一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大部分学员作为农民部特派员,派往各县。

**8月27日** 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彭湃任总指挥,徐成章任教练。

**9月初** 周恩来从法国归国,经香港抵达广州,彭湃和阮啸仙等前往码头迎接。周恩来初到广州时,与彭湃一起居住。

**9月4日** 在广东盐业工会筹备会上发表演说。

**9、10月间** 中共广州地委改选,彭湃被选为委员。稍后又当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参与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领导。

**10月** 国民党右派黄居素继任农民部长,试图撤彭湃农民部秘书之职。彭湃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使他被迫辞职。

**11月26日**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于是日抵达广宁,参与领导农民的减租斗争。

**12月1日** 原定是日举行农会、地主双方代表会议,谈判解决减租问题,由于县长蔡鹤朋的包庇,地主代表拒不到会,并派武装乘机向社岗等地农军发动突然袭击。

**12月2日** 就12月1日发生的紧急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作书面报告。要求“尽快从花县派出队伍前来支援”。

**12月5日** 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中共广东区委作书面报告。在给区委的报告中,彭湃分析了这次广宁斗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农民武装的重要作用,指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

**12月10日** 广宁各区农民代表五百多人列队前往县署请愿。彭湃依照国民党党纲,据理力争,使县长蔡鹤朋被迫答应拿办地主江汉英等各项请愿条件。

**12月11日** 由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分别任正、副队长及廖乾五任党代表的铁甲车队,抵达广宁社岗,与彭湃等一道,支援农民运动。

**12月15日** 第三师官兵两连,由副官长詹学新率领开抵广宁,他们在地主的“款待”、蒙骗下,竟然站在地主立场。

**12月16日** 廖仲恺为大元帅手拟命令,委派蔡鹤朋、彭湃、廖乾五和第三

师派出的一高级副官组织广宁绥辑善后委员会。

**12月19日** 争取第三师的“农民联欢大会”在社岗举行。彭湃在会上演说。会后,第三师官兵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

**12月26日** 广宁绥辑善后委员会预备会议于是日举行。彭湃等在会上提出惩办祸首,解除地主武装,解决减租、赔偿损失、恢复农会等提案。

**12月29日** 和廖乾五等利用广宁团保总局长谭侣松宴请的机会,捉拿了谭侣松,收缴了总局民团枪械。鉴于地主方面的反动气焰嚣张,彭湃等从县城撤返社岗。

**1925年1月7日** 在社岗参加公祭殉难烈士仪式。

**1月9日** 由廖仲恺派来的卫士队携带大炮到达广宁后,立刻炮击潭埗地主据点江姓炮楼,但因炮楼坚固,炮击无效。

**1月18日** 为了解决卫士队长卢振柳袒护地主、压制农民运动事,并决定今后的斗争计划,彭湃亲赴广州请示报告。

**1月19日** 代帅胡汉民发布命令,调卢振柳返广州,由连长谢星继代理卫士队长,并任命彭湃、廖乾五、谢星继组成广宁绥辑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广宁的军事行动。

**1月23日** 携带胡代帅签署的大元帅令和炸药一批,从广州返抵广宁。彭湃在广州期间,得知革命军将进行东征,即派员带信给在海丰坚持秘密斗争的农会领导人准备接应。

**1月31日** 绥辑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于2月1日用炸药摧毁江姓炮楼。

**2月1日** 广宁农军、铁甲车队、卫士队包围了江姓炮楼,彭湃亲率工程队开始挖掘通向炮楼的地道。

**2月3日** 彭湃就炸药无法摧毁江姓炮楼事,向广州方面作了详细报告,并派赵自选于翌日前往广州请求增援。

**2月10日** 赵自选携带子弹二千发返抵广宁社岗。

**2月13日** 江姓炮楼地主武装向农军缴枪投降。农军在铁甲车队、卫士队的支援下,还相继扫清了附近的地主据点,广宁农民反对地主的武装斗争胜利结束。

**2月19日** 在广宁农民热烈欢送下,彭湃与铁甲车队、卫士队离广宁返广州,接着赶往东江,参加东征。

**2月27日晚** 随东征军教导团进入海丰城。

和李劳工向蒋介石要求派黄埔军校毕业生吴振民留在海丰训练农民自卫军。

**3月1日** 海丰各界群众一千多人在县城的林祖祠和东征军举行联欢会，周恩来和彭湃出席大会，并都发表了演说。

**3月3日** 海丰农民举行欢迎东征军大会。大会宣布恢复县农会，并组织临时县农会执行委员会行使会务，由彭湃任委员长。是日晚，彭湃和谭平山等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第一次会议。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第二次会议，提出了恢复各区农会组织的措施。

**3月26日** 林苏率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考察团来海丰考察，并给海丰农民自卫军带来子弹一批。彭湃率农民代表及农民自卫军前往车站迎接。

**3、4月间** 给《向导》周报写信，叙述了东江农民运动情况，充分肯定了粤东农民在支援东征中立下的功勋。

**4月** 在彭湃领导下，在海丰建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

**4月14日** 在海丰农工界哀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上发表演说。

**4月20日** “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课，学员四十余人，由彭湃任所长。

**4月下旬** 先后出席了海丰二区、八区、九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和海丰工人联欢会，并分别发表了演说。

**5月** 派遣陈魁亚等分赴潮阳、普宁、惠来三县组织恢复农会。

**5月1日** 在海丰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发表演说。

**同日** 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未参加大会，但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

**5月4日** 与吴振民率领由海丰农讲所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宣传队，前往陆丰，支援陆丰农民反对反动县长徐健行的斗争。徐健行畏罪潜逃。

**7月初** 在彭湃指导下，海丰全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海城开幕，到会代表共一百二十六人。

**7月7日~9日** 与刚到海丰的李春涛就“海丰农民对于土地的观念是怎样的”等问题如何进行调查研究交换意见，决定向到会代表一百六十二人进行测验。结果是有八十人认为田地该归社会所有；二十九人认为该归农会所有。而没有一个人承认田地该归田主所有。

**8月4日** 自海丰到达广州。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八次大会上作关

于农运情况的报告。

**8月12日** 参加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委员长林宝宸烈士葬礼，并发表演说。

**8月20日** 廖仲恺先生被刺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

**8月26日** 广州举行市民大会，哀悼廖仲恺逝世。彭湃代表省农协在会上讲话。

**9月** 撰写《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文章反映了东江人民要求国民政府再次东征的强烈愿望。

**9月3日~4日** 花县农协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彭湃代表省农协出席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最近政治状况及农会进行计划的报告。

**9月7日** 在广州“九·七”国耻日（辛丑条约签订日）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

**9月14日** 彭湃主办的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是日在东皋大道1号开课。这届农讲所招收的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山东、安徽等省的学员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9月15日** 参加惠潮梅旅省人民大会，并被大会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

**9月27日** 出席惠潮梅各团体联合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被推为联合会农民部长。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军事委员会，随东征军出发。

**10月7日** 在广州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大会。

**10月18日** 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十六次大会上作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报告。会后，彭湃离开广州前往东江。

**10月20日~26日** 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选举何香凝、刘尔嵩、彭湃、杨匏安等九人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0月22日** 留在海丰的农民自卫军在东征军到达海丰以前占领了县城，推选彭汉垣为县长。是日，东征军进入县城。

**10月25日** 在彭湃的主持下，是日召开了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

**10月29日**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组为海陆丰地委，彭湃任书记。

**11月初** 从海丰回到广州。

**11月4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彭湃任省党部农民部长。

**11月19日** 率领第五届农讲所学员赴韶关参加曲江县农会成立大会。

**11月20日** 出席曲江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翌日由曲江返广州。

**12月5日** 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正式组成，由赖先声、彭湃、范其务、邓颖超等七人为委员。

**12月8日** 第五届农讲所学员毕业，彭湃与学员合影留念。

**12月中旬** 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身份赴广宁指导农民运动。

**1926年1月1日** 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一期出版。彭湃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分别在《中国农民》第一、三、四、五期连续刊登。

**1月6日** 省农民协会举行欢迎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农民党员代表大会，彭湃担任大会主席。

**1月10日** 在省农民协会举行的欢迎全国海员工会代表会上致开会词。

**1月15日** 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在汕头市志成里一号成立。彭湃兼任办事处主任。

**1月下旬**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前往普宁慰问被地主民团殴打的农友，并领导普宁农民反抗地主民团的斗争。

**1月29日** 普宁七千多农民及五百多名农民武装，远离县城二十多里迎接彭湃，彭湃即席发表演说。普宁农民反抗地主民团的斗争取得胜利。

**2月16日** 在海丰农民武装大检阅会上发表演说。

**2月下旬** 从粤东赶回广州，参加22日开始的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

**2月23日** 省农协开会欢迎省港罢工工友，彭湃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并致欢迎词。

**3月10日** 出席广州各界青年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说。

**3月中旬** 离开广州去汕头。

**3月18日** 为普宁、揭阳拾粪农民争取合理待遇事，向汕头市政厅交涉。

**3月下旬** 在汕头主持潮汕区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各地农民开展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

**4月** 从汕头回到广州，参与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同月** 前往曲江，领导改组被土豪劣绅把持的曲江县农会。

**5月1日** 在彭湃等主持下，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十五日闭幕）。彭湃被选为省农协第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

**5月5日** 在广州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致开会词，指出我们纪念马克思，

“不仅只信仰他的主义便够了，我们要努力去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

**5月11日** 在广州四商会欢迎工、农、学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5月下旬** 离开广州到汕头。亲到汕头市郊农村，发动农民，扩大农会组织。月底，又回到广州。

**5月29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5月30日** 出席广州各界纪念五卅惨案周年大会。

**6月2日** 在第六届农讲所向学员讲授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

**6月5日** 出席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提出辞农民部长职。

**6月20日** 前后赴汕头工作。

**7月** 由彭湃主持的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在汕头开办。

**7月下旬** 从粤东返回广州，参加省农协执委扩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8月4日** 在《犁头》周报第十二期发表《〈公债票与农民〉编后》，揭露东江各地的贪官污吏利用发行公债欺压农民的阴险行径。之后，前往海丰。

**8月上旬** 萧楚女带领第六届农讲所学员三百余人来到海陆丰农村实习、考察。彭湃向他们介绍了海陆丰农运的经验。

**8月12日~19日** 海丰全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海城召开，彭湃到会指导。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生列席大会。

**8月12日** 在《人民周刊》第十八期发表《出师北伐与省港罢工》。

**8月17日** 上午和参加海丰全县第二次农代会的代表六届农讲所全体学员等一共七百多人，前往龙山公祭农运死难烈士。晚在海丰农民自卫军总部慰劳农军，并致慰劳词，强调“我们要革命，一定要武装起来”，农民必须有了武装，然后革命才能成功。

**8月18日** 下午在海丰全县第二次农代会上“解释第三国际及普宁农民运动状况”。演说完毕即离开海丰赶回广州。

**8月下旬** 出席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报告。会议期间，彭湃率会议代表及市郊农民千余人前往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省政府请愿。

**9月** 毛泽东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编入《农民运动丛刊》。在为《农民运动丛刊》写的序言中，毛泽东对这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赞扬了海陆丰

农民运动，提出要把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9月1日~14日** 由于花县反动民团武装惨杀农民，酿成“花县惨案”，彭湃代表省农协，会同有关方面，前往调查。

**9月14日** 广州市召开欢迎赴花县支援农民自卫军，反击地主民团进攻的军队归来大会。彭湃向大会报告调查“花县惨案”的经过。

**9月20日** 在《人民周刊》第二十三期发表《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

**9月25日** 在广州东山培正中学礼堂举行的“广东各界慰劳北伐军人大会”上发表演说。会后赴汕头工作。

**10月** 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改名为《海丰农民运动》，出版单行本，周恩来亲笔题写书名。

**10月5日** 在《农民运动》第八期发表《敬惜字纸》，斥责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农民运动的行径，指出这是当前革命发展的严重障碍。

**10月29日** 在《人民周刊》第二十九期发表《为五华农友哭一声》。

**同日**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决定恢复潮梅特别委员会，由彭湃、李春涛等五人为委员。

**12月11日** 揭阳土豪劣绅周伯初、李德萱等率匪数百将来揭阳参加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共潮梅特委工人运动负责人、汕头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石魂绑架。

**12月12日** 中共潮梅特委为营救杨石魂，决定由彭湃出面，会同各团体及潮梅警备司令部代表组织查缉委员会前往揭阳。彭湃到揭阳后，即发动二万农会会员前往县府请愿示威，向县长提出了释放杨石魂、严惩凶手、保护工会农会干部安全等三项条件。

**12月20日** 杨石魂于是日脱险，然已遍体鳞伤。彭湃和杨石魂回到汕头，汕头工人举行大会欢迎。

**冬** 在汕头与许冰结婚。

**1927年2月23日~26日** 潮梅海陆丰农民和劳动童子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汕头举行。彭湃在会上作了《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大会致电省农协，请省农协发起组织全国农民协会。会后，彭湃离汕头前往广州。

**3月10日~17日** 在广州参加省农协第二届执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即和陈延年、苏兆征等同志一起前往武汉。

**3月30日**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彭湃被推举为临时

执行委员会委员。

**3月31日** 抵达汉口，晚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欢迎国际职工代表团、欢迎彭湃和苏兆征来到武汉特举行欢宴大会。彭湃出席了欢宴会。会上，李立三在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欢迎词中阐述了欢迎彭湃的意义。

**4月初** 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农协负责人和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在会上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重新分配土地的主张。

**4月2日** 在湖北省农协召开的欢迎筹备全国农协的各省代表的会上发表演说。

**4月4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彭湃出席并发表演说。

**4月9日**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就职通电，决定彭湃兼任农协秘书长。

**4月中旬** 蒋介石等相继于上海、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彭湃获悉此事时，即派彭汉垣迅速回到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策划举行武装起义。

**4月19日**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主持召开的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言，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痛苦，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而农民如不掌握政权与武装，则土地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4月27日~5月6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留在武汉，继续参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这前后，彭湃和毛泽东等都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

**4月30日** 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

**6月初** 离开武汉秘密来到南昌巡视工作，住黄家巷五十八号。

**6月5日** 江西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分共”、“礼送”方志敏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出境，同时专电通令各县禁止工农运动。是日晚上，彭湃和罗亦农、方志敏等开会研究对策。

**6月上旬** 参加方志敏和缪敏举行的婚礼。稍后，离开南昌经九江回武汉。

**7月21日** 在九江参加李立三、恽代英等召集的会议，讨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准备事宜。

**7月27日** 根据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在南昌宣布成立领导南昌起义的前

敌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

**7月30日～31日** 在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彭湃和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与企图阻挠起义的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

**8月1日** 南昌起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后，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任委员，并兼任农工委员会委员。

**8月3日～6日** 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军。

**8月7日** 党中央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彭湃没有参加会议。但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8月中旬** 起义军过广昌后，彭湃和农工运动委员会一起随队伍前进。

**8月底至9月初** 在瑞金参加了前委会议。

**9月10日** 起义军抵福建汀州。前委在汀州再次讨论了攻取东江的计划，并决定在三河坝分兵。

**9月12日** 和周恩来一起率部队首批进入上杭城。在上杭，前委会议再一次讨论了土地革命的政策问题。

**9月中旬** 海陆丰两县农民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

**9月24日** 起义军进入潮汕。在汕头成立了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以彭湃、杨石魂为正、副指挥，统一指挥东江地区的工农武装。

**9月26日** 起义军第二次分兵，主力在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下向揭阳进发。彭湃和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二十八人随行。

**9月27日～28日** 贺龙、叶挺率部在山湖、汤坑地区与敌激战。彭湃参与前线指挥。起义军主力受挫。

**10月3日** 参加由周恩来在普宁流沙主持召开的最后决策会议。

**10月7日** 和李立三、恽代英等一起撤退到陆丰，接着乘船前往香港。

**10月9日** 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分队伍撤到陆丰朝面山，其大部于十二日进驻海陆惠紫边界之中峒。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由董朗任师长，颜昌颐任党代表。

**10月15日** 在香港出席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

**10月25日** 发布海陆丰两县第三次武装起义命令。

**10月30日** 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第一期发表《土地革命》一文。

**同日** 海陆丰工农武装在红二师的配合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11月8日** 从香港经汕尾回到海丰，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

**11月10日** 在陆丰主持陆丰干部会议，讨论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1月13日** 在陆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

**11月18日** 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彭湃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演说。

**11月19日** 在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

**11月20日** 在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演说，海丰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海丰县苏维埃政府。

**11月下旬** 在陆丰举行的土地革命誓师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12月11日** 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举行广州起义，建立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彭湃未参加起义，但被推选为人民土地委员。

**12月16日~19日** 和董朗率领红二师在陆丰河口、昂塘击溃杨作梅地主武装。战斗结束后，始获知广州起义爆发，即组织海陆丰农民武装赶往广州，途中得悉起义已失败，乃折回。

**12月28日** 是日，彭湃得河口报告，陈济棠部进犯陆丰河田，即决定红二师和机关单位向黄羌山区撤退，后探知河口报告失实。当时称之为“二八”事变。

**1928年1月3日~5日** 东江农民代表大会在海丰召开。会议期间，彭湃作了《广州工人斗争的经过及教训》、《土地问题》等两个报告。

**1月5日** 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队伍在叶镛、袁国平、徐向前等率领下，于是日到达海丰城。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在红场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彭湃在会上发表演说。

**1月中旬** 率红四师一部前往陆丰平定“白旗会”匪乱。

**1月22日~23日** 海丰全县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彭湃在会上检查了东委在“二八”事变中的错误。

**1月31日~2月3日** 率红四师十一团经惠来五福田，到达普宁县赤水村，会合普宁工农革命武装击溃果陇庄大泉地主武装。2月6日，又击溃和尚寮的地主武装。

**2月中旬** 在普宁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普宁苏维埃政权成立。

**2月20日** 回到惠来，指挥红四师十团及惠来、陆丰农民武装攻克两县地主的大本营葵潭。

**2月26日** 东江特委制定对付敌人进攻海陆丰苏维埃的计划。

**同日** 敌第四军十一师三千余人取道揭阳，向陆丰大举进攻。不久，陆丰、海丰县城相继被占。

**3月上旬** 在惠来兵营主持召开惠来县农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攻占惠来县城，实行武装暴动以援助海陆丰的决议。留驻海陆丰、紫金的红二、四师余部陆续撤至惠来。

**3月12日~22日** 指挥红二、四师余部及惠来农民武装攻克惠来县城。惠来县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彭湃率红四师余部向潮阳发展，红二师留下两个连驻扎兵营，其余的向普宁发展。

**4月5日** 敌第五军向惠、潮、普进攻，是日占领惠来县城。彭湃在惠来林樟乡主持召开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师委联席会议，决议集中红军打回海陆丰。

**4月8日** 红二、四师集合于普宁盐岭待命，遭敌黄旭初部袭击后，部分红军经五华向海丰撤退。

**4月中旬** 省委派张善铭、赵自选去海陆丰工作。张善铭到海丰后即不幸被捕遇难。

**4月30日** 海丰县委和撤回到海丰的红二、四师负责人及赵自选等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反攻县城的计划。

**5月3日** 凌晨三时开始反攻海丰县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反攻县城失败。赵自选在战斗中牺牲。

**5月5日~11日** 在获悉省委指示及海丰反攻县城的消息后，为协调潮、普、惠三县的统一行动，彭湃主持召开了三县的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三县暴动计划，成立了三县暴动委员会，彭湃等十五人被选为委员。

**5月12日** 在惠来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动员反攻惠来县城。

**5月15日** 主持召开惠来党组织各级负责人会议。就反攻县城制定了具体计划。决定组织敢死队，彭湃任队长。后反攻惠来计划未能实现。

**5月20日** 惠来苏维埃代表大会遭敌偷袭，县委、东委机关被冲散。在群众的掩护下，彭湃经五福田来到普宁的白马仔村。

**6月** 在白马仔村和东江特委的其他同志一起，总结检查了三县暴动失

败的原因，制定了整顿三县党组织的计划。

**7月**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月** 省委两次写信给东江特委，决定将东江特委和潮梅特委合并为东江特委，指定彭湃任书记；设立东江特委军事委员会，指定由彭湃、董朗、颜昌颐、黄钊等组成。稍后，彭湃和东江特委机关转移到潮阳县的雷岭。

**9月29日** 到羊公坑开展工作，遭敌包围。在警卫人员和群众的掩护下突围出来。

**11月** 根据党中央指示，彭湃偕夫人许冰抵达上海。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农委名单，决定由彭湃任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并就南京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编遣会议、农民运动通告、汉口工人水杏林被日军炮车压死案引起罢工等问题作了发言。

**2月**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江苏省委，调彭湃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军委书记。

**2月9日~10日** 参加上海闸北区委会议。会议讨论了留学苏联的同志回国后工作安置问题。

**2月11日** 写信给中央，报告闸北区委讨论的情况，并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中央组织部于23日复信，充分肯定了彭湃的这些意见。

**2月19日** 在《党的生活》第五期发表《健强阶级主力向小资产阶级奋斗》。

**3月1日** 在《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五期发表《反帝运动的危机》。

**5、6月间** 撰写《雇农工作大纲》。文章阐述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关系、划分农村雇农成份的标准、雇农在农民运动中的地位，以及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教育问题，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

**7月** 在江苏省委机关刊物《教育周刊》发表《斗争的转变与深入》。

**同月** 中央决定调彭湃回中央加强农委工作。

**8月15日** 出席江苏省委常委、候补常委联席会议。

**8月24日** 在沪西区新闻路经远里十二号二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委军委会议时，因叛徒白鑫出卖而被捕。同时被捕的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同志。

**8月26日** 由租界捕房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水仙庙看守所。

**8月27日** 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第二次提审彭湃。彭湃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慷慨陈词，“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到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痛斥国民党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

**8月28日** 清晨，彭湃等被解押往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原定在途中武装截车营救，因延误了出发时间而失败。

**8月30日** 晨 和杨殷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报告狱中斗争的情况。在获悉敌人将要向自己下毒手以后，给夫人许冰写信诀别，勉其为党的事业继续努力前进。

**同日** 午后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旷地英勇就义。同时被杀害的有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同志。

## 后 记

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著名海陆丰苏维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本书力求较为翔实地叙述彭湃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光辉一生。

早在一九七九年，在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下，先后编辑出版了《彭湃文集》和《彭湃研究史料》。接着，组成了有蔡洛（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余炎光（暨南大学）、刘林松（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罗可群（广州外语学院）等同志参加的《彭湃传》编写小组，在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的指导下，开展编写工作。一九八二年写出初稿，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于一九八五年七月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聂荣臻、徐向前、李维汉、陆定一、李强、方志纯、罗明、柯麟、徐彬如、林务农、伍治之、黄鼎臣、刘锦汉、易礼容、彭士录等同志以及中央档案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海丰红宫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守和同志认真审阅了初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人民出版社马连儒同志对本书初稿的写成和最后定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封面设计:马少展

**彭 湃 传**

PENG PAI ZHUAN

蔡 洛 余炎光 刘林松 罗可群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188,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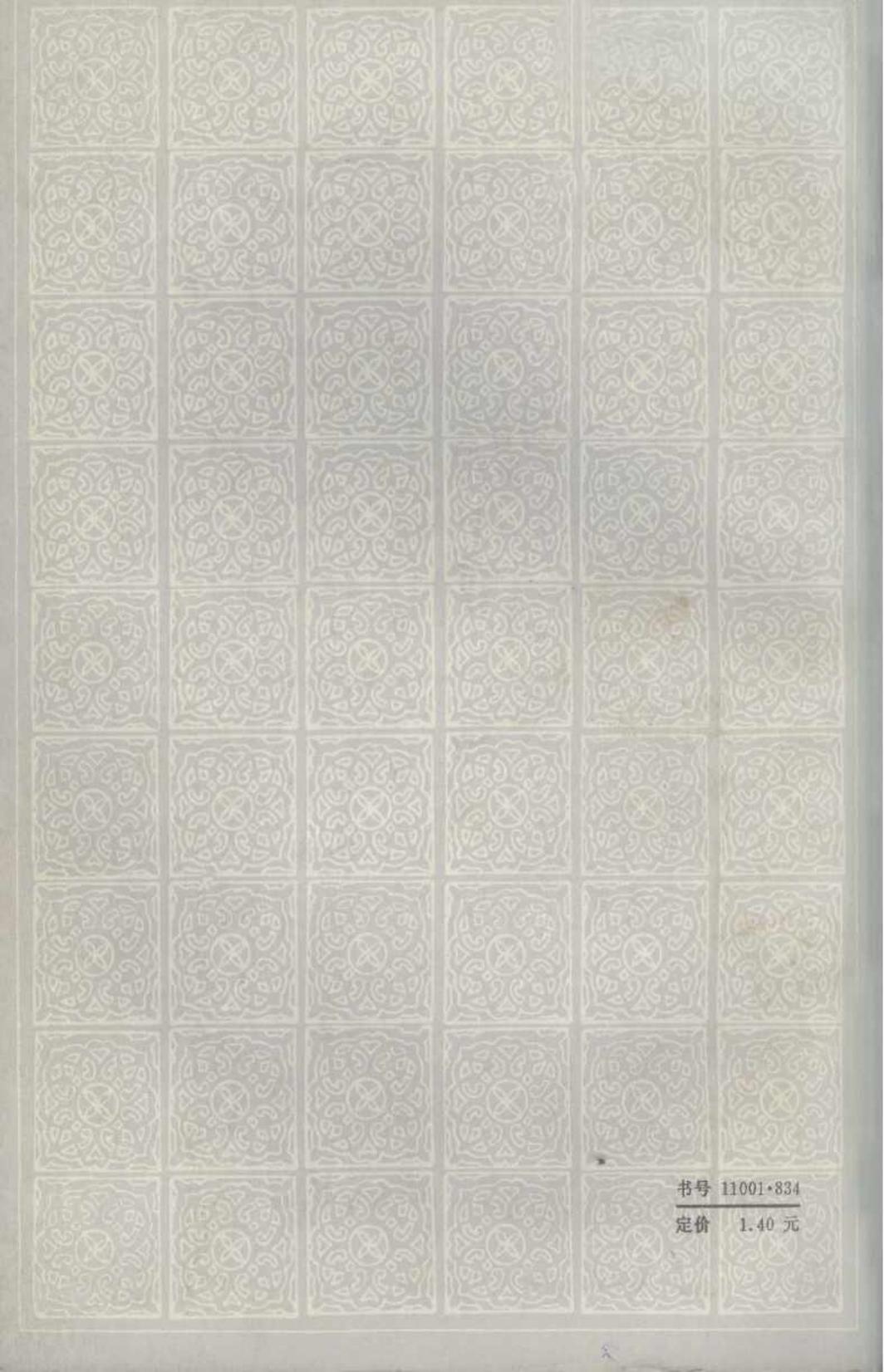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900

书号 11001·834 定价 1.40 元







书号 11001·834

定价 1.40 元